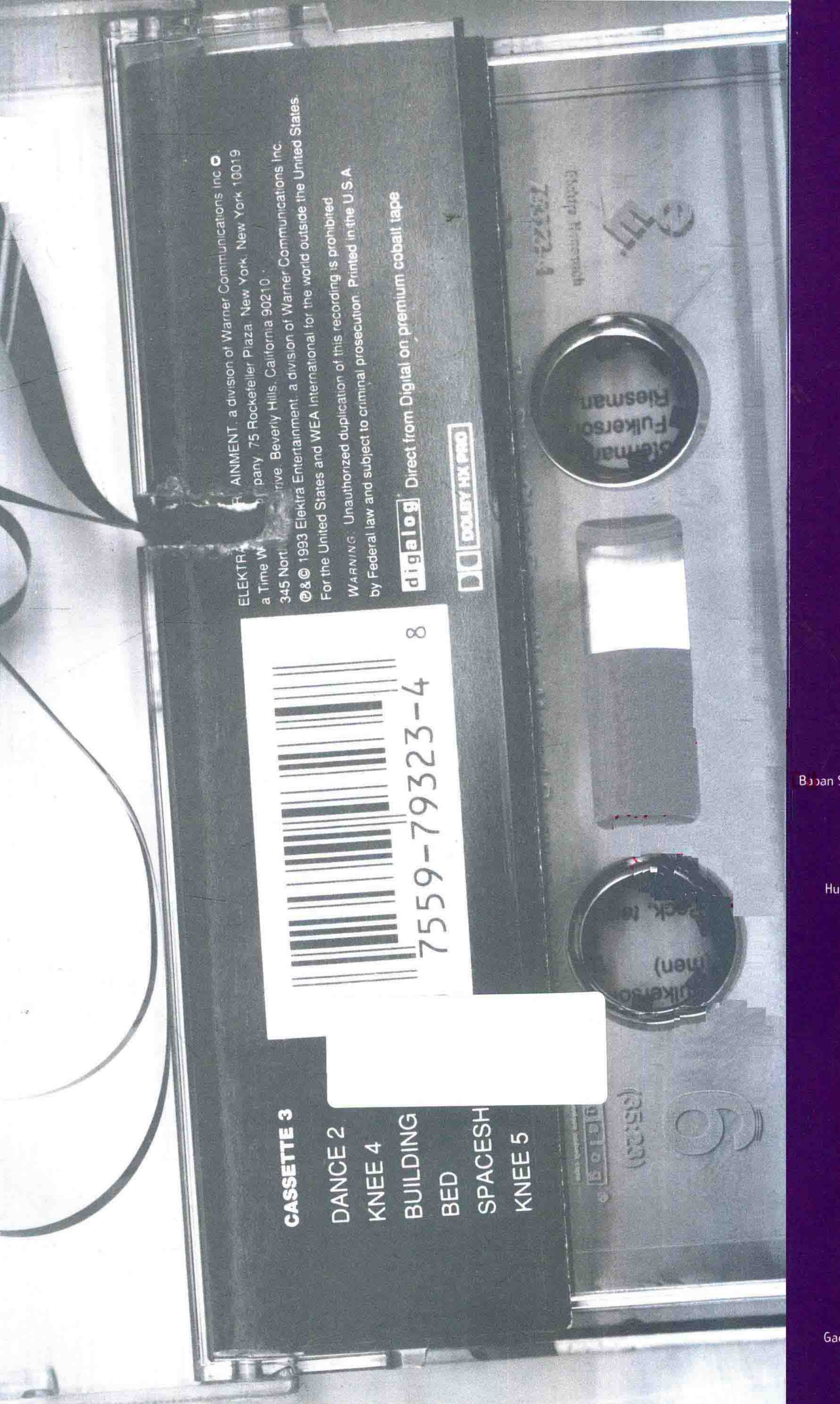

北京新声




# New Sound of Beijing


Editor-in-chief & Designer
Ned Au
Writer
Yan Jun
Photographer
Nie Zheng
Assistant Designers
Guevara Chan
Celine Ren
Contributing Writer
Lin Yun
Contributing Photographers
Song Xiaohui
Gao Yuan
Shi Hu
Meng Weiwei
He Rong
Xiao Quan
Quentin Shih
Cao Qian
Liu Huifan
Contributing Artists
Ma Liuming
Zhong Biao
Chi Qichun
Song Yonghong
Hong Lei
Ying Zi
Editor
Xiao Yuan
Produced by
Sonic China Productions Ltd.
6B.Xijing Tower.Xihu Gardens.
Baoan South Road.Shenzhen.P.R.C(518001)
Tel:86-755-5593971
Fax:86-755-5566142
Email:szsonic@public.szptt.net.cn
Website:http://www.sonichina.com
Published by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o.67.Yinpen South Road.
Changsha.Hunan.P.R.C(410006)
Tel:86-731-8882784
Fax:86-731-8883393
Thanks to:
Dickson Dee
Zhan Hua
Fu Chong
Shen Lihui
Niu Jiawei
Yuan Tao
Hao Fang
Zhang Desheng
Louis Chan
Li Xianting
Dao Zi
Tao Ran
Dai Qiu
New Bees Music
Modern Sky
Red Star Productions
Rock International
Jing Wen Record
Special Thanks to:
Gao Xiaolong & Our Apple G3 Computer

封面封底：Baby。No. 3，油画（局部），1998，马六明作品

**欧宁**

出生于 1969 年年底的欧宁少年时代即开始写作，与各地的诗人交往，创办诗歌刊物。大学毕业后投身广告行业，迷上平面设计。1994 年开始以"新群众"的名义策划各类音乐活动，倡导独立自主的音乐文化精神。1996 年创办自己的公司 Sonic China，致力于各种新文化的推广。

欧宁曾创办过多种独立出版物，他现在为国内许多杂志和书籍进行平面设计。同时，他还是一个繁忙的撰稿人，为香港和国内多家报纸杂志写作，内容涉及音乐、设计、书评、艺术等多个领域。他在深圳，"在经济的旋涡之中，在精神的边界之上"，他认为自己正历炼着一种新的人生。

**颜峻**

颜峻是以乐评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但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和演出策划人。1995 年他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去一家晚报做编辑，1996 和 1997 年还在两家电台主持摇滚乐节目。和很多人一样，他也开店卖过打口磁带，但是赔本了。现在，他住在北京城南，为一家周刊做房地产记者，有时候会作为朗诵者参加摇滚乐演出。

颜峻在兰州生活了二十六年，他在 1999 年才正式到北京。在他看来，摇滚乐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事业，而写作从无失败可言，这都是安慰。

**聂筝**

1969 年，聂筝出生于北京。在二十三岁以前，他还是一个南下漂泊的摇滚乐爱好者。那一年，他从珠海回到北京，结束了从动画师到工人再到平面设计师之间的职业转换。他也没能去成德国。他开始拍摄在北京兴起的摇滚乐演出，并很快成为红星音乐生产社的专职摄影师。离开红星后，他加盟滚石唱片，又在 1997 年到麒麟童文化至今，以摄影为生。

聂筝为许多著名的唱片专辑拍摄过封面。他喜欢一个人带着相机在北京城游荡，拍摄自己童年去过的地方，并记录这个城市的变化。"我对这个城市带有很深的感情，无论是热爱还是憎恨，我都属于它，"他说，"我热爱地下音乐和那些摇滚音乐家，我只是刚刚开始。"

北京新声

责任编辑：萧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16 印张：8
印数：5000 册
ISBN7-5404-2184-3
J·300 定价：128.00 元




**北京新声**

**主编＋设计**
欧宁
**撰稿**
颜峻
**摄影**
聂筝
**助理设计**
陈勇
任丽
**特约撰稿**
凌云
**特约摄影**
宋晓辉
高原
石虎
孟威威
何嵘
萧全
时晓凡
曹谦
刘惠帆
**特约艺术家**
马六明
钟飙
迟起春
宋永红
洪磊
樱子
**责任编辑**
萧元
**企划制作**
典中原声企划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西湖花园西景阁6B (518001)
电话:0755-5593971
传真:0755-5566142
电邮:szsonic@public.szptt.net .cn
网址:http://www.sonichina.com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省长沙市
银盆南路67号(410006)
电话:0731-8882784
传真:0731-8883393
**感谢**
李劲松
詹华
傅冲
沈黎晖
牛佳伟
袁涛
郝舫
张德生
陈启雄
栗宪庭
岛子
陶然
待秋
新蜂音乐
摩登天空
红星生产社
滚石国际
京文唱片
**特别感谢**
高小龙以及我们的G3电脑


## B1



## B2



## B



## B3

# 目录
# contents

（底图："Beijing Scene"上刊登的英文北京地图）

## C



## B4



## D



## A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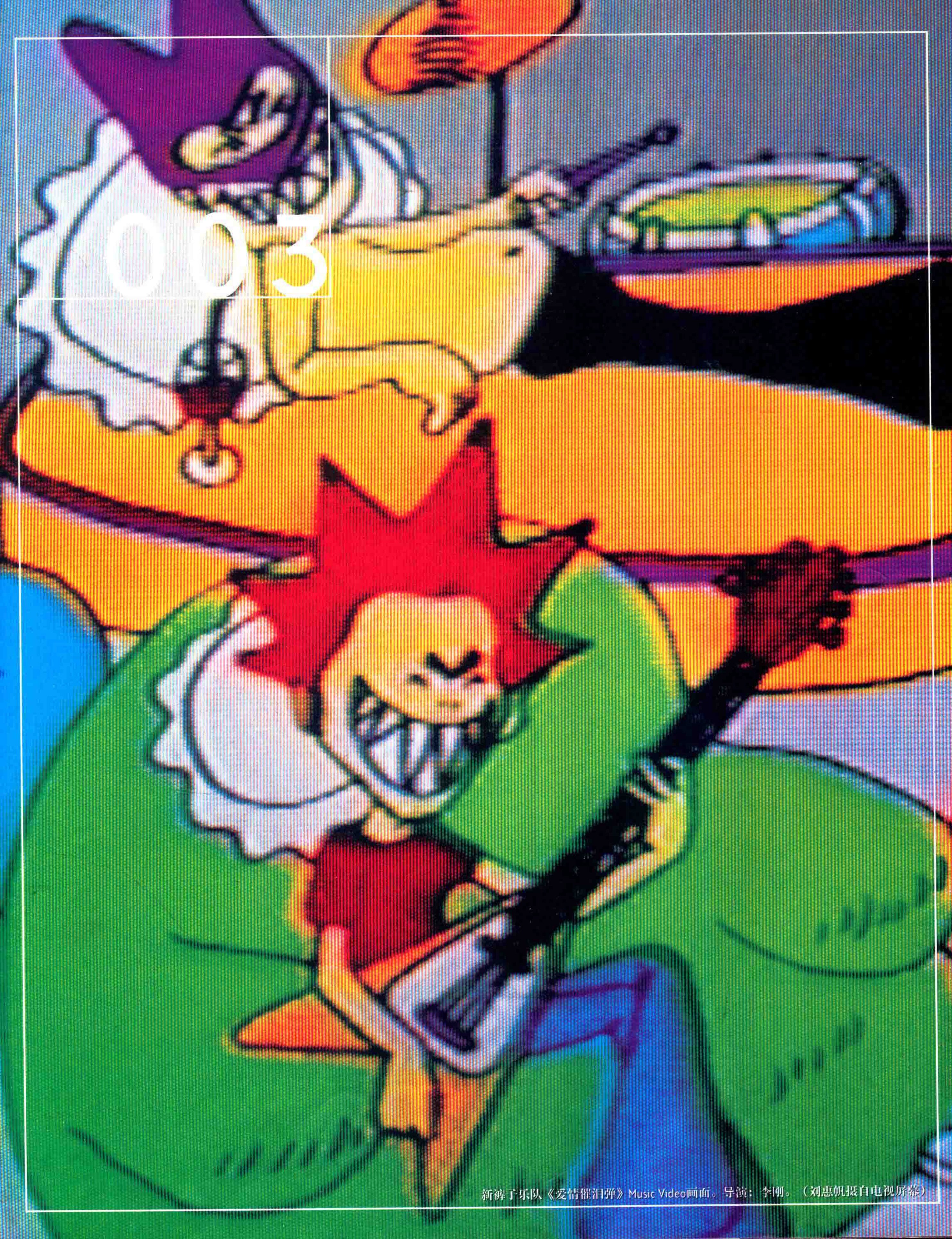


## A2

献给打口的一代



To Dakou Generation




新裤子乐队《爱情催泪弹》Music Video画面。导演：李刚。（刘惠帆摄自电视屏幕）

[ 他人回信 ] [ 我要回信 ] [ 大中国BBS - 音乐区 ] [ 使用说明 ]

信件作者 JAR OF FLYES on October 19, 1998 at 03:52:22:

我们是一群猥琐在城市边缘的青年，我们一天无所事事，却好摆弄狭小的屋里的双卡录音机，里面传出的声音让街道里的大妈咒骂，我们总是骑着嘎叽嘎叽响的破单车，游荡在城市的小胡同里，为了一个打口的磁带，我们曾跑遍全城，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我们哆嗦着双手在冬天的地摊上反复搜寻，我们的快乐就出现在那一条条杂乱的磁带堆里发现的宝藏，是我们心灵的问候和安慰。城市的秋天让我们感到沮丧和难受，是因为我们快要有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快要离别这个熟悉的校园和这个灰暗的城市，我们总是感到不满和压抑，但却只能在这里像孩子一样嘟囔着，我们不停地说着什么，也没人搭理，却爱自言自语，没头脑和不高兴是我们共同的性格，我们快要被埋葬和唾弃了，因为我们被这个陌生的时代打上了口，我们成了自己的打口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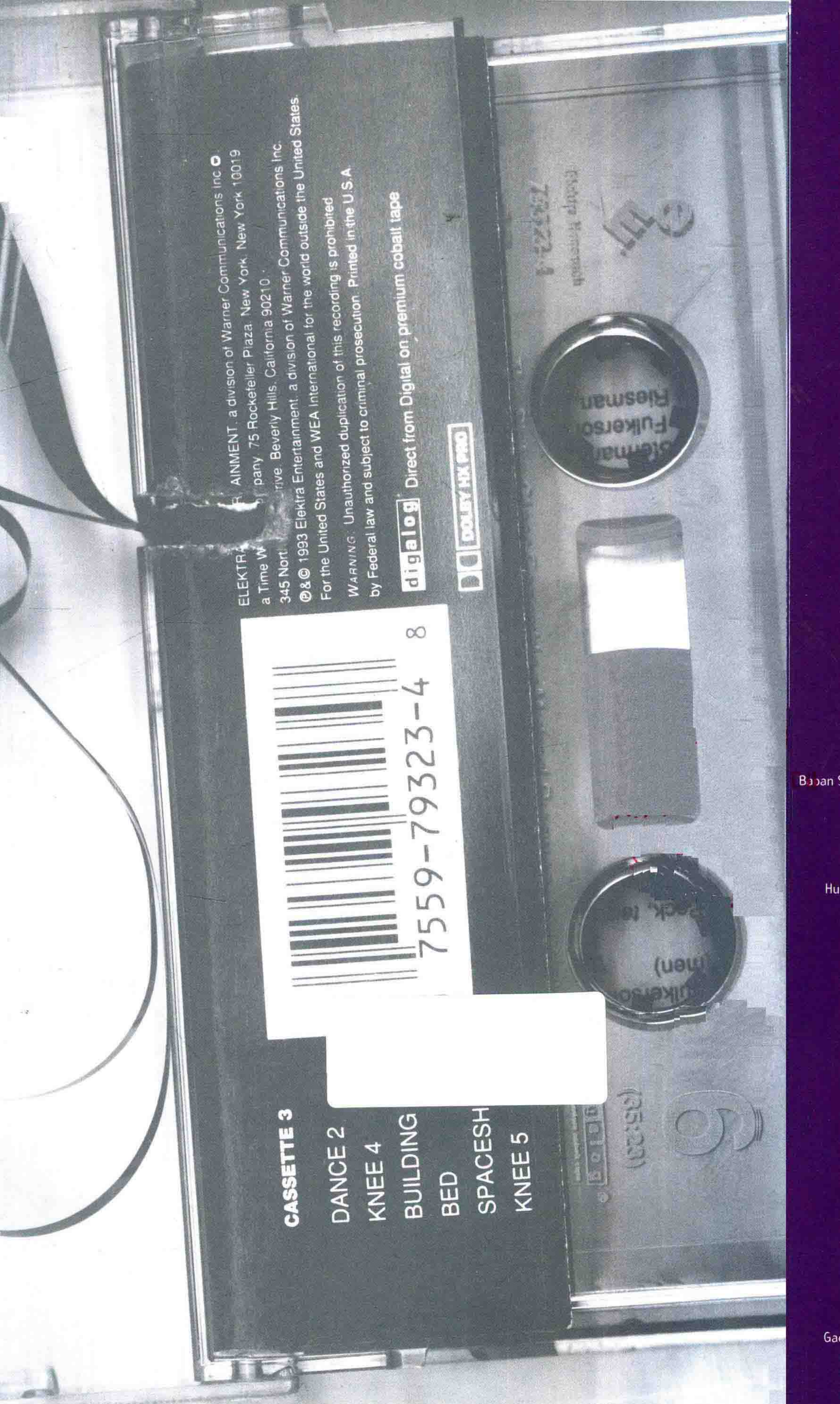
过了数年，我们已忘却了这个打口的印记，却在路边的地摊上发现了它的痕迹和踪影，嘿，原来，
我们早已把自己的青春打上了口，
这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的打口时代。

世事无常天落红雨社会在进步
莫怪看现在四海兄弟渐渐有头路
太阳下山
明朝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
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罗大佑《青春舞曲2000》

中国唱片




左：1978年中唱公司推出的薄膜唱片
右：Philip Glass和 Robert Wilson的打口唱片Einstein on the Beach




## New Sound of Beijing

Editor-in-chief & Designer
Ned Au
Writer
Yan Jun
Photographer
Nie Zheng
Assistant Designers
Guevara Chan
Celine Ren
Contributing Writer
Lin Yun
Contributing Photographers
Song Xiaohui
Gao Yuan
Shi Hu
Meng Weiwei
He Rong
Xiao Quan
Quentin Shih
Cao Qian
Liu Huifan
Contributing Artists
Ma Liuming
Zhong Biao
Chi Qichun
Song Yonghong
Hong Lei
Ying Zi
Editor
Xiao Yuan
Produced by
Sonic China Productions Ltd.
6B.Xijing Tower.Xihu Gardens.
Baoan South Road.Shenzhen.P.R.C(518001)
Tel:86-755-5593971
Fax:86-755-5566142
Email:szsonic@public.szptt.net.cn
Website:http://www.sonichina.com
Published by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o.67.Yinpen South Road.
Changsha.Hunan.P.R.C(410006)
Tel:86-731-8882784
Fax:86-731-8883393
Thanks to:
Dickson Dee
Zhan Hua
Fu Chong
Shen Lihui
Niu Jiawei
Yuan Tao
Hao Fang
Zhang Desheng
Louis Chan
Li Xianting
Dao Zi
Tao Ran
Dai Qiu
New Bees Music
Modern Sky
Red Star Productions
Rock International
Jing Wen Record
Special Thanks to:
Gao Xiaolong & Our Apple G3 Computer



# 北京新声


**主编＋设计**
欧宁
**撰稿**
颜峻
**摄影**
聂筝
**助理设计**
陈勇
任丽
**特约撰稿**
凌云
**特约摄影**
宋晓辉
高原
石虎
孟威威
何嵘
萧全
时晓凡
曹谦
刘惠帆
**特约艺术家**
马六明
钟飙
迟起春
宋永红
洪磊
樱子
**责任编辑**
萧元
**企划制作**
典中原声企划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西湖花园西景阁6B (518001)
电话:0755-5593971
传真:0755-5566142
电邮:szsonic@public.szptt.net .cn
网址:http://www.sonichina.com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省长沙市
银盆南路67号(410006)
电话:0731-8882784
传真:0731-8883393
**感谢**
李劲松
詹华
傅冲
沈黎晖
牛佳伟
袁涛
郝舫
张德生
陈启雄
栗宪庭
岛子
陶然
待秋
新蜂音乐
摩登天空
红星生产社
滚石国际
京文唱片
**特别感谢**
高小龙以及我们的G3电脑


## B



## B1



## B2



## B3

# 目录
# contents

（底图："Beijing Scene"上刊登的英文北京地图）

## A1



## A2



## B4



##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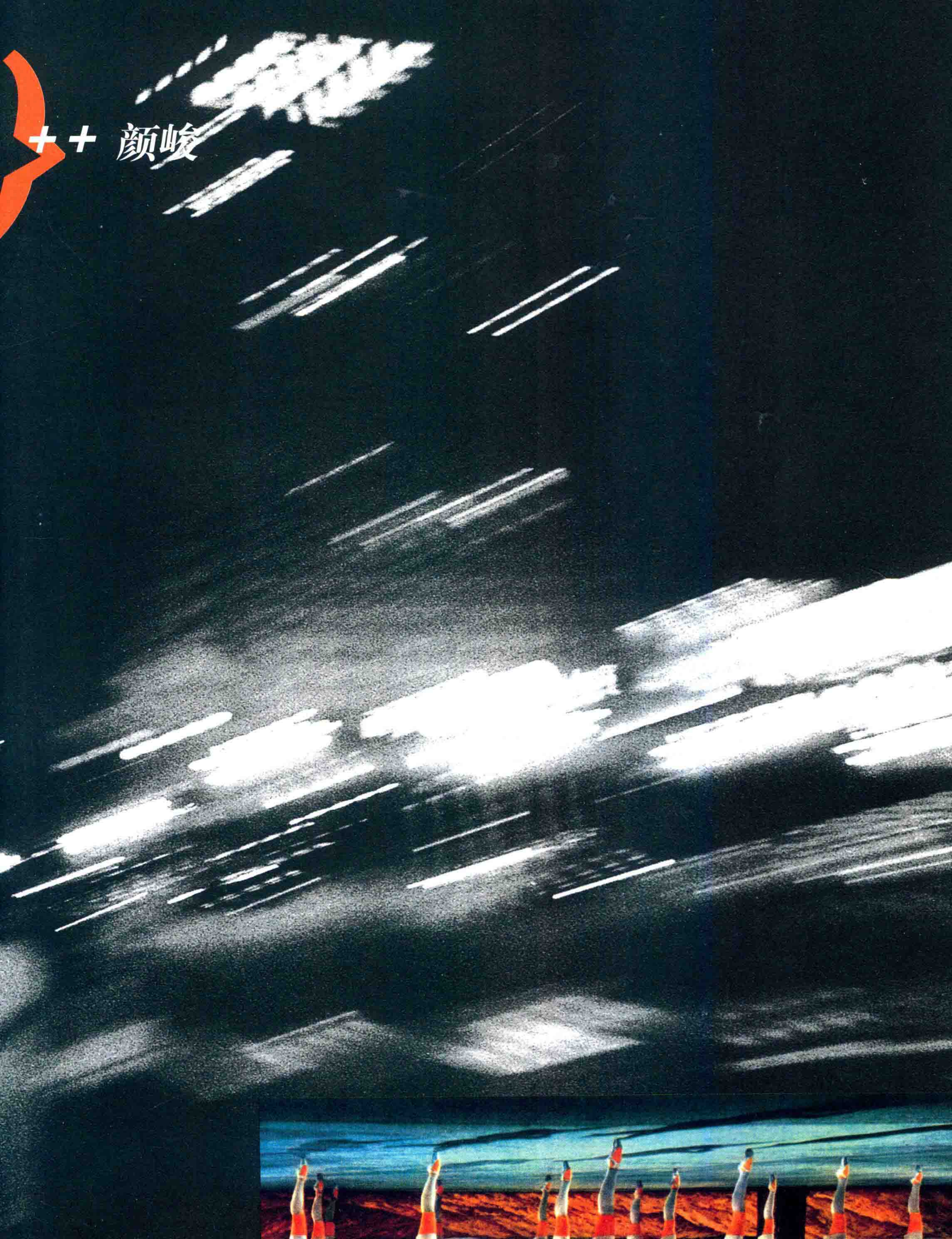
## D

**关于《北京新声》**+ 早在九十年代初，“新音乐的春天”便已被预言。但音乐的脚步似乎落后于唱片业者的计算，中国的摇滚乐虽然经历了发轫时期的一枝独秀，也曾给予第二代乐队短暂的荣誉，但只有当数以千吨计的打口唱片喂大了新一代的音乐人口，当更多的莽撞少年勇敢地操起吉他，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当大多数成名摇滚乐队沉沦不起的时候，新一代的音乐虫子正忙于消化各种各样的音乐资源，他们无孔不入，贪婪又偏执。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摇身变成了靠三个和弦打天下的朋克吉他手、电子音乐怪杰、噪音实验家、地下音乐编辑、另类DJ、愤怒乐评人和音乐网页上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有的还打入唱片工业内部，成为品位刁钻的企宣或独立厂牌的梦想者。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加普及化的音乐文化运动从北京发出了它的呼叫。+ 这时候，中国正逐步地实现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新生活在媒体和群众的欢呼中豁然展开，国际互联网为音乐资讯的流播架设了更方便快捷的通路，从事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历尽千辛万苦，它有了更好的条件。因此，大量的乐队不断涌现，他们抛弃了上一辈乐手的陈规陋习，以更贴近时代的形式，为音乐带来新的面貌。+ 北京，一直是摇滚狂飙运动的中心。它以八十年代的人文热情和批判精神孕育了第一代的摇滚艺术家，今天，它更以九十年代的全球资讯和摩登生活为新朋克、清新吉他流行乐和电子乐提供舞台。大批有志青年从各地应召而来，与北京土生土长的音乐新人类一起，为乐队文化贴上时代的标签。+ 我们称之为“北京新声”的这种音乐文化现象，从人群构成来说，它主要分为乐手和音乐群众两类人，他们大多数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都是听打口唱片长大的一代人，耳历比上一辈人丰富，兴趣也比上一辈人广泛，音乐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种爱好，并不能代表生活的全部，他们也不会用抽象的理想把自己架空于现实之上；从音乐风格来说，它融合了流行朋克、地下朋克、清新吉他音乐、噪音流行乐和实验电子乐等多种音乐元素，不再囿于民族音乐世界化的痛苦思索而直接进入国际主义的音乐语境；从音乐内容来说，它从真实的生活出发，表达出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和合理享乐的主张；从形成原因来说，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产物。+“北京新声”这一概念曾经被乐评界抢先引用。《北京新声》是一本对这个概念进行文字探讨和进行视觉注解的实验出版物，也是我们对北京呼叫作出的记录和回应。我们1997年6月开始策划此书。当时我正在为香港《号外》杂志撰写“Noise China”的专栏，以《新声记》为题介绍了一系列的北京新乐队，我萌发了出一本书的念头：它将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摇滚音乐作出观察和评注，它将探讨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一代人成长的影响，它的文字将打乱传统写作的套路，它的文体将无法归类，它的编辑手法可能完全不守范例，它的图片将按照新的美学标准去拍摄，它还将召集别的领域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最后，经过极富形式感的平面设计和考究的印刷制作，它将成为一本前所未有的有趣读本。+《北京新声》最初的计划是一本自资出版物。1997年8月，我约请颜峻一同前往北京，与摄影师聂筝会合，开始了对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子曰、鲍家街43号和张浅潜等五个乐队的采访和拍摄工作。一年半之后，《北京新声》的想法很幸运地得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萧元先生的支持，于是我和颜峻再度前往北京，与聂筝一起，补拍和采访了后来出现的清醒、超级市

场、新裤子、花儿和秋天的虫子等五个乐队。前期的准备工作虽然琐碎但却很有意思：我们辗转于京城各处，跟踪乐手们的日常生活，拜访他们的家庭，收集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和各种手稿、涂鸦作品，观看各种演出，拍摄胡同里的景观，记录首都热火朝天的生活。最后，当我收到颜峻的文字和聂筝的图片时，我发现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北京新声》的主体文字《北京：肉体与激情》包含了二十三篇各自独立的短篇文稿，全部由颜峻执笔，里面有犀利的剖析，也有意识流般的记述；有对人对事的模糊印象，也有个人情绪的喷发；有公共的话题，也有私密的隐语；有梦呓，也有酒后的笔误；有写不下去的残篇，也有本要弃之纸篓的废稿……这些文字试图解除读者的智慧，打消读者寻找隐义的意图，而只是让词语和句子的奇妙搭配，为阅读带来单纯的快感。我私底下认为，这是颜峻所有文字作品中最好的东西，它体现了颜峻作为诗人、小说练习者、网虫和乐评家的综合才情。+ 聂筝的图片也符合我的期待。他为各个乐队拍摄了漂亮的造型照片，在构图上打破了传统的框框，对乐手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准确的捕捉。最有意思的是他抓拍的一些北京的生活片断，例如鼓楼集市里热气腾腾的油锅，隆福寺附近拆迁现场奔跑的小孩，什刹海胡同的门洞中纳凉的中年男人等等，为《北京新声》这本书提供了活生生的城市人文写照。+ 为了对九十年代的音乐文化生态有更完整的呈现，我们又约请凌云撰写了一篇《北京故事》，讲述他作为一个爱乐者和音乐媒体人在北京漂泊的故事。另外，我们还请待秋从大中国BBS上下载了一段由"打口青年"自述的网络文本，那弥漫着伤感的字句，代表着一代人的情愫："喔，原来，我们早已把自己的青春打上了口，这是我们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的打口时代。"+ 在开始进行平面设计之前，我除了拥有以上图文资料外，还收集了不少其他摄影师和艺术家的作品，它们都与北京这个主题有关。对所有这些素材的编排，我基本上按照拼贴的手法进行：就像创作一首电子音乐作品一样，在设计好基本的节奏走向之后，我会随意在一些地方加上声响的采样，在另一些地方加上反复的效果，所有的素材都按照一种偶然性互相穿插，让它们编织扣合出新的可能。在《北京新声》这本书中，没有传统的章节概念，没有先后顺序，但全书的脉络，我们还是在目录中作出了提示（这个目录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它只是一份文字原材料的清单，内文的排列并不依循它的顺序）。+ 在平面设计上，《北京新声》追求的是简单的美学和页面的张力。为了凸现人物的形象和保持摄影原作的风格，我很少使用Photoshop的特殊效果对图片进行处理，也很少对图片进行切割和叠加；一些装饰性的线条和元素被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满页图片和空白留位很多，它可以用来表现不同页面之间牵制的力度。《北京新声》的文字，不仅用来阅读，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设计元素，它的字体和排法都关乎整体的效果。中文字体，我偏爱使用经典的宋体；英文字体，我主要使用Arbitrary系列的字体，它的字母笔画美丽得无可挑剔。用色方面，《北京新声》糅合了我对Neville Brody色彩体系的研究以及我在潘家园逛古旧书刊市场所获得的灵感，它是靡烂的，同时又是革命的。纸材运用和印刷工艺方面，我喜欢使用吸墨较重的、非滑面的纸张，它们和色彩的碰撞有一个和解的过程，能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微妙渗透……+欧宁+1999年6月于深圳（底图：1997年8月我的记事本）




东单。恍惚的、清凉的、没有尽头的北京之夜。（聂筝摄）


++ 颜峻




开放之门。油画，73cm × 54cm，钟飙作品



# 社会、青春、传统及其他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值得记住的摇滚乐唱片都在给人以这样的错觉：从崔健到汪峰，每个摇滚乐手都在严肃地思考，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在北方式的痛苦中铸成了横冲直撞的大锤——它被挥舞出去的时候，听者无不壮烈地倒下，但如果扛着它散步、恋爱、打球，则又何其沉重乃尔。

《鲍家街43号》的出版同样加深了这悲剧效果，在自由短缺、道德有力的环境中，中国摇滚乐的优秀分子在北京遭遇了现实，八十年代由朦胧诗派和人文学者展开的悲悯情怀宿命般地潜伏下来，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快车上不时爆发出来。无论庞大的社会命题还是一己之悲，都难免"关怀"二字，而我们知道这关怀几乎是被迫的，"现实是个笼子，我像一只小鸟"，正如自发的诗人需要用失恋来折磨一样，他们所承受的矛盾从价值观到物价，从权力到资讯，从漏洞百出的市政管理到东方式的性爱，无不催生着刀锋上的命运。

而经济在顺利地解构一切，鲍家街43号成了稀有的思想者。这个名字不会是最后的理想主义孤岛，但也不会在与时代的斗争中取胜。他们的主要创作者，主唱汪峰秉承了学院青年的二元论美德，而其他成员也并未获得一种热情游戏的波普灵感，当这个国家更多的青年被不均衡的地域经济发展划分到不同的世界时，他们突然发现，为民众而歌的嗓子正在开始被民众的耳朵拒绝，人们顾不上关心别的，倘若要戳开新生活来质问真相的话，这并不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愿意直面的。在《李建国》另一个不便发表的版本中，鲍家街 43 号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歌曲做了概括的拼贴，从《红色娘子军军歌》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光之水洗刷着中国，但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提醒，又有哪一个李建国会同意自己是有昨天的人呢？李建国选择了遗忘，麦田守望者选择了没有理由的舒畅，只剩下鲍家街 43 号和其他乐意读书的青年在追问："我们该做什么，难道还是这样继续？"

这种过于急切的发言很快就遭到另一股音乐势力的颠覆，如果说鲍家街43号刻画了这个时代被伤害的理想，那么地下婴儿想必就是踩着这理想的遗体将舞台占领。同样源自西方的音乐中，New Punk·Blues 收获了更多的信任，下岗职工可能不会欣赏 Robert Plant 式的底层情感，而二十上下的城市少年却莫不拥有单纯的冲动，"现在这世上比较乱，到处是混子王八蛋"，而"我们"，这些在婚姻的城外奔波，与经理和制度擦肩而过的人们则只有四处逃窜。唉，我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用思考和感觉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去学习生活，你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社会，前者沾染了过多学术味道，设身处地的第一人称也改变不了；后者则主动画地为牢，只代表那群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的同伙。但如果说有谁认识了社会的话，恐怕倒是地下婴儿看到了简单的真相。社会不要深刻，自私反而真实，透过他们的疲倦、冰凉的肉体，透过没有思想的姑娘和孤傲的反崇高，你不得不承认商业广告和道德家同样善于编织猎网。欣欣向荣的地面上，个人主义者所能感受到的美好要么被众人唾弃，要么又被人当做护身的光环和表达的霸权；你不得不承认弱势群体的悲哀，还有中国特产的压抑——它来自从意识形态到家庭生活对自由的围剿；为了不让你胆战心惊，地下婴儿终于又向你发出了挑衅。是的，在这里，和他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正是最大的挑衅么？当鲍家街 43 号唱起"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还能做什么"时，这句话还只是个标题， 而正文就藏在地下婴儿全部的言行之中。





P012 左下：七十年代出版的日文版《红色娘子军》明信片；P013 上：高伟（高幸）（聂筝摄）；下：汪峰（宋晓辉摄）




1996年《中国·II》把地下婴儿夹杂在各色新音乐中推出地面，但又迅速招致了集体的失败。人们似乎并没有在意这几个在新世界面前缺乏热情的离心分子，只有一篇乐评引用他们的歌词给了这张合辑以无情痛击：我脑子乱了，我浑身发热…… 都是一个样！这倒是很准确，时代正在对肉身的人进行最后一场侵略，在麻木之前，他还有机会挥起吉他，做两败俱伤的解构。尽管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北京的局部冲突，但，小说家残雪说得好——灵魂如果不是偶尔出窍的话，我们又怎么看得见它呢？不知不觉地，地下婴儿竟然也成了被伤害者的代言人。这未必是他们的初衷，至少我们还可以用热血喷溅的音色，无牵无挂的节奏来超越男青年的悲观主义，就像信仰一样，经过伪装的青春仍在指挥这一代人成长，甚至战斗。

不过，要说到青春，我们其实可以回忆起一位以民族命运为业的素食主义者，他说，中国人是没有青春的。不幸的是这句话像咒语一样，或多或少地修饰了中国人的新音乐。拿麦田守望者来对照地下婴儿，后者未免像患了忧郁症兼偏执狂的刺猬；但前者自身，却又不能逃脱拒绝成长的自恋症。

青春像一场大病，滋养了地球上生息的歌者，在麦田守望者出道之前，却几乎没有人能享受它的低烧、幻觉、热泪和情欲，在信仰或金钱的打击下，青春不堪重负，除去校园民谣的贫血症，就是并发社会矛盾的心绞痛。地下婴儿唱着一代人的歌，也就被一代人的愤懑所拖累；正如崔健被那一代失落者所瓜分一样，地下婴儿眼中的姑娘也是更多人赖以果腹的坚果。只有麦田守望者通过与世隔绝来捍卫无辜的黄金岁月，尽管岁月不饶人，可是绿野仙踪还那么纯净，这个不存在的去处是失去青春的年轻人惟一的乐园，只有在这儿，他们才能逃脱社会角色的追捕和历史语境的网罗。麦田里的反抗是戏谑的《顶嘴》，是卡通化的“打打打打打大闹天宫”。悬崖是有的，只要你别掉下去变成了成年人；斗争也是有的，只要你别弄假成真。麦田守望者如同一杯散发着青草气味的金酒，没有杂质，没有乡愁，在幻觉解除之前，饮者当然是自由的。从理论上讲，青春可以是一切的理由，它创造想象，牺牲，挥霍，但麦田守望者的漫游却是那么有限，它的疆界之外，铺陈了劳累和奋斗，缺失着纯洁和天真……

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从酒吧打车回家，抽着剩下的烟来盘算人生。音乐在群众中不尴不尬，听觉习惯和生活方式指证着北京数以千计的从业人员的高蹈，子曰也因此躲进小楼不事张扬。他们埋伏起来，选择了麦田守望者荒废掉的一块阴曹地府，随时准备着含沙而出，射影路人。这两支乐队有同样的夸张秉赋，在幻觉中却又分裂为背道而驰的神话，歌声响起的时候，一个取道生命去华山论剑，另一个则途经人性到街角磨刀，两队人马同样虚幻而令人觉得似曾相识，这就让人想起了中国另类古典文学将奇幻与怪诞熔为一炉的传统。谁要是对年轻人的血统产生怀疑，就让一位戒了烟的乐评人来说吧——那准是故意的无知，有意的无耻。想想看，《山海经》和《聊斋志异》惹恼了多少睁眼瞎？

翻阅麦田守望者“西化”的歌声，循着苏俄革命史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路标，我们最终得到了集体观念、桃花源文明公约、文士的趣味主义以及可以调和的代沟。这一大锅草药熬出的是本分做人、放肆幻想的矛盾体。是老百姓的孩子，就不会真的跟老百姓过不去，倘若市声过于喧嚣，就尽管佯狂买醉，潜心于被传颂已久的空想。当然，戴上“戏曲摇滚”的帽子后，子曰却面临着被老北京驱逐出城的



左上：七十年代北京市西城区宏庙小学制作的教学幻灯片；右下：麦田守望者乐队（聂筝摄）




在北京。油画，130cm × 97cm，钟飙作品





危险，中庸和谐的民乐经过电的改装，已然跃入方士、妖道　、预言家、伪书作者那个隐秘世界，竹林七贤的恶毒与农民起义军军师的智慧是多么令人不安！“是谁能穿透谁的身体，又是谁在让谁发出响声。我想到光的深处，那里可有风吗？”子曰暧昧的抒情其实也要经过先贤的盘剥、文明的宠幸，到我们耳中，是一段重组了的颠倒梦想、委婉情歌。传统是道德，是故事，是情趣，是亲人，惟独不是拿来反对的标靶，在麦田守望者和子曰这两个方向上，它已经尽力而为，让吞食汉语长大的人们活到了现在。

子曰这一剂慢性毒药，不仅迷住了爱好干净的崔健，也酝酿出钻心搗肚的声音美学，它是诱发各种文化炸弹的引线，想必，也要听者的自我予以呼应。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更加自我的张浅潜。这女子与世无争，其实又自编了尚待破译的社会科学辞典，只是她咿咿呀呀的声音太没有逻辑，除了各自的肉体，我们找不到通往她灵魂的路径。这声音之所以显得陌生，也正是因为它有太熟悉的出发点。

张浅潜在整个中土音乐场景中的特立独行远远超出了子曰，后者不过是善于拆解和重塑，她却干脆独享了一套语言。弹唱版本的张浅潜同张亚东制作版本的张浅潜相互掩盖，为常识提供了新的迷雾，也为由金武林发轫的潜意识之旅添加了风景。如果不算上陈劲、超载的呓语，也就只有泥牛入海的金武林、知白守黑的子曰和自说自话的张浅潜了吧。她的性别角色则又暗示我们生命哲学超越理念的可能性，通过确立自己的语言符号和形式感，张浅潜拒绝了主流的、男性化和体制化的表达方式，这算得上实现了她对性别划分的抗衡，也是今天文化权力重新分布的小小标志——非理性重获舞台，沉默的形式主义开口说话，未成体系的财富开始被开掘……

在另一个层面上，张浅潜把占山为王的新音乐又拓展到了游吟或者说精神的领域。她代表不了任何群体，也不属于“流浪歌手”，只有生命的绽放与腐败，时间的向度与强度，情感的心理学和现实经验的学术意味。这独立成章的女人也会唱“我渴望融化在你身上”和“宝贝我不愿说 Bye Bye ”，但强烈的爱火烧得微慢、疏离，更像是精神漫游中的焦渴挣扎。这种自发的生命意识已将个人的悲伤、热情、怨怼悄悄包扎起来，从而偏移了歌曲也告别了环境，显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将她梳理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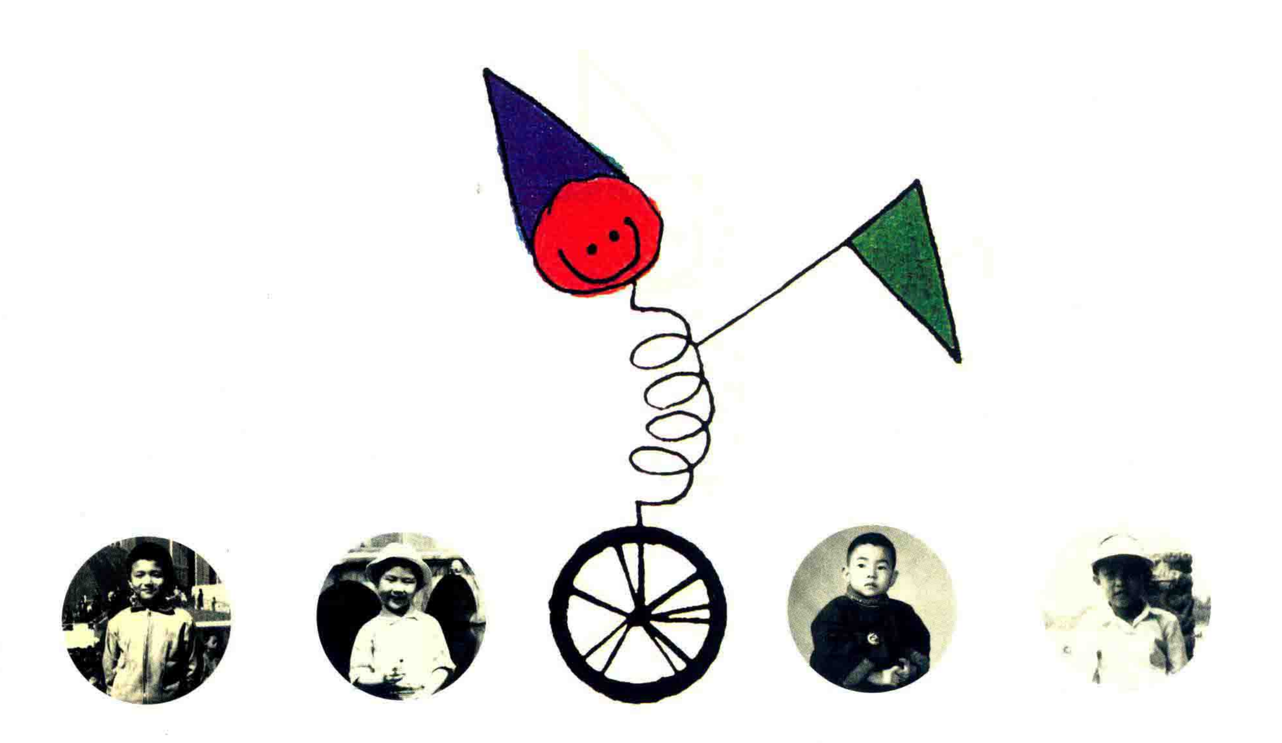
假如一定要从文化这个大而无当的高度评说音乐，我们只好说：歌唱始于压力，终于自由，存活于无所不在的误读。只有那些歌者自己知道，音乐不但不可救药地置换了他们的生活，更宿命般地浓缩着世界……



左上：秋野（聂筝摄）；右下：张浅潜（聂筝摄）；右上图：取自《绘图儿童新尺牍》




麦当娜与贝隆夫人。油画，130cm × 97cm，钟飙作品



萧玮、刘恩、苏阳、董瑞铮（左起）的童年



绿野依旧，仙踪已无迹可寻。麦田守望者在去往乌托邦的路上。（高原摄）

# The Catchers in The Rye



## 麦田守望者

好端端地快乐着，却突然被命名为 New Punk 和 Brit-Pop ，麦田守望者像遇见了强迫症患者的卡通兔子，他们出名了。

他们的资讯还没发达到随时 Copy 英国人想法的程度，那没心没肺的快乐、没有后果的无聊、朝气蓬勃的乌托邦主义和必将失去的敏感是 Copy 不来的。如果不是几年来首都经济文化甚至生活方式的迅速国际化，这几个前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恐怕享受不到被传统抛弃的自由， 四十年前王蒙在《青春万岁》中歌唱过的世界一下子新鲜起来。"让一切都来吧，让一切都去吧。"麦田守望者在"新音乐回归校园行动"中唤来了更多"没有主张"也"不需要理由"的同路人，接下来诸多成功的 Party 证明，曼彻斯特也罢，北京也罢，开心的游戏和轻松的生活不仅是必需的，也是漫山遍野而来了的。

主唱萧玮和吉他刘恩是主要的创作者。基于良好的健康状况，他们没有写下 Brett Anderson 那种充满骨感好似沉疴不起的青春之歌，哼哼哈哈的英国嗓子和清新活跃的噪音吉他已经献身朝阳，即使在大街上，也能像青年突击队一样大声说笑又不攻击路人。是的，加上二十八岁的鼓手苏阳和《卫斯理全集》的渴望者——贝司手董瑞铮，这四个人相貌平常，衣着市民，在整个伟大青春的队伍里，怎么看都不是旗手和另类。他们的勇气只效忠于迎面而来的彩虹，"我愿做牺牲，以我的年轻，这里实在太乱择也择不清，我抛开那欲望，你抛开那牵挂，让一切都去吧。"仿佛鲜血在社区也能化做浪漫主义口哨，麦田守望者隐身于青春的大队人马中，又来到 Party 上聚众喝彩、大呼小叫，他们轻易地孤立了被仇恨和责任折磨着的长发男人——刘恩得意地说："思考的人没有灵感，不思考的人才有灵感呢。我们都不怎么思考，音乐该从经验中来，因为过程是最重要的。"

因为身材瘦小，外号"大乐"的董瑞铮总是被各式朋友捏住脖子取笑，当然他也乐于参加到这欢笑的行动中去："你瞧瞧，我这模样能戏果吗？"但需要说明的是，大乐身上的红袜子、红腰带让某种程度的民族文化伴随着他的本命年，看过了尼采、萨特的他正在迷恋斯蒂芬·金和卫斯理，没心没肺的浪漫主义骑士，其实又是个二十四岁的成熟男子，正如大乐的诚实和苦恼要用快乐行动加以掩饰，整个麦田守望者也必须忍受某种不可深究的自我对立。尽管他们已经在英国制造的标签下酿好了中国新生代的热情，但理当老谋深算的年龄却和新鲜、激动、积极的迷茫不太相称。"初衷不能改变……现实是在变化，可我没必要想它。"刘恩宁肯浸泡在"直接、有力，但不太简单"的声音里终此一生，也懒得去了解什么社会问题和政治。是的，社会和政治要比时光更宽容一些，当苏阳替他们承认三年前的作品"有点假快乐"时，悲观主义者们马上可以担忧了——当他们不再年轻，又可以将什么牺牲呢？

而他们早已时刻准备着，"总是梦中麦田，守着第一片金黄，丧失我的理想，让生命把它埋葬"。

The Catchers in The Rye



右上、左下：麦田守望者乐队（高原摄）


021



他们►

P021、P022：三无。迟起春作品



1997 年上半年因翻唱 The Cure 作品而红遍北京各酒吧的毛毛虫大乐队。
这是傅冲的主意，是眼镜蛇和麦田守望者两支联合乐队的业余生活。
左起：萧楠、虞进、王晓芳、傅冲、苏阳、萧玮、董瑞铮、林雪。（聂筝摄）



他们是鲍家街 43 号、子曰、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张浅潜。四支乐队，一个歌手。这并不意味他们就不是崔健、 Kurt Cobain 、法理、红桃五、神经、 400X 、苍蝇、宝罗、大侠沉睡、阴魂不散的 Alan Ginsberg 、姜昆、金星、魏野还有黄金时代的王二和卖打口磁带的王晓峰，他们还可以是更多，北京这只越摊越大的煎饼摊到哪里，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写到哪里。他们是白石桥路上的国产压路机，是洒满热血和大便的旗帜，是高压线上一群受惊的麻雀，是二楼阳台上一个半透明的白日梦，是永远到不了的远方。在是与不是纠缠不清的北京之夏，他们首先是一些声音。

十年来北京摇滚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摇滚的代名词。在这个连 Metal 都算另类的国度里，人们发明了“新音乐”一词来收容一切不能见容于主流音乐的声音，顺便让被“摇滚”吓住了的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听得舒服些。然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新音乐”又开始以某种精神上的闲适来完成从摇滚阵营的出走，痛苦正在缩水，天地开始广阔，北京不仅保持着它的中心地位，而且通过文艺马戏、资讯洪水和物质奇遇的发达超越了早期的摇滚愤怒。这下好了，他们一夜间变成了各地穷苦音乐人准备推翻的一座大山；或许相对的自由和富足并不是北京人的过错？

值得庆幸的是，那种拿腔拿调，用京油子发音唱歌的人正在遭到唾弃，世界和平依然有人关注，经过伪装的情书和狂人日记也依然被贴上种种标签招摇过市，但这些已经和文学热一样要退休了。数百支乐队和更多的乐队名字在大小酒吧出没，老百姓已经懒得去猜他们的性别了，据说，著名的大西俱乐部（Shadow）干脆就是双榆树居民委员会的财产。资本主义买办和不洗头的死硬分子勾肩搭背，明枪暗箭，逍遥派则乘机垦荒播种，越来越多的个人主义者毁掉《光荣与梦想》《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和爱情诗手抄本，写下了自产的压抑与快感——就像正在被普遍歌唱的性一样，他们总算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世界了，这倒真不容易。

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样一种声音：因为受尽委屈的报纸编辑和音乐从业人员改善了生活，对反叛者的宗教崇拜已经烟消云散，也许狂热还残存在某些外地乐手堆满方便面纸箱的地下室里，但“这些声音”已经单纯得多了，它是另一个噩梦，来自影响的焦虑，从善于偷梁换柱改弦更张的王迪到一不小心模仿了名人的周韧，总会有人及时地揭露并指证其内部的空虚，但是看来，“这些声音”正在利用最基本的表达冲动来反抗形式——用鲍家街 43 号的中和、张浅潜的本能、子曰的创造和麦田守望者与地下婴儿的换心术。这声音还传达着更多的信息，但无非是肉体与幻想各行其是、极权和青春相提并论、文化兼人性共治一炉的此时此地，如你所知，它是一台时空穿梭机的轰鸣声，是鸡尾酒的搅拌声。命运已经归还了个人，他们其实也早就不是他们了，除非算上微妙的水土因素，他们才又汇入一群，不能幸免于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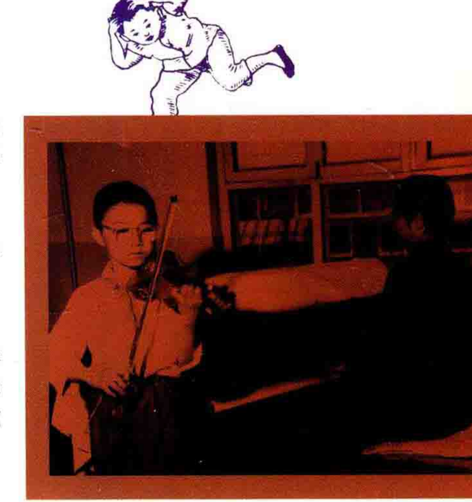
从年龄上看，他们中既有计划经济时代遗传下来的唐·吉诃德，也有Internet哺育的国际泼皮；从出身来看，他们分别是饱读诗书的儒生、浪迹天涯的城市土拨鼠、市民之家的好少年、学校的受害者以及八面玲珑的地头蛇。这样实在太乱择也择不清，倘若金木水火土地分个类出来，显然会惨遭事实的耻笑。

众所周知的是，没有人会被别人了解，也没有人属于某一类人。探求他们的真面目，无异于自蔽其目。不如退而求其次，来背诵他们的生辰八字、宠物姓名、桃色秘史、身高体重?

让我来试着说说。

鲍家街43号，主唱汪峰，自幼聪慧，家人宠爱有加，无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十岁早恋失败，终日所思无非人生苦短悲欢易逝，复又苦练梵婀玲。誓将残生付诸五音。某夜神人授梦，云汝命系草根，何不引车卖浆，学那罗克罗尔乐，以红尘肉身搏天地大道？遂出象牙塔，操六弦琴，彻夜垂涕于立交桥下，吟啸在疯狂边缘。或曰，是人也，书生意气，市井之言……

罢罢罢，不说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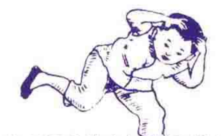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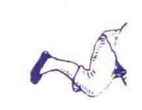
 1980年，过早戴上远视眼镜的好孩子汪峰和他的母亲。（由汪峰提供）



从年龄上看，并不能解释他们的音乐。麦田守望者在二十四岁到二十八岁之间，却依然朝气可人，充满空想的快感；同样年龄的鲍家街 43 号却难免忧心忡忡，被理想







压得失眠。我们必须也同样生活在那个城市，才能顺利地靠近他们并被他们歌唱。

他们是眼界无穷世界宽的北京人。影响中国的人和事和这些群众演员一起被历史书写，媒体上的文艺神话、权力话语不过是他们的家长里短，当北京以近乎垄断的引力将爱好自由或渴望投机的优秀分子收容的时候，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同样丰盛的交流和鉴赏空间。在这个城市，国家大事以耳语的形式在街巷间流传，短短的八年时间，沉默的热情就成功地转会到了个人生活的绿茵场上，权力在空中飘荡并不时击打着肩膀，但经济的消解能力实在惊人——他们得到暗示，可以通过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来发泄以往危险的使命感。在祖国各地，某个庞大的阴谋几乎已经派暴发户和文艺官员腐化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北京，这里却储藏着成千上万的雅皮和学者和疯艺术家。他们是拥有自尊的北京人。他们是拥有机会的北京人。他们是最后的享受着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中心地位的北京人。倘若海水上涨，一位诗歌领袖说，就让它淹没其他省份吧，让北京还带着恢弘的诗意与世界相望。




她拥有片刻的欢愉和长久的迷惘，笑声擦过水面，变成尖利、非人的精灵之声——她就是张浅潜。（聂筝摄）

她。闯入者。寄宿者。盲流中的幸运儿和群众中的赝品，不到两年的京都生活对张浅潜意味着什么？

和无数背井离乡的精英们一样，她蹭上了首都的便宜也分享着它的烦恼。激动人心的知音和机遇，暗夜中相互安慰的火光，同志和合作者，被称为“氛围”的东西便是她工作的马达。但是更深的孤独却在冬季开放，张浅潜像行尸走肉一般，对大雪和未来都无动于衷；直到春天来临，她还是被内心世界选中的一个漂流者。她说着一种混杂了甘肃定西方言、西宁话、粤语和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这个城市通过人际关系和法规制度、气候、景观来同化她，有时候，那种宽厚、幽默的态度几乎让她相信自己就是个北京人。

如果不看年龄，又怎么能确定他们的身份呢？正如世界的大门要用第一场失恋来打开，歌唱的本质也必须附着在生命之上，年龄当然是音乐的底色。

而张浅潜是第一个设置了障碍的家伙，她的年龄，据称是二十六岁，但两天后又有人说是二十九岁。模糊的年轮上摆放着一卷放弃了的青春，如果不是一首意外的《倒淌河》，没有人会从她难解的美声中听出往事、追忆和对流逝的指控。在这里，只有经历和经历填充着时间，只有经验来取代成长的心情。

而青春的旗帜被麦田守望者插在克里姆林宫，不需要理由也猎猎舞动，他们像拒绝长大的孩子，重复着盲目的勇气，又在音乐中悄悄加上梦幻的复杂性。当这些演变成一种自顾自的舞蹈时，连性都变成了《自私》式的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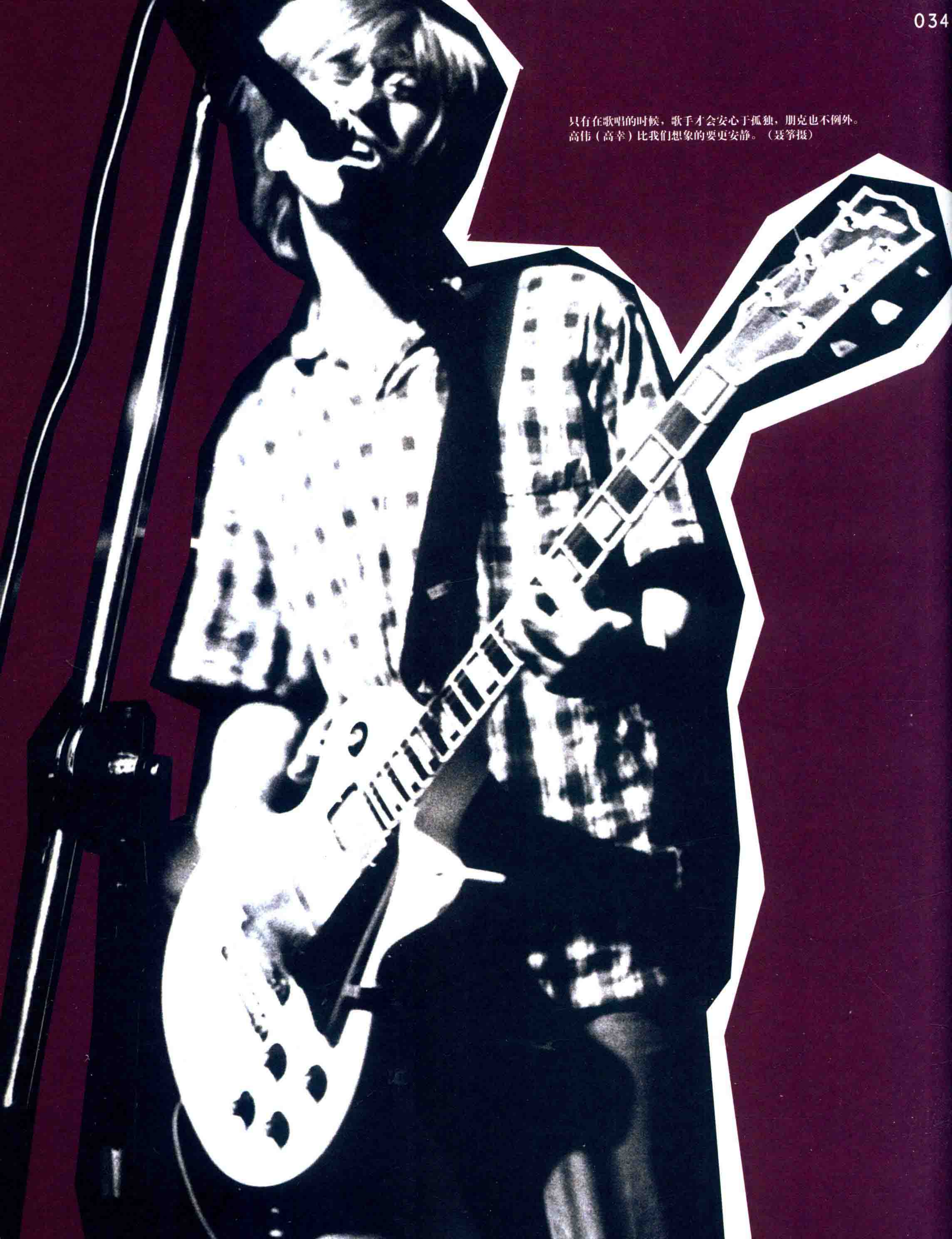
地下婴儿的高伟谈起更年轻的朋克时说："我感觉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他选择了直面现实的形式，唱着新一代遇上的世界，所以也要接受被混为一谈的下场。其实，二十四岁的适龄朋克还有着情感的丰富性和透彻的洞察力。

鲍家街 43 号则要求着时间。思想的路，要走永恒那么长，他们用四年研习了技艺，但还不能像别人那样早早收获。就说《没有人要我》吧，它的紧张恰好倒映着其他作品的中和——那东方式的，尚未把决心进行到底的犹豫。

还有子曰，底层的亲历者和青春的否定者。太大的年龄差距会在工作中弥补，秋野迷恋着形式，因为他年过而立，再也顾不上替下一代人演唱悲伤或狂想了，他要调戏现实。这是成人游戏啊。

看吧，其实没有人不成熟，其实没有人格混乱而碰巧出名的家伙，其实没有不劳而获的行为艺术家。其实，镌刻在琴弦上的诗篇所唱出的，并不只是生命的单薄或经验的沉重，那也是此时此地的单薄、沉重。

地下婴儿乐队。左起：高阳、高伟（高幸）、岳浩昆。（宋晓辉作，取自乐队第一张唱片《觉醒》之插页）
底图：高阳手迹（取自朋克杂志《建设》）



只有在歌唱的时候，歌手才会安心于孤独，朋克也不例外。
高伟（高幸）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安静。（聂筝摄）

# Under-ground Baby

## 地下婴儿

在一首歌里，高伟声称自己是被抛弃的一代，他的弟弟，二十一岁的高阳则带着一脸无所事事致力于简单的鼓上斗争。好在他们的父母懒得到现场观察，否则，“我不能幻想，也没有快乐，丝毫体会不到坚强的生活——我只有音乐”。这简直就是活该被抛弃掉的一代啊。

至于他们是不是只有音乐，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精神分析学者、青少年教育爱好者、外国记者和 Simon Frith 的阅读者各执一词，而来自南昌的极端主义 Punk 乐队盘古则尖锐地指出：“他们太自私了，他们不过是活得太滋润了。”带着剪乱并染色的头发，高氏兄弟骑着摩托车远离了这些讨论，如果你还要不依不饶地纠缠下去，高阳就只好爱理不理地回答：“哪儿剪的？你说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它自个儿就长成这样了。”这是什么话？！听说过 Green Day 和 Sex Pistols 的中文系学生会立刻展示理解—— Punk 是一种态度，在无赖和危险分子的表面下，他们怀着自我牺牲般的反抗精神……可惜高伟自己却否定了理解：“Punk 是精神上的东西，理解是没有用的，它不是生活……八十年代的时候，直接一喊就能表现压抑，可现在的压抑更深了，它不那么容易抓得到，而且——还多了空虚。”这似乎不是一个愤怒青年该说的话，可你觉得他又该说些什么呢？“去你妈的”在一首名为《觉醒》的作品中，地下婴儿的抒情精神和遁世情结破土而出，像清凉的地气一样上升到了脏乱差的 Punk 战场。与其喊打喊杀，还不如让他们懒洋洋地承认“内部的空虚”，高伟的愿望只是：“让我彻底安静，好像社会离我远，不再有语言，也不再有人烟，再让我彻底爆炸。”这样清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地下婴儿在刺猬壳下面埋藏了无奈的热望、简化的真诚，或许还有一部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渺小的个人可以通过 Punk 共济会来“逃出这是非尘俗，免遭一切打击和痛楚”，可是一觉醒来，他们又得振作起精神，用含混的鼻音作一番顽强的争斗。

至于地下婴儿的第三任贝司手岳浩昆是不是也这样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踢足球弄伤了腿。如果说愤怒是一种手段，Punk 是一种音乐，那么热爱旅游的地下婴儿就的确和十七八岁的逃学者不是同一代人，好不容易从几年前过分沉重的想法中返回，高伟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时代。如果说这真是被抛弃的一代，他们至少还可以避免被贫寒和闭塞修理成绝望的一伙。文明社会的选择、混乱，他们已经在首都略享一二了，所以高伟在安静的时候，倒是像一个深夜不眠，看着盗版 VCD，脑子出神的未婚夫。那么高阳呢？他光着膀子坐在鼓后边，本能地拒绝着被大众派来的外地记者。在这间泥泞包围的排练房里，正上演着更年轻的 69 乐队的“文革”新曲，最后，高伟靠在沙发上，向一位留着另类山羊胡须的采访者发问：“你热爱生活吗？”



1997，夏，魔岩排练室，高氏兄弟在离外地记者四米远的地方接受摄像机的骚扰。（聂筝摄）







鼓楼后面自由市场上的油锅。“世事煮沸的肉汤”。（聂筝摄）

038

## 1997 年 7 月 24 日 出汗

狭小闷热的年华酒吧渐渐被圈里人所充满，大家相互点头、握手，乐于请客的会招呼半生不熟的朋友：“你来杯什么？”一个热情的壮汉走来走去，用忠于时代精神的速度轮番使用汉语和英语同所有的熟人交谈，他叫高晓松，正如大家说过的那样，他所领导的校园民谣运动正被新的情感方式否定着，今晚的 Punk Party 无疑也是他某种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但事实往往出乎理论的意料，北京地下 Punk 给了几乎每一个人快乐的机会，高晓松也和别人一样构成着这热烈友好的气氛。一切在调音的时候就已露出端倪——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弄坏了一只音箱，脑浊乐队的主唱对准话筒发出一连串类似公鸡打鸣的声音，但观众却只能听到吉他上迫不及待的三个和弦。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脑浊的每一首作品中都捎带着公鸡的尖叫，用它来取代老一代乐手的吉他 Solo，这真是个不坏的主意。

现场有不少十八九岁的男青年，他们都已经学会了 John Lennon 式的努嘴和眼角上斜，当然还有国际朋克扫弦的姿势，他们总是很及时地为某句不礼貌的歌词欢呼，因为这正是他们乐意表达的。“所有的学校都他妈傻逼！”主唱说。他的伙伴们随即举起了拳头，在如此的狂欢中，谁若是紧皱眉头挑剔他们的幼稚，那他／她也一定显得像个傻逼。

高潮属于一支名为 Pregnant Men 的英国乐队，他们的中文名字叫“急速种子”，后来又改成了“怀胎男人”，从年龄上看，四个小伙子显然没能赶上故乡那场轰轰烈烈的 Punk 运动，不过这没什么，现在仍然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卖力地蹦跳和摇晃，要对得起自己洋溢的荷尔蒙和自由。贝司手，也就是主唱，一次又一次把甩掉的连线插头捡起，插好，并尽量不被鼓、效果器和话筒支架绊倒。吉他手优秀的弹跳能力与年华酒吧低矮的顶棚相映成趣。而鼓手，这架不知疲倦的 Punk 永动机打得坚决而富于活力，以致于很多人只记住了他而忘掉了待成熟的乐队。世界大同的梦想在无政府主义的遗址中小规模实现了，女孩子摇摇晃晃，情人趁机拥吻，坐在地上的男孩子们开心极了——他们滚成一团；除了面无表情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音乐家之外，中外青年们挥霍着同样的无忌热情。

原定的地下婴儿和 69 并没有上场，他们只是聊天，帮助调整设备和鼓掌。而崔健，这位被称为最早引进 Punk 元素的“中国摇滚第一人”除了和一位美女交谈几句外，几乎一直是一言不发的，这里没有崇拜者，他可以安心地等待最后出演的一段 Jam 。高潮过后必有疲惫，年华酒吧难得火爆的生意也接近尾声了，默默登台的几个人或坐或立，玩着类似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但更为从容的即兴游戏。据说这支名目不详的乐队已与崔健的东西公司签约，那位名叫任宇清的贝司手除了手快，更有满腹机智的想象力，他很像一位高校的电脑游戏专家，通过不断晃动肩膀来沉醉于技艺。至于早已不耐烦了的 Punk 爱好者们，台上台下是互不理睬的。

而炎热的首都是如此宽容，它让愤怒和不愤怒的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并在灿烂的灯火中将他们一一熔化。



子曰乐队的三个成员。他们的力量来自胡同。（裴筝摄）

# Zi Yue

## 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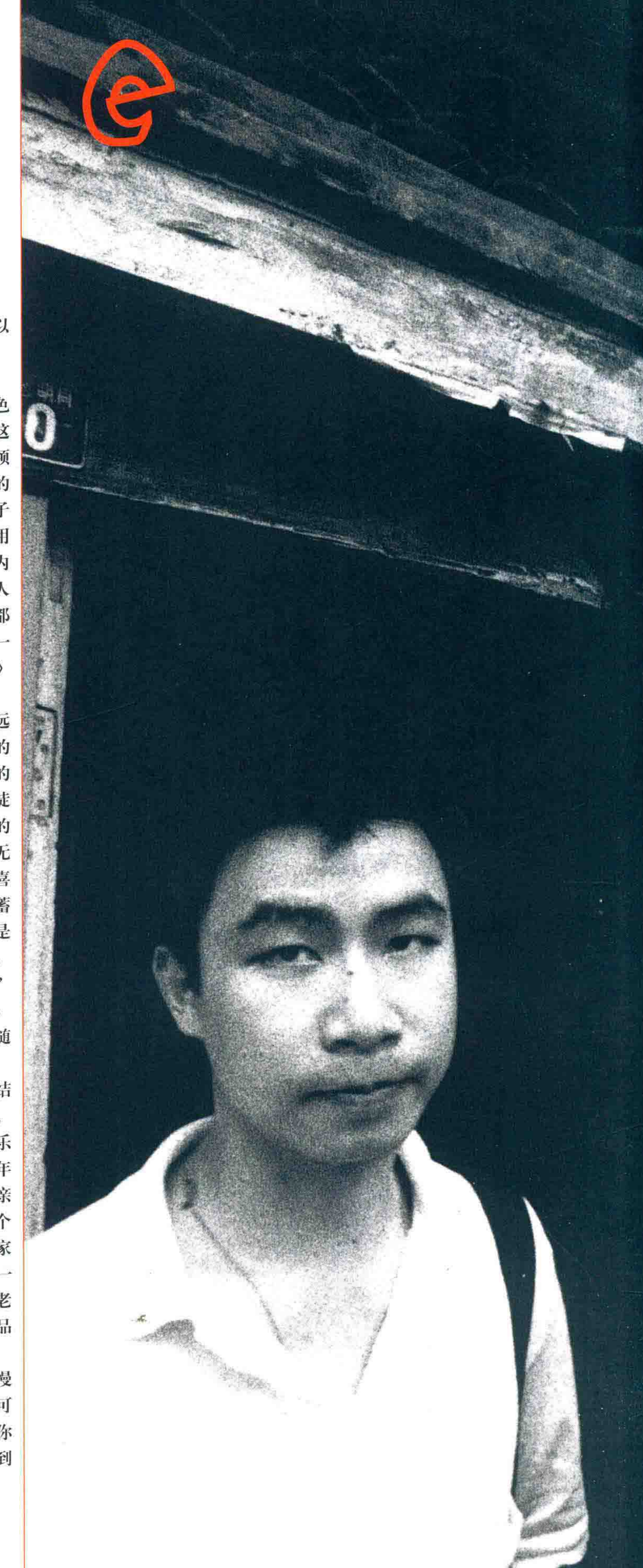
子曰这个名字并非秋野、文霖和张月亲近文化的结果，相反，他们的解释是：“孔子可以说，儿子、孙子也可以说，什么子都可以说。”类似的怪话在北京人口中还很多，但没有人像秋野这样专注地说，甚至说成了一项事业。

在 Primus 和中国戏曲之间，秋野弹着贝司建设着黑色幽默的庙宇，其中时而鬼气森然，时而亲善可掬，他把这种音乐叫做 Punk 。指着毛泽东的画像，秋野还背诵了领袖“敌进我退”的十六字方针。“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 Punk ！”而当代北京的 Punk 则有崔健、苍蝇、 NO 和子曰。这种说法很多人都不能同意，至少它显得有点别有用心－－子曰难以通过审查的歌词就曾被怀疑有过多影射内容。遭到嘲笑总是比对骂要难受得多，无论是枪杀麻雀的人类、老领导、心怀鬼胎的熟人还是不幸庸俗了的女青年，都难免和整个社会一起遭到秋野和子曰的不信任，和他们在一起的人总会突然反省到更深的悲哀，例如萨特在《恶心》里描述过的真理。

在东四大街的白米仓胡同，三十一岁的秋野和他的远亲们住在同一个院里。作为一个搞摇滚的邻居，他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只是屋里满墙的佛和道。患有坐骨神经痛的吉他手文霖可以跟他谈谈佛教，可又有谁见过这样的信徒呢－－佛道不分的秋野自称已通过打坐修习出一个眉心的鼓包，而他的房门上却写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却偏要来，怎样搞的？”“以恶制恶”的音乐理想和“喜欢黑暗的、怪诞的”事物使秋野看起来更像个邪教教主和蓄谋已久的诅咒者，“你拉我一把，我会帮你一下儿，你要是要我，我就跟你死掐！”这尖锐的言词嵌镶在方言、口语、说唱艺术和压扁的嗓子中间，朝着子曰喜爱的“透心凉”的境界射去，他们说：“这是真正的愤怒。”如此看来，“戏曲摇滚”也并不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们随时都可能变成一只披着京腔大鼓的皮的厌世者。

从 1989 年开始，秋野干歌厅、开饭馆、端盘子、结婚，组织羊皮秋野、泥石流、周易等八支乐队，间或醉酒、吹牛、蹲在垃圾桶里给人拍照；当他注意到老百姓对摇滚乐宽容到了“幸灾乐祸，不置可否”的境地时，已是 1996 年 2 月。时年二十三岁的文霖虽说面带儒雅之相，但也已经亲历了大头鞋乐队的聚散。其时，鼓手失踪的子曰由这两个人支撑并拉上舞台，惊动了包括崔健在内的观看者。大家知道，崔健很快与之签下演出经纪约并出任《子曰·第一册》的制作人……后来加入的是白胖而且结实的“摇滚老炮”张月，他曾在石头乐队打鼓，也曾险些成为滥用药品的悲剧人物，他最小，属兔。

这就是子曰，秋野讲个故事，大家就开始敲锣打鼓慢条斯理熔炼愤怒的“ Punk ”。你可以震惊，可以揭露，可以幸灾乐祸不置可否，但是不可以借钱给他们－－还给你的，恐怕又是一首属于债权人的情歌－－子曰：“我直到现在现在还在痴痴地等。”





在白米仓胡同，子曰挡在院子里，
和我们一起消磨午饭与晚餐之间漫长、玄虚的下午。左起文霖 、秋野、张月。（聂筝摄）

042

## 1997年7月26日 幻觉

在一场幻觉中，鲍家街 43 号开始了他们今晚的演出。这是一个被称为“滚轴溜冰”的巨大空间，戴着荧光手镯的女孩们绕着灼热的舞台滑动，但更快滑行的是那些一言不发的少年的身影，他们背着手，像早已冷却的流星，他们在射灯下变得昏暗、模糊，他们是今晚真正的主角。面对着数十名欢呼的观众和一圈圈旋转的滑行者，鲍家街 43 号唱出了民间囚歌以来最现实的句子：“人们要的是钱，是性，是四轮驱动真皮坐椅的轿车……我必须坚强我必须坚强，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荒唐，我必须微笑我必须微笑，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悲伤。”或许他们还必须在孤独中肆意地燃烧下去，因为他们过于清醒，而这个无休无止地旋转的现场却不属于乐队。北京音乐台的著名 DJ 、有待唱片店的老板张有待带来了自己的听众，他们的年龄要比话筒前那个严肃的家伙小一些，他们沉浸在光和速度中，《没有人要我》曾经令人绝望，但此刻却加快了汗水和心跳的节奏。

于是我们终于瞥见了鲍家街 43 号的孤独，这支在地下室排练了四年的乐队不得不从暗夜中获得悲伤和力量，长达十分钟的《夜里》成了这场演出中最震慑人心的作品。倘若你正好从被雨水清洗过的北京之夜步入这欢乐之地，你会首先被一种来自 The Doors 时代的键盘音色所发现，然后是汪峰因清醒而变得疲倦的嗓音的包围，而他们的和声，你知道，那种一以贯之的悲壮情怀在一段段寂静间汹涌起来。被淹没之后，是这恍如隔世的伤痛将你缓缓征服，“夜里，夜里，悲伤的、孤独的夜。一辆辆绝对现实牌汽车擦身而过，轰鸣的排气管敲响了这包装时代的丧钟，我突然被变成商品待价而沽，生命开始枯萎，出卖并且廉价。”假如这哀歌是可以被听见的，那么倾听者也只能分享更深的孤独，那旋涡中心的舞台无法靠近。在那里，只有被热情焚烧着的“迷路的生活”。

除了洗发水广告式的长发，主唱汪峰的另一个特征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大号远视眼镜，但这并不能让他看得更细致些，台下簇拥着的青年和他一起唱开了《晚安，北京》，某些遥远的事物会在一小时之后让他们坠入失眠或沉睡的陷阱，这是不可回避的。因为“风会随子夜的钟声北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旁破碎的轮胎”，除了一遍遍向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祝福晚安，人们似乎真的再没有办法获取安慰。所有的摇滚乐现场都会为参与者提供欢乐，但是鲍家街 43 号又提供了额外的思考，它来自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生活过的人们有权在这里挥舞手臂，晃动现实主义的脑袋，谁让他们拥有呢。就这样，某种共同的需要在演出结束前制造了温暖，当然，更幸福的还是那些不停旋转的年轻的影子，他们的温暖是那么恍惚，仿佛音乐也该是这样：停止歌唱，把悲观主义、偶发的颓废和关于未来的刺激融化在滑轮滚动的快感里，这快感是驶离现实的真正通道。其实，他们和门口聊天的服务生才是鲍家街 43 号真正的听众，因为他们体会孤独的方式就是与孤独同归于尽，变成生活中宁静的碎片。“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




 鲍家街43号，一个被称为“殿堂”的旧院。中央音乐学院在此拥有权力、制度、体系、荣誉、传统与威严。（聂筝摄）

鲍家街 43 号乐队在第二张专辑《风暴来临》内页的群像 。
左起：王磊、汪峰（前）、杜咏（后）、牧阳 、龙隆。（宋晓辉摄）

No.



上、下：鲍家街 43 号乐队在第一张专辑出版时的群像 （石虎摄）




# 43 Baojia Street

## 鲍家街 43 号

对一支摇滚乐队来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毕业于精英院校可能是不幸的，何况还是古典音乐象牙塔——中央音乐学院，他们为什么不去研习诗歌和神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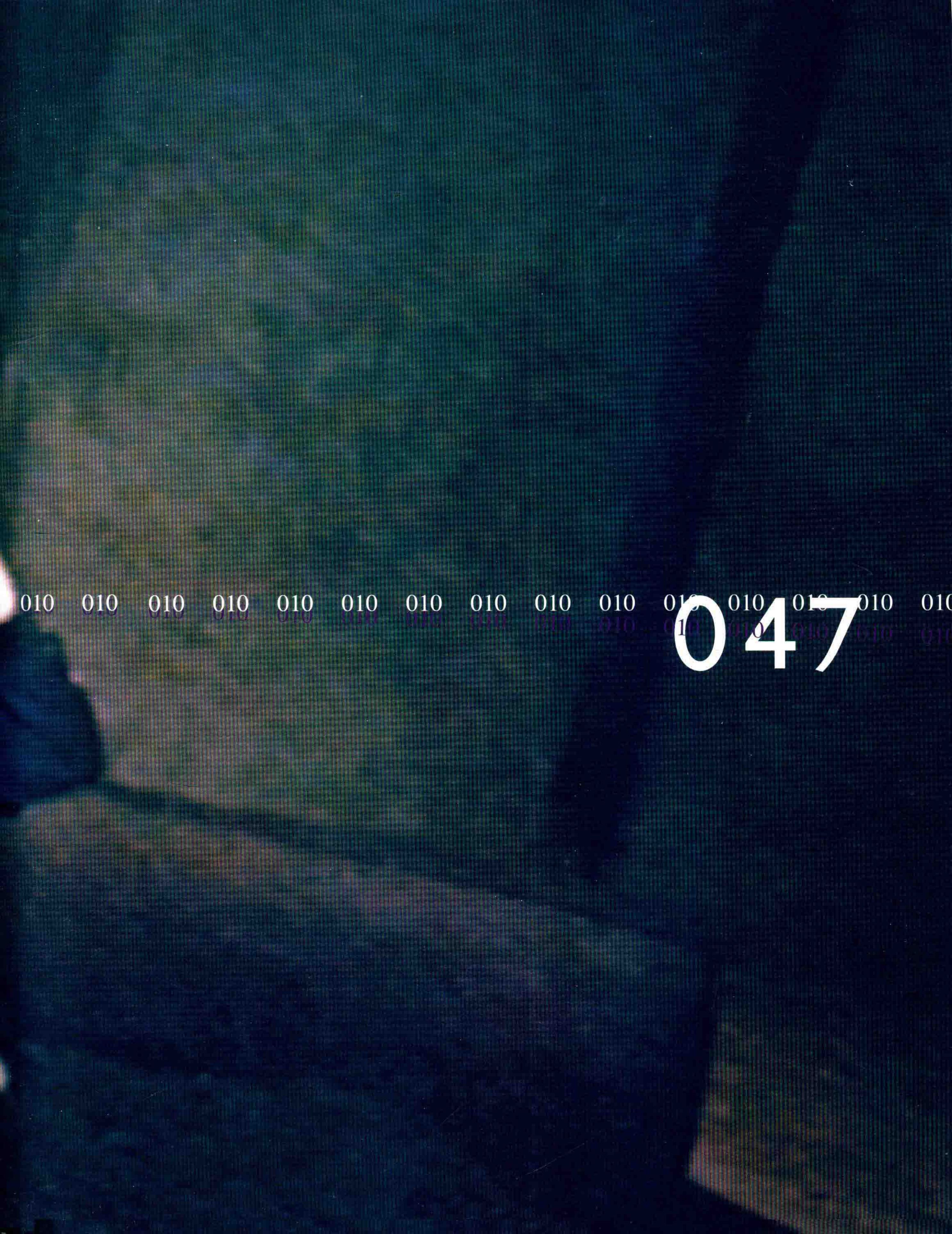
好在我们还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伟大人物的思想是可以落后于时代的，例如，莎士比亚之于文艺复兴，张承志之于商业文明。汪峰写下的每一句歌词，就像他所尊敬的每一位诗人——心脑俱伤的郭路生、迅速燃烧的查海生、垮掉派领袖艾伦·金斯堡，还有劳动者惠特曼——都带着无家可归的理想主义情结。于是鲍家街 43 号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更加悲壮地被新的人性远远抛开，去探索超越时代的伟大。“我深刻的生命为什么要飞？夜鸟睡了，我为什么要飞？”鲍家街 43 号年纪轻轻，就飞过了肉体的疆界，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汪峰是一个有克制能力的人，当然他更以流畅的表达能力闻名于世，交谈之后，有的人考证出酸腐空洞的西西弗神话，于是敬而远之；有的人透视到勇往直前的真理电波，于是反省内心。最后，大家会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人不好玩。或许除了一见倾心的知音，他已经不再轻易谈吐玄机——这就像古代中国的文学工作者而不是开着白色私家车的粗嗓门主唱。是的，除了把眼镜别到后脑勺上的单晓帆，这几个人简直就是时装业和恶作剧俱乐部的灾难，他们排 The Doors 、 Led Zeppelin 的作品，陪伴端庄的女友，失恋，拒绝讴歌“愤怒的白光反射的工商总行”和“建国门儿百万支霓虹灯”，偶尔 Punk 一把，还是《权利属于人民》。如果说背井离乡五年多的山东瘦人王磊是沉默得几近低音，那么胖子龙隆则容易热情得结巴，而杜咏的职业则是教学生作曲，看看这几个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青年吧，他们拥有着与这个行业不相称的好名声。

和同样有着好出身的 Rolling Stones 不一样，鲍家街 43 号的现实主义还带着形而上的书生意气，他们显然没必要去身体力行一个穷孩子无依无靠的 Lo-Fi 生涯，尽管龙隆幸福地宣称“和吉他交流比和媳妇交流得更好”，但他们良好的业务水准还是没能减少精英倾向的口实。现实主义和现实之间的差价给他们带来手提电话和健康身心，早期的 Blues 风格向《鲍家街 43 号》的过渡则抽走了圈中人士的支持。事实上，除去某些大而无当的抽象名词，还有更多危险在拐角处等着他们，当初令人感动的经纪人小伟已离开乐队，平淡的销售额也颇不给面子，一份说河南话的杂志，干脆以纸上谈兵为主题否定了他们的关怀。但是，真的会有谁能妨碍鲍家街 43 号式的自信吗？“远处的山脉插入天空，星星泻入海洋。”平均两周创作一首新歌的眺望者决心知行合一，用劳动来证明激情短命的规律于己无干。倾心于“环境使我变成了什么”以来，鲍家街 43 号不仅更换了鼓手、贝司手，更要投身这个有点陌生的人世；朝鲜菜馆里，有人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喃喃道：“这张专辑里最重要的词就是，经济。”




鲍家街 43 号乐队《错误》Music Video 画面。导演：Rick Widmer 。（刘惠帆摄自电视屏幕）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47

048

## 1997年7月29日 保持联络

晚上，九点二十五分，这位因中暑而变得憔悴的女歌手第二次推开 Keep In Touch 的门。"我去找水喝。"她指着一个方向说。

当然，音响早已调好，张浅潜短暂的失踪也并没有引起顾客的焦急。两个小时以前，这里发生过一起小小的暴力事件，麦田音乐制作公司的企宣傅冲扑向了麦田音乐制作公司的歌手尹吾，酒吧的主人、著名的古筝演奏者和电子乐实验者王勇为此感到恼怒。现在，宾朋满座，他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站在鲜美的啤酒气息中，捕捉着从琴弦、拾音器到调音台、音箱间运行的声响。

见多识广的观众们保持着应有的矜持和礼貌，但你不得不承认，张浅潜发出了他们不太习惯的声音，"啊，佳佳啊佳啊，啊，佳佳啊佳啊"。高高的木椅上这声音从一个自我中跳跃而出，Björk 的自行其是在另一位女性身上变得有点羞涩。那成串奇怪的旋律是被一只舞蹈的舌头唱出来的。也许女性的舞蹈总是带着些自恋色彩，张浅潜很快用声音编织出了与周遭隔绝的世界："我哑着嗓子唱呀唱，不想荒去我的梦想；我飘着长发晃呀晃，不想晃去我的美丽。想到那赤贫的理想被风带去了远方，也不知你有何感想。"而你是来不及感想的，你只听到声音，纤细的，明亮的，突然间展现了幻想和压抑然后高飞而去的声音。她手中是童贞的吉他和弦，口中却有不知多少种因无法回归童贞而游荡的呓语，在《游吟者》的高音上，张浅潜闭起双眼，试图在肉嗓的钢丝绳上舞蹈起来，经过一小节灵魂疼痛的挣扎，她轻易地被声音带走，变成了自由的精灵。

没有人鼓掌，这样的配合助长了张浅潜的独立世界，在倾听的沉默和碰杯声中，她唱："我要的爱比不爱还要孤单。"每两首歌中间都有几句自言自语般的交待，例如"好了，这首歌叫《老东西》，Old Thing"。随之而来的则必定是单薄易碎的分解和弦和甜美的叹息，沉醉的"啦啦啦啦"或者并非来自某个边远民族的悠长假声，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远离了每一个观众的经验。"这里有人就有人的味道，它刺激着我走向更高，从前的一切都飘上了天。天啦，它瓦蓝瓦蓝"。是的，这个口音复杂的瘦女孩展示出自身最隐秘的节奏和记忆，但显然没有人真的去过那里。Keep In Touch 为它的表演者提供了富于鉴赏能力的观众，他们至少获得了纯形式的愉悦，他们坐着不动，乐于把这场精灵之旅进行到底，但是张浅潜终于唱完了，没有高潮也没有失误，像一场奇妙的梦一样离开了他们。

接下来的时间里 Keep In Touch 才真正恢复了酒吧应有的气氛，木质方桌旁的顾客终于被谈话唤醒，他们是半梦半醒的摇滚歌手、穿紧身 T-shirt 的前卫画家、黑脸导演、某人的女友、善良的电脑专家和受气的演出经纪人……





张浅潜（聂筝摄）



张浅潜曝光最多的一幅照片。所谓“清新奇女子”就是这一刻了。（何嵘摄）




# 张浅潜

名叫张浅潜的女歌手是这样一个人：她似乎天生具有发达的直觉，而经历又为她总结了理性、尺度和自我的逻辑；孩童般的快乐必将被现实打击，可她却通过受伤来完成更牢不可破的防守，所以她总是连招呼都不打就开始发呆，让人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明白她的深浅和悲欢。

“我活得再高离不开这脏，即使睡了还在思想……希望和你总在前方，指引着我走向绝望。”“我要我要的是这光亮，关于理想我自由想象。我爱得再深你不明白，别让我看透让我有血有肉……”曾经纯美自由的张浅潜十岁离开甘肃，在青海做一个怪怪的女学生，她不喜欢练小提琴，倒是常写些老气横秋的文字寄给报纸编辑和西部诗人看。那个节奏缓慢、物质精神都相对稀薄的省会城市算得上美好，因为它至少还保留了博尔赫斯式的月光和带血的匕首，张浅潜本来是可以沉默地在西宁的夜市上穿行，专注于一个管理混乱的幻想之邦的，但是 1992 年她到了广州。接下来的简历你会在唱片公司的文案中看到——拍广告、画画、做模特……幻想是可以高飞的，但不要离开脏，梦游的时代在接下来的烈日与暴雨中乘上了骆驼祥子的人力车，张浅潜用小节和韵脚整理了自己，也差强人意地获得了物质生活的通行证。那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至今无人品尝，但至少还有熟稔的吉他和一嗓美声可以运用。1996 年，初到北京的张浅潜与红星音乐生产社签约，就此告别了自由的岁月。

和她喜欢的 Björk 、PJ Harvey 一样，张浅潜相信直觉的力量，那种属于女性的，埋藏在身体内部的原始能力。在红星那间杂乱不堪的宿舍里，张浅潜像一件多余的摆设，照片、歌词、画框中浪漫的涂鸦小人，还有一切可以被悬挂、堆积、摊开、倾倒、张贴的东西，一篇逻辑尴尬思想独立的小说被装在某个信封里，一盒烟抽掉了一半……这间屋子正像她自己的大脑，混乱中隐藏着生命，没有秩序但随时可以总结，虽然身体瘦弱，但关起门来没人知道她的美。这非理性主义之屋又像张浅潜所说的“气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可以被发现的，但像外科大夫那样指给人看，却不是她的愿望。

关于在合辑《非常摇滚》里的那首《罐头》我们只知道张浅潜交了钱，当铺老板般的制作人青山给她一点可怜的时间来完成。我们还可能会知道她和其他背井离乡的追梦人一样，忍受了多少歪曲、剥削甚至放弃尊严的选择，不过传闻版本太多，以致于类似的事情总不能比作品来得真实。生涩的 Grunge 编曲预示着她还得继续编织理性之网，以便有一天真正地捞到思想之鱼。

背着大包的张浅潜在首都享用着孤独，谁让她想得太多呢？现在，她有了一个乐队来排练，有了酒吧可以唱歌，但是，没有人听得到前卫下面的忧伤。



右上、左下：张浅潜在深圳 （萧全摄）



作为模特的张浅潜和作为女人的张浅潜，在人们的注视下总是混淆着。（左：孟威威摄　右：何蝶摄）



为了文字自身的尊严，我在骗你。这件事我十年前就知道了，但是从来没跟人说过。当时我刚刚写好一首爱情诗，却突然发现它根本不能用来感动那个坐在第五行第四排的女生——后来我就一直这样干了下去，决心让文字自己美自己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在说什么。

《北京新声》里用了我的文字，这就又给成千上万认识中国字的人制造了麻烦（假如出英文版，就又多一个同谋），我于心不忍，但并不准备放弃自私的念头。我没有存款也没有爱情，就剩下这么一点快乐了，钢笔在纸上滑动的快乐，分辨语言的轻重、快慢、空间、色彩、节奏的快乐，无中生有的快乐，还有别的，这虽然不是幸福，也不能叫痛苦吧？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似乎谈到了地下婴儿的现场，但那只是一次排练；我夸奖汪峰是个爱智者。可谁知道他是不是大奸似忠？我挑拨了盘古和北京新朋克之间的关系；我和张浅潜谈得来，所以不由得掺了些关心进去，这你看得出来；我至今在北京没有呆足过两星期，却假装很了解他们的

# 我是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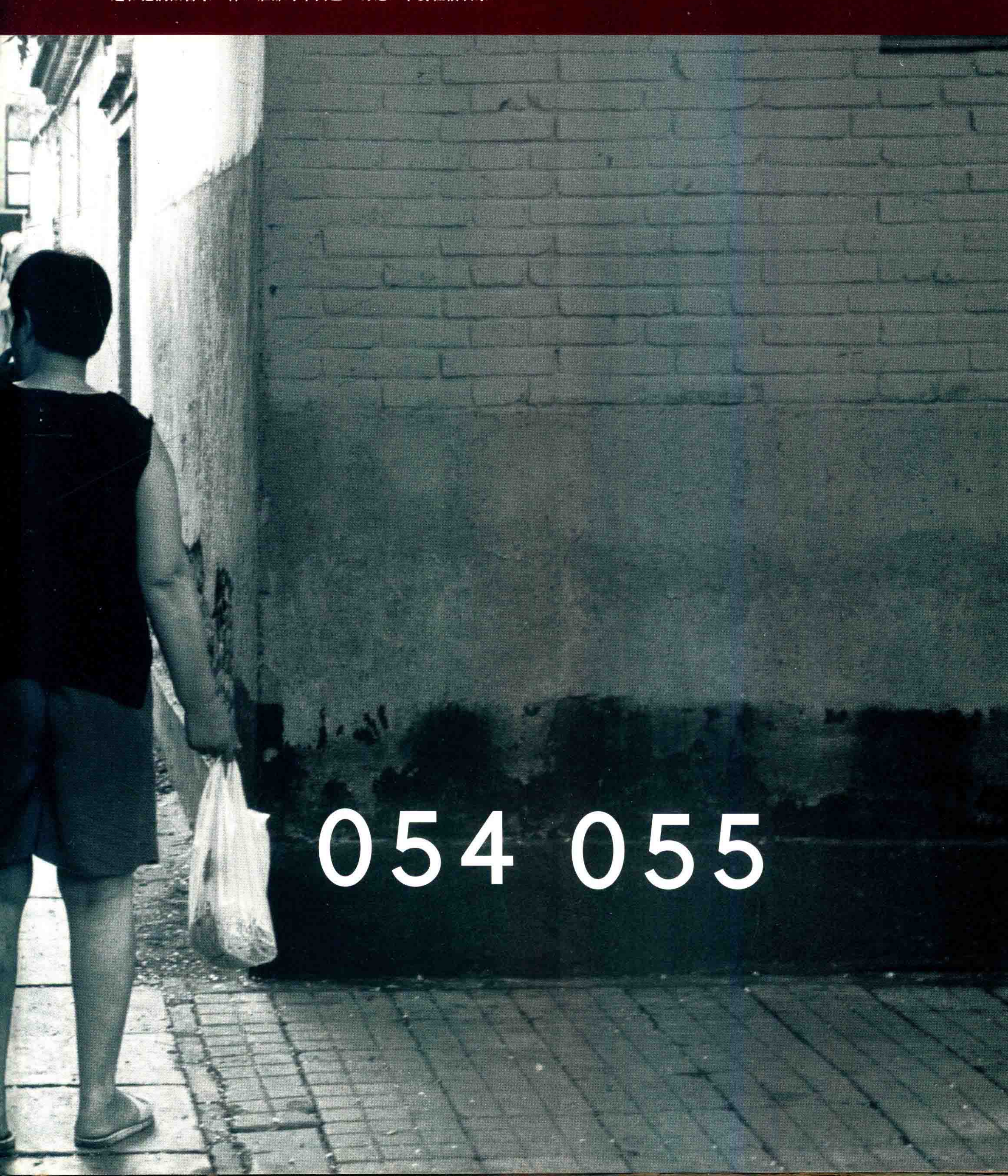
成贤街白天的路口，一个没有寓意的地点和两个没有防备的妇人。（聂筝摄）

生活甚至想法。像秋野这样的老青年，想必很有些不曾示人的面目——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我是写字的，我比他更不值得相信。我甚至杜撰了一些故事，大家有目共睹，但还有一部分被混进了正文，弄到最后连我也分不清真伪了。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提起某个乐队、某本书的名字，其实，没准我只听过那支乐队的半首歌，至于那本书，很可能是德文版，我根本读不懂。现在你明白了吧，我写到它们，只是节奏和音韵的需要。去他妈的音乐和音乐家吧，我只是个写字的。

就连以上的文字，我也忍不住增加了夸大和炫耀的成分，这你看得出。

这和他们做音乐一样，谁都身不由己。切记，不要轻信表象。






“告诉我昨晚你睡在哪”。彩铅画， 19.5cm × 22.5cm ，樱子作品

# 北京故事

凌云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被称之为“冒险”的东西，没有一样接近过那条街的风格。无论你飞到北极去，还是手上戴着护垫坐在海底，或者驱车去九个城市，一个接一个，或者像库尔茨那样，向河的上游航行，去发疯，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形势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难以忍受，总会有退路，总会有改善，有安慰，有补偿，有报纸，有宗教。但是一旦没了这一切，会如何呢？一旦你自由、疯狂、杀气腾腾……

——亨利·米勒《黑色的春天》

## 学院路 37 号

那个九月的黄昏，我从闷热的三层卧铺上狗熊般爬下来，看窗外掠过的古城楼和大饭店。它们在夕阳下闪耀着帝王之气。然后，我挤在充满汗味的接站校车里浏览了东三环和北四环。那年月，北京的空气和交通状况都还没有现在这么糟。

在十二楼管理室的烛光下填写了一些表格后，我提着行李拿着新钥匙摸上二楼，在被十多个黑影撞过之后找到了 244 房间。嗅着石灰、油漆和新布的味儿，我踩翻了一摞新盆和几个新暖瓶，中了弹似的跌倒在贴有自己大名的床上，身体像是散了架。窗下的小道上，男生在叫十三楼的女生去看录像，停电后从教学区归来的人流像是电影刚散场。屋子暗处有些响动，可能是躺着人。

我的同屋包括四个东北人，他们的直爽、健壮、管理才能和广泛的兴趣是我所不能及的。对面上铺是个小个子小眼睛的川哥，常在楼道和水房里吼黑豹唐朝（当他了解到我比他更摇滚，Jane's Addiction 比黑豹唐朝更摇滚后，便再不吼了）。床头和天花板上贴满 Beyond 的海报——顺便说一句，他的长相就是黄家驹再世。至于我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一直都是有争论的。这是因为我填任何表格，籍贯栏里永远是“北京”二字，每次放假回家却要坐三天火车，是全班最长的。

天花板上都要贴海报，也是为了床上卫生：每天早操音乐响起，三楼上铺的哥们儿乓地跳下床，木制楼板上的白粉便细雨也似撒下来；我的三个哥们儿也乓地跳下来并加三句操你妈，然后楼下是大音量的《水手》——当时最流行的歌。双层床也是木头的而且将要散架，上铺叠被子时，我在梦中晃晃悠悠，就像海上颠簸的水手。

漫步校园的第一天，该水手迷路了。但作为南方山区长大的孩子，我很快摸熟了那沿袭了帝王之气的、横平竖直的路网，然后便去到处乱转，捡了三斤铁钉和一捆木片，把床加固了一下。鉴于上油漆可能会影响同学们的食欲，我只是在几年里用打口带上的标签去装饰它。现在， 244 里那张最坚固的床上贴满了条形码，还有 Super Saver 、 No Censorship 和 Parental Advisory Explicit Lyrics 之类的字样。它们向小同学们说明着，这张床不但躺过院士、老总和团支书，还躺过别的什么人。

关于打口带，我不想占用篇幅，况且它也不是北京特产，到外地搞这东西的经历也可以略过。话说的是我在床头打制了一对音箱，用的是八寸的扬声器，后来又加上个十二寸的低音，由四组共二十个大容量蓄电池并联驱动，惨无人道地在 244 开始死亡与工业之声的轰炸——当发现连 Jim Morrison 都能让大伙精神分裂后，我的道德也就丧失了衡量标准。更闹心的是，这屋子后来成了打口青年的窝点。

午饭后，就有邻校的青年揣着想出或想换的磁带过来，在同学们午睡时更有长发战靴的大汉如压路机般撞进来，跺得地板忽扇忽扇的。谈心或交易活动总要持续到同学们下课回来，这时我会为自己还不会求拉格朗日极值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而习惯性地心虚一阵。我对面上铺的兄弟会观察一下某大汉的黄发，然后私下问我，那是染的吗？（注：该大汉因总吃削面营养不良，故头发泛黄。）要是和我促膝谈心的是个老外，还会引起围观……晚上十一点熄灯后，我穿着内裤拖鞋在走廊上与远道而来的游击战友侃侃而谈，每当身边门里传出叫骂，便挪几步，如此这般直到楼梯。

到了 1994 年，聊天室变成了音响实验室。——我们没有“排练”的概念，只是重现着所有巨星少年时代的车库冲动。此种冲动是这样萌芽的：斜对门那位瘦如尺蠖、像狗般忧郁的全校第一古典吉他高手，每晚结束《恰空舞曲》或《帕格尼尼第二十一随想曲》那自我摧残式的手指操练后，总在尼龙弦上来一段“ Hotel California ” 的 solo ，像是清教徒的自慰；我在《巴赫初级练习曲》前再次受挫后，会扯掉白手套，在自己的电子琴上扒一段 Van Halen 式的傻瓜和弦，或是来段无调性实验，以证明自己的天才。接下来当然是……乐队的组建。

我对面上铺的兄弟建议该乐队叫“寻人启事”，这很符合我们人手短缺的状况。但他本人到了这人生十字路口时却掉了链子，还是专心学这他妈的有限元，后来又去搞什么脑壳拉冲击的实验研究去了——直至毕业时的最后一次醉酒，他像个哲人似的说，一切都会收场……到了 1998 年年底，他却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乐评

八载、像钢般抗御的主校弟一台典吉他高手，每晚结束《悟空舞曲》或《帕格尼尼第二十一随想曲》那自我摧残式的手指操练后，总在尼龙弦上来一段“Hotel California”的 solo，像是清教徒的自慰；我在《巴赫初级练习曲》前再次受挫后，会扯掉白手套，在自己的电子琴上扒一段 Van Halen 式的傻瓜和弦，或是来段无调性实验，以证明自己的天才。接下来当然是……乐队的组建。

我对面上铺的兄弟建议该乐队叫“寻人启事”，这很符合我们人手短缺的状况。但他本人到了这人生十字路口时却掉了链子，还是专心学这他妈的有限元，后来又去搞什么脑壳抗冲击的实验研究去了——直至毕业时的最后一次醉酒，他像个哲人似的说，一切都会收场……到了 1998 年年底，他却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乐评，又打长途电话让我买效果器配件。

在进入创造阶段后，我除了继续在北太平庄、语言学院、五道口、图书城和人大东征西讨翻打口之外，还与吉他手一起从大课上公然跳窗逃亡，去中关村和新街口买电子元件。当 244 的松香味和夏天的雾气一并散去时，我们研制的带三挡均衡的效果器出世了。要是将它和另一只由随身听改装的效果器串上，就会发出划时代的怪叫，向世人展现那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风貌。但不久后，乐队便暂告解散——并非由于成员不和，而是核心人物去站柜台卖打口带了。

那是在成府路东口的一个五金店里。北京孩子管那儿叫“八门”，意思是我放在门外的一对大音箱能威震八大院校。最初的顾客是些选购好电灯泡和老虎钳的办事员，他们转过来让我推荐些好听的，一块儿开在发票里。根据心情的不同，我会递上 Mariah Carey 或 Metal Blade；但不久，真正的顾客多了，也就没心思理他们。在这儿，我结识的朋友和骗子包括著名乐评人、校园 DJ、搞音乐的和下一代打口带贩子。

自从 1993 年在校园里又贴海报又摆地摊都没能十块钱卖掉 Metallica 之后，我就开始四面出击，结识各路豪杰。我至今记得那些俄罗斯和东欧留学生，他们说他们的祖国比中国还闭塞，每次回国都要给弟弟带去大量打口；和他们一块儿，我听完了 Duran Duran 和 Depeche Mode 的全部专辑，爱上了 Ministry 和 Skinny Puppy，对 EN 和 Laibach 心存好感，并学会了 Rave 之类的词儿。记得语言学院的留学生楼像大使馆般难闯，但那是个真正的市场。走廊上弥漫着异味，不过在那儿你看不见大麻和安全套，老外和他们的门饰一样友好。在关系网已大到极限之后，我开始挨门挨户推销——这是个错误决定，因为很快就有个小鬼子告了密，让我进了保卫处。

作为吃教育饭的人，保卫干部用一周时间对我进行了好几次精神摧残——我那篇沉痛恳切的检讨也许还在他们柜子里；他们的惟一善举是归还了所有磁带。相比之下，警察叔叔所做的不过是在天桥上两头把我堵住，揪住脖领推上警车押到派出所，抽出腰带和鞋带，让我在冷冰冰的空屋墙脚蹲几个钟头后没收东西完事。在中图门口出现的执法大队，也就是把我押上车问几句没收东西后把我赶下车，好腾出地儿装前方路口那个卖草莓的；如果我带着学生证并多编几句好话，比如我是校电台的资料员之类的，他们还会物归原主——那么吵的磁带毕竟没有草莓容易处理。广播电视局的同志则甚至会给你一张“物品暂扣单”，上头有“暂扣打口带 x 盘、盗版光盘 y 张”、“m 月 n 日到音像科领取处理结果”的字样，还有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名和公章——顺便说一句，最后一次看到那位科长的签名，是在我的“音像制品邮寄证明”上；若是没有这玩意儿，我寄往国外的十多盘自制样带就会在海关惹麻烦，虽然不至于被打口，但也许会被销磁——后一种显然更会令收件人捶胸顿足。

关于校电台资料员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我可能也算是“校园 DJ”。DJ 这词儿是我到北京后才学会的。在 244 的第一夜里，当我偶然发觉随身听上的调频指示灯破天荒闪动着媚人的红光时，不禁衷心感激大都会的慷慨。对那些这几年在北京上过学的外地青年而言，乐台在记忆中的地位大约与烤鸭和果脯是一样的。像《老式汽车》《零点乐话》和《发烧门诊部》之类的栏目，已将大都市人内心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随想简化为朴素的情欲；而与国际接轨的 Easy FM 则给女大学生带来秘密进化的快感，就像早年的托福一样散发幽香。

因为确实想学会拉格朗日极值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的解法——顺便说一句，我在考场上不爱作弊，为这还老骂自己傻逼——我回到了母校。然后在众 DJ（这些人不时会来要求我推荐些磁带，他们知道看一遍我的收藏要半小时）的勾引下，我也开始泡在那三平米的外语系隔音间里，用另一种方式传播摇滚乐。该电台比传统的广播站要先进些，它发射电波，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北至地大南达邮大，东西分抵健翔桥和中关村。在这片天空中，我展示着感动与嘲讽、自恋与失恋、狂躁与悒郁、朋克与嬉皮、歌唱与哭泣，把六十分钟做成命题作文或是意识流。也是在那个隔音间中，我重组了乐队，以惟一的设备——一台双卡录音机，使用手动拼贴录制了惟一的小样。那位正扛着情感危机准备 GRE 的吉他手负责吉他、贝司，我担任键盘手、打击乐手、监制、制作总监、制作人、录音师、经纪人、发行人和企宣。我们晚十点进棚，次日凌晨两点录完了器乐，上午又用五分钟时间设计了自然混响录制了人声。几天后，这个很 Do It Ourselves 的作品在电台播出了。

关于这个现在已悄无声息的组织，我手头保存的除了节目记录的复印件外，还有一斤照片，都是当年活动的情况。比如，那支布鲁斯乐队的演出——该乐队现在已经不玩布鲁斯了；一些民谣歌手的演出——他们也还是默默无闻；电台成员的欢送宴——他们也不知去向了。还有些活动没留下照片，比如，那个常翻墙进出各大学宣讲摇滚的著名乐评人的讲座——那次他在熄了灯的阶梯教室继续滔滔不绝，讲述国内唱片业的黑暗（据《音速青年》报道，他的“烟头一明一灭，烧灼着黑暗”）；另一著名乐评人则挽着女孩，带领十位《音乐生活报》的编辑记者——他们扛着几千份报纸来推销，我碍于情面勉强收下了一百份。第二天，我借了个意见箱在图书馆门口设了个无人售报点，把报纸卖完了，回款率为百分之九十五。记得那期的头条是邓丽君下葬，或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

《音速青年》是当时的电台台刊，出了四期，每期印五百份塞在每个宿舍门缝里。这是我首次介入音乐媒体，至于具体工作，是在缺稿而主编又懒时充当垫底的写手，以及在机房看主编与打字小姐打情骂俏。补充一点，该主编就是我对面上铺的兄弟，后来我为刊物无疾而终之事在节目中即兴采访他时，他像个局长似的吐出几个字：“……还是会恢复的，但是，那要等下一批人出现之后……”

由于保卫处干部和警察叔叔的宽容，我没被学校勒令退学；但为了表明对这一切的态度，不久之后，我便搬出了学院路 37 号。

## 清华园火车一站

确切地说，我住在离这车站十米远的平房里。从那家小杂货店的执照上看，这地界属于暂安处，也就是旧时停放死尸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乱葬岗。到了公元1995 年，这二十几户人家仍没有门牌号，周围环绕着垃圾堆和臭水沟，到了晚上如果不跳闸的话，所有灯光都是黄惨惨的；无月的夜晚，坑洼的小道让人跌跌撞撞；满月时，开阔地的大风呜呜吹来，挂着破布的死槐活像个巫婆。东边隔着一片半荒的菜地，是大学的西墙；铁道北上通向五道口和清河；南下可达四道口与西直门；西望，中关村的高楼在货场后探头探脑——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儿连结着那么多我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连结着我的过去和未来。

那是我最早在京租房的地方，它在记忆里已模糊了。去年夏天在一个女歌星的 video 上又看见了它。火车站是老式的平房，倚着三两株老树，周围又没有特现代的建筑，挺适合拍民国年间的戏。在镜头里，落叶飘零，天空灰暗，伪军在站台上驱赶着逃难的平民；穿长衫旗袍的男女主人公被人流隔挡，依依惜别。看着这些旧画面，我先是喷饭，然后忽然坠入了真的伤感。

在那段铁轨上，我将无数枚硬币压成了饼。两个硬币叠起来，压出来的常是像个“ 8 ”字的不规则形状，要是心形的，就象征著它俩至死不渝的爱情。火车过后找到那银光灿灿的小饼时，它还是烫乎乎的，但很快就会凉下来，而且变得晦暗。要是车速快，压出的质量会比较好，但会被飞卷出很远。我低头苦找时，会被当做捡破烂的，或是丢了钱包；而在车站附近车速慢的地段，则会遭到扳道工的呵斥。

夜晚，当你坐在站台喝啤酒，倒是没人来干涉——夏夜里，有些人就睡在那儿，其中甚至包括夫妇。知春路上楼顶的霓虹与杰克逊迪厅的大火炬在天际交相辉映，整个城市上空弥漫着稀薄的橙色雾气，在夜幕中溶解，看似一大块烧红的金属的那种幽幽光芒；钢轨延伸向远方，在那儿它们被信号灯镀上透明的红光，这些光在轨道上流动着，在黑暗中幻入金属那冷冷的蓝色；在近处货场大灯的照射下，又耀出亮银的色泽。在这儿，我见识了至纯的光亮与黑暗，但不知道什么是阴影——也许它们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能装进燕京啤酒瓶，而后者就不行。火车也能装进酒瓶，只要在它呼啸而来时将瓶贴住眼睛，即会看见它像条鳗鱼似的在酒中转了一圈，然后就游走了。一般说来，玩装火车的游戏和杂货店的关门一样，提醒着自己该回去睡了。

那时的另一些夜晚，我在校电台做节目感动我自己。当我把一个六十分钟的概念专辑做完，一般是凌晨两点。这时学校的南北门都关了，我只能从东南门出去，绕行学四路口或知春路回去——这两条对称的路线绘出了一个心形，起点和终点是它的两个尖端。街上远近的红绿灯都闪着黄光，夜行货车洒下一路煤渣。一对男女在车站灯箱间那狭窄的坐椅上性交。一伙少年在公厕里吸毒。两帮青年在铁道边斗殴，我像地狱天使般飞过去，躲避着赠与的砖块。煤渣在清晨便被扫净了，而血迹则长久不退。

有时，我夜归时会带上刚到的新货——那阵我在图书城修理打口带。在那儿，我见过全城半数的打口青年，见过一天两千块钱的打口流水，并使那儿的音响成为整条街上最噪的。在假日午后，我会对门外蜂拥而过的人流播放 The Doors 的“ The Stranger ”，想象他们是“ The Wall ”中走向绞肉机的那队丑陋脸孔；傍晚，当那位总叫嚷着跑来跑去的存车大娘也消失在冷清的街口时，我会点支烟，坐在门口的音箱边听震耳欲聋的“ In Utero ”，数霓虹和灯箱：外文书店……向阳文体用品商店……世同书店……Red Taps……工商银行……麦当劳……接着，更大的兴趣来了：午夜潜入京城的外地货车在居民区熄火，我们卸下了一万盘打口带，然后是让人心动过速的翻检——整件整件的 R.E.M. 和 Stone Temple Pilots 固然令人气恼，但随后就会蹦出“ Closer ”或是全套 The Cure 之类的尖儿货……

到了 1996 年，我的生活有了些变化。终结、变迁或新生，多少与我的这些爱好有关。其间有必然关系吗？这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清，就和我没想清自己做节目和“校园 DJ ”这头衔的关系、卖打口带和文化传播的关系一样。但要毕业了，也就和那头衔再无瓜葛；后来当上记者，又与文化传播暧昧起来。

搬出宿舍后，我便很少回校了。记得那年夏天我倒数第二次回校，是坐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八轨调音台前，负责“十大金曲评选揭晓晚会”的音响部分。顺便说一句，该评选到那年好像是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几百份选票我一直留着——我在候选名单中加进了 Sonic Youth，并使 Smashing Pumpkins 上了“十大”名单——有校园民谣和《音乐天堂》式英文流行歌的折衷，我的假公济私无伤大雅。话说我坐在调音台前，把“ 1979 ”推上去时，管机器的老先生正和一个老太太在我身后打情骂俏。这儿没有监听耳机和音箱，只能从墙上那狗洞大小的窗口漏进来的嘈杂中判断大厅的情况，或者由一个哥们儿从大厅飞奔着穿过三道门进来告诉我司仪刚宣布了下首歌是什么，或是司仪觉得低频不足。

最后一次回校做的懵懂事儿是学位论文答辩——在那次学生时代的告别演说中，我坚决回击了众教授的找茬儿。次日，我的论文《轻型飞机翼梢减阻实验研究》被他们推举去参加优秀论文评选，而我则径直去报社上班了。我的档案被发往某三线军工科研单位——后来从《 Rolling Stone 》杂志中的译名“ The Third Front ”才知道“三线”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父母的大半辈子和我的头十八个动人春秋，都是在那山区的战壕中手握大刀长枪抗击着帝国主义——这种战斗给我的体验远不如小时候看的电影那么带劲儿，所以我就不爱回去，而且把户口转移证和团组织介绍信都扔到了角落。在我想象中，北京大约是属于“ The First Front ”，有着最激烈的战斗，包括爱情。

在媒体上搞摇滚就是种游击战。在文字主题的战术上要切记：席琳迪翁永远所向披靡，写欧美的带上意识形态气息的就要注意删节，国内摇滚带有法老的诅咒，而写崔健无异于服毒自尽。在战略上也千万不要轻视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带着肉啃肉气质的稿件便停止签发，要是大人物发了怒，就要赶快改版为高雅音乐；要是大人物不在了，市场又有利可图，摇滚又会涂脂抹粉地出来接客——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当革命转入低谷时，我还会被派到《假日广场》版去主持《百乐门》《好去处》和《大嘴吃四方》等栏目。每当我在美食城调查菜价被当成商业间谍时，就会拔枪似的亮出记者证，威严地喝道：“我是记者！让你们老板出来！”在家里昏黄的灯下，则要想象自己在冰瀑上勇敢登攀，在溜冰场上飞速盘旋，在水下鱼儿般游动——可是我连游泳都不会哩；末了还要以优美的、中肯的、夹叙夹议的、

不在了，市场又有利可图，摇滚又会涂脂抹粉地出来接客——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当革命转入低谷时，我还会被派到《假日广场》版去主持《百乐门》《好去处》和《大嘴吃四方》等栏目。每当我在美食城调查菜价被当成商业间谍时，就会拔枪似的亮出记者证，威严地喝道："我是记者！让你们老板出来！"在家里昏黄的灯下，则要想象自己在冰瀑上勇敢登攀，在溜冰场上飞速盘旋，在水下鱼儿般游动——可是我连游泳都不会哩；末了还要以优美的、中肯的、夹叙夹议的、附带数据分析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那段日子我常写得吐血。此类文章见报时，我直接署上自己的大名，不但是告诉大伙儿我的处境，也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当革命陷入经济危机，他们连我的六百块钱工资都发不出时，记者招待会真是个好去处：骑着破车到香格里拉或假日皇冠，总是找不着车棚；走过高尚的红地毯，与首都新闻工作者济济一堂，领取通稿和红包；如果下月房租已有着落，我就会揣着两百块钱飞奔往那些内向的唱片店，再买半车蜂窝煤。至于那种有吃有玩的"业内"会议，我只去过一次，被饭桌上那伙名人大便般的言行倒了胃口，连夜从那个放荡的大酒店逃回城里。后来，当改版已成定局时，我便不去上班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表明我的态度。

当记者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还是每天早起，经过火车站大厅的后窗走向那惟一的公厕。看着那些排队买票的人们，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站在厕所污水中的砖块上捏着鼻子排队时，又回到了现实。然后，抱把木吉他罩在小屋天窗投下的蓝色晨光中聆听大树海潮般的歌唱；窗外偶尔有卖糖葫芦或是收破烂的吆喝穿越寂静，诉说生活的闲适；而不时有高速货车轰轰驰向远方，把床震得像筛子，告知我生活中更多的事实。

我的男房东是个朴实的人，每晚骑着他的摩托回来，吃完晚饭，蹲在门边又一次向众房客讲解完他那"京A"牌照的好处后，便与妻子和街坊搓麻到深夜。女房东计划着给考高中的独生女买辆木兰。我想那车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他们不干涉我的大音量，一是因为我在屋里墙上挂满了棉被和床单；二是因为每晚电压低得连音箱都不工作。这儿的固定居民都是本地人，如果不谈房租的话，都挺和善。要是有人骂街，那一定是巷口的傻子媳妇在墙外发现了排泄物；在她咆哮的同时，她那破棉袄上拴根草绳的丈夫总在门口的垃圾堆里翻找，脸上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这儿租房的人包括外地小商人、民工、补鞋匠、卖肉串的和有了女友的自费大学生。顺便说一句，在那时，打口带是我的妻子，燕京啤酒是我的情妇。曾有一对搞音乐的江苏青年住在我隔壁。他们白天在迷笛学校上课，晚上在酒吧当招待。他们对我说，他们没学到什么，而且对北京这方面的情况也挺失望，然后就带着我给他们搞的百十盘打口带回家了。与此同时，房东们在檐下和墙外搭起了一排排猪圈般简陋的违章建筑，租价也节节攀升——感觉好像是有一火车一火车的外地人正在涌进这个城市。主人们期盼着拆迁，并利用这最后几年，从自己掌握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钱。

我们的命运，如果不是选择在帝王的版图上被遗忘或被抹掉，那就是默默地被垃圾和臭水淹没。所以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叫"暂安处"的地方。

## 新兴西巷1号

这是一个大得可以用火车在其中搬家的城市。最后合上那小站故居的矮门，我第一次从那站台踏上列车，飞跨过知春路和北三环，眼前闪过几排栏木外等待的自行车阵。——十分钟后，我拎着全部家当，被来自北方的客流推出了北京北站：远近的高楼和拥堵的立交桥宣告着我已潜入了巨兽的心脏。

穿过西外大街上甩卖不息的衣摊和永远满座的饭馆，我走向百米外的新避难所。那是个古旧的小院，南边高耸着德宝饭店的背影，东面的天空被隔壁的华侨洲际酒店遮了一半，西边和北边德宝小区的楼群也合围而来，让我坐在院子里时像只井底之蛙。因为那排北屋里没住别人，我也从报社拂袖而去，所以白日里也就能晒晒太阳，看看碎瓦中复苏的枯草，和老朽的雕花门楣。高楼挡住了一箭之外那大街的沸腾，只有旁边小学校孩子们的欢笑和最后几棵大树的叹息被习风混合着送来，门外饭店停车场上也都是些安静的卧车；入夜，楼顶的霓虹则把小院映得像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在我想象中，那是片沉没了的古大陆。

西屋住着个比这院落还老的女人，在我搬来的当夜，她就来问寒问暖，然后就再无声息了。——后来我知道，她那天是来侦察我的用电状况。但自从另一位老太太搬进来后，每早六点我都会被她们的对话吵醒——那些不冷不热的关心和含沙射影的较劲儿，堪称伟大的民间艺术。一个像是当过大革命年代的工宣队长或是革委会宣传部长，那套出口成章的驳论和样板戏的激情，常令前来拜访的街道骨干悲愤地落荒而逃——收一块钱清洁费简直是虎口拔牙嘛！另一个则总在气短之时爆几句粗口，然后便摔门而出，去酒店后头寻觅废物了——要是我上午兴冲冲地出门，撞见她白发披散，气喘吁吁慌里慌张地拖进半根圆木，肩下还夹着几块废纸板时，总是于心不忍上前相助。然后，她跟着我直嚷："好孩子！好孩子！别弄脏衣服！没人给你洗！"而在另一位老太太的指挥下，我把院里铺上了砖，并腰疼了一礼拜。

另一项公益劳动是修理那只四十年代的日本电表。修理方法只有一个：拍打。只有这时，她们才会同时出现但不斗嘴，而且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每拍一下，我屋里准备好的音响便爆出几小节轰鸣——只有这时，摇滚乐在她们听来才是天籁之音：Johnny Rotten 宛若金鸡报晓，而 Paradise Lost 干脆就是喜庆锣鼓。要是我突然口眼歪斜、浑身颤抖，其中一位便会箭步上前，一脚踢掉凳子；若是我还粘在空中，另一位便会一拐棍拦腰把我扫下来——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会像半袋土豆似的跌落尘埃，并且又会腰疼一礼拜。

那两幢九十年代从昔日贫民窟和煤厂旧址上耸起的酒店，正蚕食这方最后的遗迹。隔壁的一小条空地也被他们利用起来，修了个台球厅。常有辆奔驰把院门当成了临时车位——在他们看来，这儿不像是住人的地方；每当我把那没有挡泥板的自行车搬过这些车辆时，容易感到悲伤；而在门边迎接访客时，则会得意洋洋。附近甚至干净得没有垃圾堆，而若问老太太的话，又会被那一块钱的分配问题缠住，所以我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把垃圾袋扔到西外大街边上去——这不能怪我，而且那时每家店铺门外都有一小座垃圾山；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仓皇四顾，感觉像是扔了颗人头。其实，袋里只是一些方便面袋和废稿纸，它们的主人是一个方便面青年兼自由撰稿人——这两种人都堪称与世无争的模范良民。

在那些酷热的黄昏，当地板下透出的最后一丝凉意泯灭了，电网也被超载的空调拖垮后，我会带上随身听去那个总有冷气的仓储超市避暑。post punk 带来蓝色凉雾，伴着我在货架间蜘蛛般的舞步。拿起红酒或火腿吟出条形码的诗意，斜一眼身边时髦的短裙；很快，就会有穿制服的同志盯上我——当该同志最后忍无可忍径

直扑来，我就会在妇女用品区里虚晃一枪，快步走向方便面区，每种抓起一包后威严地走向收款台。

超市门外的热浪总把我推个跟头。爬起来后，走向华天饮食门口的报摊，从《音乐生活报》头版了解一下最近又有什么精彩的讼事和丑闻、令人潸然泪下的不幸与爱心，然后买份《北京青年报》——那上头也有《图兰朵》和指挥大师，但我只是在咽方便面时关心一下电脑、汽车和家居……报摊边是些地摊，卖着手机套、小白兔、自制鞋垫和劣质口红；当某辆小面包企图拐过来却被堵在电车后头时，卖水果和卖羊肉串的已经推车钻进了黑豹音像后头的菜市场——因为小面包后头跟着辆130，上头装着另一些三轮车和烤箱。下岗工人和退休老人没经验，所以遭偷袭之后，前者会目光呆滞长久伫立，后者则苦笑着互相安慰；与此同时，避进百货商场的外地女人看到一切落幕，便走向家电组，掀开全自动洗衣机，取出她的货物，再战江湖。

有时，路北的高雅地界也有戏剧场面，而且充满青春气息和无政府主义。总有三两个驾车的年轻新贵为磕碰或车位而吵起来，然后，手提电话被当做板砖磕在脑壳上，而从皮包拍击胸背的威力分析，那里头是台便携式电脑；穿西服和皮鞋的人体能跳出如此刚劲热烈的舞蹈，堪称绝妙的广告。女人们没有尖叫：她们从容不迫地拨通无数号码。一分钟后，男人们出现在写字楼、美食城和台球厅的门口，呼啸而来，拣着陌生的脸就揍。对面电车里探出了一排脸孔，空驶的面的司机慢下了车速，林肯车则径直泊在路边，黑社会头子点燃雪茄凝神观瞧……通天的车龙喇叭齐鸣，和广场绚烂的灯光一起装点这出好戏；只有那个翻拣垃圾箱的家伙无动于衷，很是杀风景。

再晚些，空调大巴带来了住宿的外国游客。这群毛发浓密的花蝴蝶饿着肚子向举小旗的导游比比划划，抱怨着交通堵塞。海鲜酒楼门口卖花的小女孩只挑有绅士陪伴的淑女举起玫瑰，自然推销成功；此时，百货商场哗哗地放下卷帘门，郭林家常菜的食客正满面红光……十点，小女孩轻跑着消失在某条小巷暗处，停车场边伫立着几位拎购物袋的女郎——她们每天都在这儿等不同的男人。末班电车开走好久后，空气中仍弥漫着烤肉的烟雾，在不同高度分别呈现橙色、绿色、红色和蓝色。蹲在路边的大多是三十出头的男人，就着啤酒和肉串讨论国家大事。巷口闪动着一台黑白电视，那是杂货店老板在乘凉，并准备为深夜酒兴大发的人们提供方便。

这条大街彻夜车辆不息，没法让人坐在电车站对面想象欲望号街车；而且它太明亮，让我没法感伤。唱着《马路天使》踱到动物园，看那幅动物分布图，想到那些穿着皮毛的家伙憋在湿热的笼子里该有多难受啊，就会哈哈大笑。这时凉风习习，霓虹也清晰起来。东边的西直门立交桥是另一个去处，我在那儿拍过一些夜景的照片。像个平衡木运动员般站在桥底层的隔离墩上，或是像个杂技演员般在桥顶用脚钩住护栏身体悬空，把身体当三脚架，使用超长曝光。要是我挺住了纹丝不动，拍出的车流是几条平行的亮线，点缀些街灯的亮点，像是五线谱，记录着城市的歌唱；要是我晃了一下，它们就在照片上画出几道弧线，那是城市的签名。

午夜带着些醉意走在德宝饭店边那条回家小道上，一旁是有着雕花护栏的绿化带，植物间竖的矮灯像是一排蜡烛；正前方是金碧辉煌的华侨洲际酒店，每块玻璃都闪着五彩的光，像教堂大窗上的彩色拼贴画。当我正要步入这教堂参加婚礼时，发现门口等着的不是神父，而是一个穿制服拍着警棍的人——我醒过来，向左拐进小院，摸过一片粉雾，倒在我那热气还未散尽的青灰色洞中沉沉睡去，梦里浮出些绚烂的碎片。

## 东塔楼 8010

在二十米高空做梦，是大城市中猿猴后裔们乡愁的再现。从八楼那扇属于我的北窗望去，倒是有不少树木——那是财经大学的校园；东边有个水果批发市场，小贩们每早从那儿蹬板车奔赴全市，去满足百万猿猴后裔们在饮食上的乡愁，还有个飞机总装厂房大小的百货批发城，晃悠着几个大气球挑逗他们的玩性。楼东南则不时飘来马戏团开演般的广播声：“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您在栏木外等候……”

四道口这一带没有太多建筑，附近也只有一些冷清的事业单位、几家小饭馆、微型超市和一间只有一个职员的邮电所。起先每天黄昏路边曾有不少农民卖菜，我也见过那个曾在西外大街上爬行的女丐——她推一辆堆着水桶和破布的婴儿车，在菜担边匍匐前进，身边跟着她学步的幼子……“两会”的召开使市场被取缔，她也就爬到别的地方去了。

塔楼下有一对摆摊的夫妇，风吹日晒使他们看似母子。他们住在地下室里，白日里在墙角摆上几箱啤酒、鸡蛋和酱油，小桌上放些花生米、榨菜和碘盐。既然大大方便了住户，也就得到了居委会的默许。每个人在掏钱前跟他们都特亲密，但当风暴杀来之时，并没有什么人帮忙遮挡和抢运。冬天里，他们的手和道口边修车的大爷一样，像烤白薯。

开电梯的女工有两个，其中一个见我就两眼放光，用小棍一戳八号钮，然后就开始欣赏我的头发、皮衣上缀的零碎、手镯和裤子上的窟窿——每当看到这漂亮女孩坐在那小铁皮屋的高脚凳上拿着小棍饶有兴趣地等着我时，我就感觉自己是头走向驯兽女郎的大猩猩。另一个女孩总埋头看那种在火车上流行的杂志，你永远也没法判断她的长相；每晚九点后还会有个电工装扮的男子用身体把她挡住，让电梯里拥挤不堪——在哪种情况下都是我自己操作。所有这些都无法使我对她形成好感，于是每当大猩猩直立着仰脖从一数到八时，后脑勺总在对驯兽女郎说：“是的，我是你的王子。”

我的两个同屋的大学生和我一样一表人才，只是其中一个总在刻苦学习，晚自习回来后只唱几句老掉牙的港歌便睡得像死猪；另一个则已有了公主，周末迎来过家庭生活，并且占据灶具让我饿肚子——顺便说一下，感谢管道煤气，让我顺利地由方便面青年降组为挂面青年，并且过节时也能来包速冻饺子了。当我搬进 8010，并修好了卫生间的电灯和淋浴后，他们便大洗特洗，招来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贴在大门上，鲁迅和红卫兵的理性与激情被毛笔挥洒而出——7010 的那位老教授每日都闻鸡起舞，然后一身短打扮仗着剑去买油条；要是楼上脚重了，他会使劲敲打天花板。为此我在地上铺了层毡子，以免被宝剑戳着屁股。两天后他撸着袖子出现在门口，拿着自带的盆和我一起掏卫生间的积水，边干边和颜悦色地关

最后通牒贴在大门上，鲁迅和红卫兵的理性与激情被毛毛摔酒而出——7010 的那位老教授每日都闻鸡起舞，然后一身短打扮仗着剑去买油条；要是楼上脚重了，他会使劲敲打天花板。为此我在地上铺了层毡子，以免被宝剑戳着屁股。两天后他撸着袖子出现在门口，拿着自带的盆和我一起掏卫生间的积水，边干边和颜悦色地关心我的生活——在这位教育工作者面前，我成了中科院 × × 所的研究生，并在 × × 公司兼职打工。我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三无人员。

鉴于卫生间的水已经能从十三楼漏到一楼，也许还有那棵文武双全不老松的另一张最后通牒，修理工很快出现了。他用大锤捣毁卫生间的防水层，声震全楼；他的小儿子则欢乐地踢脱鞋子，在我的毡子和地铺上又滚又爬，然后又把散放的磁带归置进盒子，每找到一盘就会绽放一次天真的笑，抒发自己了不起的成就感。作为修理工的后代，他很快就会发现那个打口；而且，他只是瞪大了眼指给我看：“磁带坏了！”欧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和我妈就没有这种修理工的美德，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面对孩子，解释意识形态渗透说、洋垃圾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库存调节说都很艰巨，所以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对他说：“要是呆会儿你爸又忘了修我这扇窗子，它早晚会被八层楼上的大风撕下来，翻着跟头掉下去，把楼下那辆桑塔纳打上口。”

关于坠下八楼的妄想，主角其实是我自己。窗对面是一棵大树的树梢，我总是在白日梦中从走廊助跑，马戏团小丑般穿出窗口，抓住那在微风中翩然的树梢……但每次都没成功，磕磕碰碰地在枝叶间跌落，全无昔日祖先的风度 ；末了，还要在自行车棚上撞出个人字形的大洞。然后，车棚对面电梯值班室里会有女孩哭着跑出来——我没法预知她是谁，但看到我那么快就从八楼下到一楼，她总该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吧。大多数时候我静静地坐在地板上，这时窗外只是一片湛蓝、土黄或是青灰的纯净天色。那两扇朽坏的窗封闭久了，我就会恍惚觉得自己身处一艘深海潜艇之中，怕一开窗就会被涌进的水压成扁扁的热带鱼。按那位姓王的老作家的说法，水流象征时光，比喻着生活和历史的延伸；那位姓王的中年作家则想象自己躺在水底，看浮木和玻璃瓶从头顶漂过；而在《 Disintergration 》的封面上，那位姓史密斯的后朋克则在水下与那些花瓣的颓靡光影相伴……而在那个夏天，我的窗外是深不可测的、空气般无形、冰一样纯净的静水，凝视久了会让人心虚。

那个夏天我并不是无所事事。我学习摇滚乐，在膝上完成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并且差点儿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屋子里没有家具，空中连雌鸟都没有，所以也就用不着窗帘；墙壁雪白，只是东墙上有条难看的电线垂下来，我只好用线和夹子把它改装成一面可以升降的旗帜——挂的不是关公和毛泽东，而是画报上撕下来的乐队照片。每早屋里泛起蓝光时，我会放支他们的青春之歌，庄严地升旗；当最后一抹晚霞在他们脸上暗淡，我会放支忧伤的 unplugged ，降旗。

夜里醒来，附近建筑工地的大灯把窗玻璃的波纹投到墙上，和摇曳的树影一起强化着我身处水下的幻象。那工地还有着高耸的塔吊和货梯，传来空旷的噪音，像是座宇航发射架。我静卧在地上，看着黑暗中的书堆和磁带条儿，觉得自己正身处凡尔纳的那颗月球炮弹里，准备着承受发射时巨大的重力过载——这也很让人心虚。

冬天的朔风吹尽了雾气和树叶，窗外满眼是裸露出的水泥建筑，恢复了城市本色；而且，还能看见专利局大楼、当代商城和知春路上的新建筑群——在它们后面是我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眼前那棵大树露出了一副凶蛮的面目，如果还想跳上去的话，会像一块烤肉似的被扎穿；而空中飞过的最后几群飞鸟和狂风献上的塑料袋，也扰乱了那片静水，把人带回现实，更让人心虚的现实。夜晚，裸露出的灯火像是一个繁荣的宇航中心，那座发射架又高了十几层；窗外风声呼啸，而我还是没有飞起来。飞升和坠落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自己的体重把自己压垮。

## 复兴庄 8 楼 7 单元 501

在北京的心脏呆久了，你会觉得通县就像世界的边缘——静得怕人。我就住在这卫星城的郊区。在那个冬天的大多数日子，北风呼啸着荡涤清冷的街道；艳阳天下，也只有几个闲汉在打台球。虽然窗外是广漠的农田和苍茫的地平线，但也无鸡犬相闻。 火车声仍在催逼着游离的心，每隔一刻钟便有喷气机掠过头顶，一次次顷刻间摧毁那疯长的短命死寂。

那些巨型客机，银色的身躯映着夕阳低低飘过湛蓝的天，航空公司的徽记和放下的起落架清晰可辨；他们就这样日夜轰然着跨洲越洋而来，抚育我曾经失落的飞翔幻想，并助长了更狂的漂泊欲望。

“飞掠无垠的亚细亚 / 跋涉于中国大地 / 如果你在卫星城驻留 / 你将无所作为……”英国之病并未阻止我伏在废纸箱上完成那十多万字的书稿，并在报上继续抒情。每天上午十点那串欢笑的小学生跑过小区后，我在这空寂的三居室中像个鬼魂——面对令人昏昏欲睡的南窗斜阳，地铺永远冰凉，所有家用电器的沉默证明着时间的停滞，而我却要操练激情并且押韵，直至下午四点——去那个冷清的市场买菜，为大伙做饭的时候。

那是我的两个高中同学，分别在外企和国企当会计和助理工程师，各自怀揣没户口和即将下岗的心事，以及外乡青年的莫名伤感。不过，那些焦虑总被油辣椒和折耳根的味道冲淡，被各种 party 的狂欢遣散——前者由亲朋们用飞机和火车成箱运来，后者则是单身汉们的大屋理应肩负的光荣任务——在节假日或生日，人们在下班放学后，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换了无数次车后齐聚于此，让烛光照亮他们脸上的纯真。女孩们交流着艰辛的平房岁月和最新的购物打折，男孩们讨论着明天的招聘会；当酒精麻醉了矜持，女孩会唱起圣歌，而敞开心扉的激动会令不吸烟的男孩也点上一支。人们在黑暗中起舞，我拿着相机，看窗外地平线上浮现又一闪光的银色精灵。在临时男女生宿舍熄灯后，还有人在为生活而酗酒，为失恋而呕吐。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会从地上爬起来，伸展筋骨，竖起衣领，各自上路。

每隔几天我会像个农民一样进一次城，去送稿子和取信。322 路疾驶在京通快速路，像一枚二十吨的重型鱼雷射向灰色海洋上的那艘巨型航母。该敌舰竖着无数大烟囱，吐出的白烟在冬天的烈日狂风打扮下壮丽无比，然后瞬间溶解在蔚蓝之中；它有着无数条跑道，上头是首尾相接，像蛆一样蠕动的无数架吼叫的喷气机；在这些跑道边，有一种叫“树”的干枯的生灵，在冬天来临之前，他们便已被废气毒杀……当我的鱼雷也在大望桥上变成蛆时，我便遥望国贸桥边的巨厦群，想象自己正乘着飞毯飘临荒漠中的都市；当下车走向那片宫殿的时候，我又有了荆轲之心，只不过怀里揣的是稿子而并非匕首与宝图。在那些高楼之下，我总是仰起头，希望能够看见

千百片闪耀的玻璃中，能有一片悄然开启，有一个脑袋探出来注视像个蚂蚁似的我，或是望向远方的原野——我曾在北京的一千幢大楼之下驻足仰头，结果都很让人失望，而且还常被以为是在流鼻血。

每次入夜时独行在建外大街的那片空中花园下，那灿烂总让我忘了自己还没吃饭。车在高架桥上加速，前方和左右是辽远的星空，身后拖出一路橙黄的光，末端是那片依依不舍的灿烂。当我心情沮丧时，就想象自己是从那颗爆炸了的星球逃脱的惟一幸存者，然后就会十分舒畅；心情平和时， 322 路是那场灾变的一块碎片——于是我便会望向前方，并且打量自己的难友们，兴致勃勃地开始关于星际流浪的狂想；想要打击趾高气扬的情绪时， 322 路是被抛向外太空的死囚舱，这跨世纪的飞行将是未来世界的极刑——即便那团地狱之火已在天际暗淡下去时，我仍会手心冒汗，因为故宫里的元首可能会改判我个无期徒刑，用引力把我变成北京的卫星，让我永远围着它转下去——忽然，通县收费站的灯光照亮了我绝望的脸——这颗收容我的小行星上没有酒吧和专卖店，但有我的晚饭和床。

## 永泰东里3号楼4门102

根据我的预言，在房租的逼迫下，我会向城外节节退却，直至某一天和皇上的坟头隔窗相望。在 1998 年，我且战且退，到了清河。但这一年，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生活在别处啊。

关于我要出国的传闻，是真的。至于原因， BBS 上并没有说清。其实，他们只要多留心，就会搜到一筐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对这儿的音乐前景彻底绝望，愤然拂袖而去，眼不见心不烦；第二种说法是，我又重拾少年梦想，想念个美国的工程博士然后到西雅图加入波音公司，在五十岁上驾着自己设计的飞机衣锦还乡；第三种说法是，我会怀揣样带和利刃闯进波音隔壁的 Sub Pop 大楼，用我国地下精英那种九十分钟的四海牌毁掉 Bruce 和 Poneman 二老总的卡座，然后当上他们的驻京办主任；第四种说法是，我会在 Sub Pop 隔壁的英特尔总部领取六位数年薪，并在五十岁上把 Intel Inside 贴遍全球的抽水马桶；第五种说法是，美国遍地是便宜的直销版唱片和打折俱乐部，能止住我对打口、销磁和扎眼儿的痛心疾首，并使那帮牛皮哄哄的收藏家靠边站；第六种说法是，我在那次“二渠道”供货会上受到了全国书商的刺激——摇滚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个没有胸部的妓女，于是决意去挣十万美金来拍在他们面前并竖起中指，把我那发了霉的史稿出成大十六开布面精装，赠给全国的希望小学；第七种说法是，我要浪迹于那些 inner city 学几年俚语后，在《 Rolling Stone 》开个专栏，说说《中国火》《摩登天空》和《非常摇滚》的第 n 张拼盘；第八种说法则认为这只是游击战士的战略转移——当新大陆四十八个州的路牌从头顶划过，消失在我那辆绿色 Volkswagon 的后视镜中，我会去拾起红卫兵那占领伦敦、攻陷巴黎的大旗，五十岁时再度出现在祁连山北、大漠之南的丝路上，裹在破布片里匍匐前进，遥望长安……

然而在 1998 年，我正襟危坐在中关村那著名的新东方教室里，聆听老师夹着京味幽默的 GRE 战术。身边是挖着鼻孔摁着快译通的名校天才、开私车来的小贵族和想辞职的助理工程师。在这种最 Do It Myself 的人生路上，理想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肩并肩，想冒险的和想安逸的殊途同归，并且在梦中齐诵那新时期红宝书上的六千单词，扑扇着小翅膀飞跃太平洋。

为此，我又半年多没去翻打口了，乐评前辈也打来电话：“怎么见不着你的名字了？”虽然你能在托福和 GRE 的全真题里找到 Talking Heads 、 John Coltrane 和 William Bourroughs，但只有在放学路上才能获得四十分钟的听觉乐趣。

双清路连着清华和清河，连着我的教室和卧室。它算是京城最偏僻的街道了，但还常交通堵塞；路边有市政大队和中科院的生态什么所，但还是脏乱不堪。路边有骨灰堂，有尸体专运店，有十多家大酒楼、洗浴中心和娱乐城，为远道而来的人们提供多种服务——入夜，一街的霓虹与黑暗合谋，埋葬了所有肮脏，幻化出一条大道通向天堂。

每个傍晚，我学完 intransigent 的第十五个同义词后，便去我的吉他手那儿，用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向第一百个美国教授推销自己。我一出现，那个学超导的北大研究生就被迫关掉电脑上的 MIDI 窗口，到一边的氩气钢瓶后拽出他的那把 Stratocaster，让失真的轰鸣灌满那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搞得我每次都要胆战心惊地问他是不是该把气窗也关上（他那哈佛大学的表格早已寄出，所以闲来无事，并开始向法律系主任的爱女传授古典吉他）。然后，我在双清路上飞车在冬夜里骑回家去，穿过车祸现场、抢劫现场和群殴现场，在弥漫着甲三流感和四级污染的大气中，身披霓虹落荒而逃。双清路的末端是一百米黑暗和荒凉，可在这儿望向豁然开阔的前方，京昌高速路的柔和曲线横卧在眼前，点点橙光映着雪野和蒙蒙天底，一片庄严肃穆。在黑暗中，我是安全的。

穿过清河南桥是穿过途上最后的鬼门关：高速路的辅路上，一队队超载的大货车吐着浓烈的黑烟，野猪般低吼着向城里推进；那些出城的空车司机个个是一级方程式好手，互相追逐着舒解北京交警埋下的怨气；小卧车则像些长着轮子的兔子穿插逃窜，很让人疑心它们是刚偷来的。在这条繁华的大道边，四顾良久却看不到一个人影——未来世界的景象，恐怕就是这样。

白天，清河桥附近总在拥堵，让人无法想象这儿已是北京的五环路外。不过，既然又要申办奥运，情况总会好的——南桥下的那些杂物堆，就因为是作为上次国际马拉松赛的折返点，才被一夜间清掉的。清河镇再往北，便是真正的大片农田。田里竖着的如林的高压线塔，和高速路并行，像是城市的静脉和动脉。

清河是一条从西边流过来的河，泛着泡沫，夏天还散发出营养的气息。河底想必淤着圆明园未烧尽的雕梁画栋，也许还有太监的遗骸。镇上还没有这些文明的情趣，也没有迪厅和网吧，但不时会有个艺术团支起大篷，美女和毒蛇在里头表演。春天，百货商场门边有两台机器，分别是小马和吉普车的模样，总有两个孩子欢笑着在上头颠簸，而家长则在一边为这欢笑支付两块钱。唱片店里除了盗版的重金属 VCD 外，角落里竟也有 Sound Factory 的出品——那是住在永泰西里的地下艺人拿来的。惟一的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交通规则，司机看到个熟人便停下聊几句，或是开着车门在地摊边挑拣。

着在上头颠簸，而家长则在一边为这欢笑支付两块钱。唱片店里除了盗版的重金属 VCD 外，角落里竟也有 Sound Factory 的出品——那是住在永泰西里的地下乐人拿来的。惟一的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交通规则，司机看到个熟人便停下聊几句，或是开着车门在地摊边挑拣。

这儿的地摊从没被抄绝过，除了交通不畅的原因外，也因为那辆依维柯的高顶上写着“城管监察”四个如斗大字，百米之外清晰可读。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跟辆 130 ——同志们甚至从没下过车。顺便说一句，地摊上的东西还行，我那二十块钱的牛仔裤，十五块钱的、背上有个大号彪马商标的风衣和五块钱的木艺相框都没什么问题。

永泰小区位于镇东，离高速路有一公里。虽然附近是法医中心和看守所，每十分钟便有警车呼啸着进来，但那条惟一的车道并没有人修，晚上一片漆黑。夏天暴雨后其中一段的积水总有半米深，车像巡洋舰般在里头破浪前进；冬天路上的冰化了又冻，混着沙土结成月面般的地形，自行车在上面常跳扭摆舞，另一地段则光可鉴人，在那儿我总是连人带车跳霹雳舞。小区的干道倒是挺棒：长三百米宽三十米，足够我毕业论文中的那种“蜜蜂三号”超轻型飞机起降了。连结东里和西里的十字路口边，总有几辆私家小面和机动三轮车在等待乘客——后者有红色的车厢，是清河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有个报摊，我在旁边冷清的利客隆超市买了挂面后，偶尔在那儿买份比砖头还厚的《精品购物指南》。他们大多是下岗职工，而且都属无照经营。

要是晚上看守所跑了犯人，所有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要接受武警的检查——手电光在你脸上晃几晃。有天晚上我睡梦中感到又有手电光在我脸上晃几晃，才知道犯人跑到了我屋里。我大喝一声“我操你妈逼”，跳起来抽出折叠台灯（这是我手边惟一的铁家伙）就向卧室门口的黑影扑去，五秒钟后我乓地撞在厨房门上——这两毛贼把它反插上，让我眼看着他们跳下撬开的窗逃了。天亮后，我从那扇窗爬进来拔了插销，并发现该事件带来的损失是一把菜刀——我一直在想，要是当时知道他们握着我的菜刀向我摸过来的话，我是不是还有心情说“我操你妈逼”。但没死在梦里总是万幸。中午，战战兢兢的房东便叫人来装防盗铁栅。

小区里的很多楼空无一人，晚上又没路灯，自然是罪犯的天堂。六月底房改政策一变，对面那幢黑楼就开始有电钻和电焊的声光，到了十月已是此起彼落。绿地里也遍布塑料袋，在寒风中如波涛滚滚，几株枯枝挂上了，如旗帜猎猎的舰船乘风破浪。在枯枝败叶下的泥土里，睡着我的小白兔和小黑兔，在春末，它们吃了没洗的菜叶，死去了。屋里有两盆可爱的花儿，是我在生日时种下的。屋里太暗，我便彻夜用床头灯照着她们；患了流感生命垂危时，就把她们安顿在卫生间里，那儿明亮、温暖而潮湿。雪后的假日，孩子们在富康和捷达间堆起雪人，初到北方打工的青年在情人的相机前兴高采烈。我的门洞边有一行歪歪扭扭的赭色字句：“哪位女士谁的口红？”孩子们写完这招领启事，也就耗尽了失物。它可能是我楼上住的女孩丢的。她们好像只在夜晚工作。另一则启事是悬赏万元寻找爱犬，贴遍了小区的每个角落。当我站在路口边，掏出笔正欲记下那对贵族夫妇的手机号时，发现众位司机、卖报的和卖水果的、从永泰小学接了孩子的老人和出门遛狗的少妇都注视着我，让我成了某件行为艺术品的一部分。

如今，那些黄色纸片想必已全被风撕去，而那只身长五十五公分、长著小黑眼睛和菊花尾巴的小狐狸犬或许仍在那城乡结合部浪荡。它不知道，有人在彻夜悲伤饮食不安地思念它，有人在为了赏金四处搜寻它，二楼阳台上高贵的雌犬正暗恋着它，野狗和车轮在未知的黑暗中等着它，而寒冷和饥饿的宿命会在每夜如期袭来；它忘记了企宣与责编，也不知道失恋和拒签；它毛发肮脏，身体带伤；它在艳阳天下自由奔跑，追逐着超市门外的一个空塑料袋。它决意耗尽生命去书写自己的招领启事。

## 万寿 路

老同学们住的那栋楼离地铁口只相距百米，而且我离京回家前只在那儿住了两天，所以没骑自行车——在搬完家后，我把它安顿在了清河的车棚里。也许过几个月，我那相伴多年的老马就会被当成无主车扔上卡车，像面的一样回炉。那么，我在这城市的游荡也快结束了？

两盆花儿在搬家时被压弯了，令人心急如焚。我用老同学的铅笔和飞镖把她们的苗条腰肢轻轻固定，并用台灯彻夜照明。第二天，她们就好多了。当晚，我用纸箱装着她们步行去五棵松的一个部队大院，把她们托给一位老人照料。

那条路上没有高大灿烂的路灯，车道上空有一个个飞碟般的灯罩洒下橙黄的光泽，光下是大便般不畅的下班车流，在这条通天大道上形成一条光的河流。大道边高楼上的灯箱一路排过去，像是悬在夜空中的另两条光河。人行道上黑暗而空无一人，也没有一家商店，一路的墙上只有车灯投过来的怪异树影——未来世界的景象应该就是这样的。我抱着花儿，在这景象中走着。我的情人是如此沉重，我不得不用腹部顶住箱子，把它靠在胸前用将要抽筋的双臂搂住，跌跌撞撞地前进——这使我看起来像是台推土机；而且，该推土机还呼哧呼哧地喷着白气——我把热气都呼在花儿上，以免她们裸露在北京最冷的冬天里而冻僵。那位老人独自在家，他向我和颜悦色地讲述了一些最近炒股的情况。他说，他对钓鱼、书画和打牌的兴趣都不大，只对经济有爱好。

白天，我乘地铁去木樨地。地铁的通道里、站台上和车厢里全是广告。然后乘 320 路小巴从木樨地到中关村。午后的阳光从紧闭的窗外射进来，让人昏昏欲睡。每个车站上都有大幅灯箱广告。白颐路两旁的大树在两年前就被砍光了，从北图到北大都裸露着，一路的楼顶也都是广告。街上风大，并没有什么人，很像是到了未来。中关村的电子市场里倒是拥挤不堪，每个人在我贴近他或她时就会斜我一眼，并把包往胸前挪挪；这时，我会用眼神说一句“操你妈”。我穿着退色的上衣、破洞的脏裤子和沾满灰土的劳保皮鞋，在打着手机的人群中钻来钻去，挑了台调制解调器，计划回南方后向美国的教授们发起又一轮 Chinese Invasion 。

最后一晚，在开往西客站的夏利车上，出租车司机兴奋地描述一场在白天目睹的车祸：“连刹车线都有二十米！”然后我就想象着那辆三菱跑车推着那辆三轮车尖叫着冲出去，空酒瓶、易拉罐和废纸箱满天飞扬，挡风玻璃突然一片白，然后就被吹掉了……出租车在站前的弯道向上攀升时，城市在眼前旋转，而且变得开阔。人们在大厅里的计时器前合影，背景是巨型指示牌，上面显示着即将开往不同方向的车次。这些人都将离开，但在这一刻，他们只能选择一个方向。

列车出站后忽然想起，我还从没去过故宫博物院和嚎叫酒吧。向窗外望去，那些并排的铁轨在远近的灯火中流光溢彩，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把横卧在大地上的、硕大无朋的吉他上沿指板滑行。“密西西比三角洲 / 像把民谣吉他般闪耀 / 我溯流而上 / 一路前行 / 穿过内战的摇篮 / 我要去往那圣地……”—— Paul Simon 唱的是我将要去的下一站；此刻，列车在这排琴弦上滑行、加速，车厢的连接处、铁轨的每个接头和道岔都在奏出一串串 riff 和 solo ，音色像把无失真电吉他——这又会让我想起与我同一天生日的 Mark Knopfler ，唱起他最好的歌：“巨轮继续旋转 / 霓虹高高燃烧 / 我仍傲然于世 / 随我来吧姑娘 / 在爱的隧道默然飞驰……”

1998年11月7日，子曰乐队宣布解散。此一事件作为一件行为艺术作品收录于地下艺术杂志《偏执》。但事实上，这幅题为《子曰乐队的最后一天》的照片早在一年前就已随京文公司的宣传广为散发了。



# 在冬季

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抛弃扭曲的历史，可以放心恋爱、在飞机上眺望未来。我们终于有了点钱，虽说还不够买回理想，但可以买下大堆唱片、合脚的鞋子和来历不明的古怪饰物。是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可以一个人忍受孤独，在清醒的时候找点事做，可以和同住的人分享镜子。

在一个骤冷的冬天，我们有了过量的信息，三里屯变得冷清，唱片界人头攒动，笔记本上的电话号码变了但是故事还等着被说出。我们身陷北京之冬，新声和旧曲都在，我们感冒了。

而那一队叫子曰的男士，已经和大伙开过了玩笑—— 1998年的11月7号，他们说自己已经解散了，秋野在Keep In Touch的舞台上动情地宣布，表白，告别……新年的夜晚，是成都人民遇见了爻释乐队，“上帝是搞摇滚的”，天哪，秋野不打算睡觉了么？对他来说，每一个夜晚的名字，都会是新的。

鲍家街43号，我是说拥有这个门牌号的大院里又有了名叫占有欲的音乐新军，他们的师兄，另一个鲍家街43号则在新专辑里高唱：“准备好了吗？所有现存的都将不存在！”他们自己还存在着，鼓手换了老一代共用乐手赵牧阳，经纪人刚从北美洲毕业。和谣言、怀疑、期望一起，鲍家街43号迎接了暴雨将至的1999年。

我们也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世纪末。

预言家的后代都发了财，地球还在转，麦田守望者的专辑卖得有点吃力——是风水不好，还是香港混音师太笨？让我们祝福青春吧，麦田守望者已经集体越过了二十五岁。和你一样，他们也讨厌着一过三十岁就说成熟的人。无可挽回的成长来自漫天飘舞的雪花，他们在另一个现场唱着忧伤时髦的歌曲，而这个冬天，还在持续着。

“你吃药了吗？”

“这是一场运动，是一场革命！”

“你在发烧！”

“再来一份占边。这是他们的天下……”

“别脱外套，我们该回公司了。”

“我们终于抓住机会了。”



067 1998年12月，走出新蜂音乐公司后见到的夕阳。在这污染的冬天，雪更纯洁，天空更美，只是这些从来都无人注意。（欧宁摄）



1998年冬天，被雪沾染的，突然感到疲惫的张浅潜。（曹谦摄）

在冬季，北京话听起来不够响亮，像是雾气中袖着手等车的情人在谈论迟到的中年公共汽车司机。在融雪的日子里，地下婴儿被等待着，母带早已录好，计划正在实施。车上满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生的一代，他们也是被等待的吗？他们会拥抱地下婴儿吗？贝司手兼顾了指南针和更多乐队的工作，鼓手组建了地下朋克新军，只有高伟改名高幸，他还是老样子，那可恶的成人世界，他忍受着!

再说张浅潜吧，团结湖公园东门一带结满了冰，她还是那么的瘦。有一个叫田鹏的，天天在电话里与她争执，听说是为了制作那张属于红星公司的专辑，冬天嘛，脾气总是容易变坏。每一首被推出的单曲都留下了制作人的私人印记，张浅潜只在圣诞节的广州唱了清白的自我之歌，怎么办呢？她打算和张亚东或者丰江舟合作一把，你知道人们管后者叫什么？啊，“电子苍蝇”。

“这是头发变白的时候，这是猎户座从我们身旁经过的时候，这是灵魂失去水分，而大雪落向工厂传达室的时候……”这是北京的冬天，这是地下朋克躲在家里睡懒觉，而新朋克在唱片公司排练的冬天，这是摇滚英雄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冬天，这是节日到来之前的冬天，这是病毒性感冒袭击歌喉的冬天，这是精神抖擞的、忍不住了的冬天。




位于北京西城区双榆树的一个超市 （聂筝摄）




超级市场乐队模糊、温暖、靡绮的形象（聂筝摄）



## 超级市场

r m a r k e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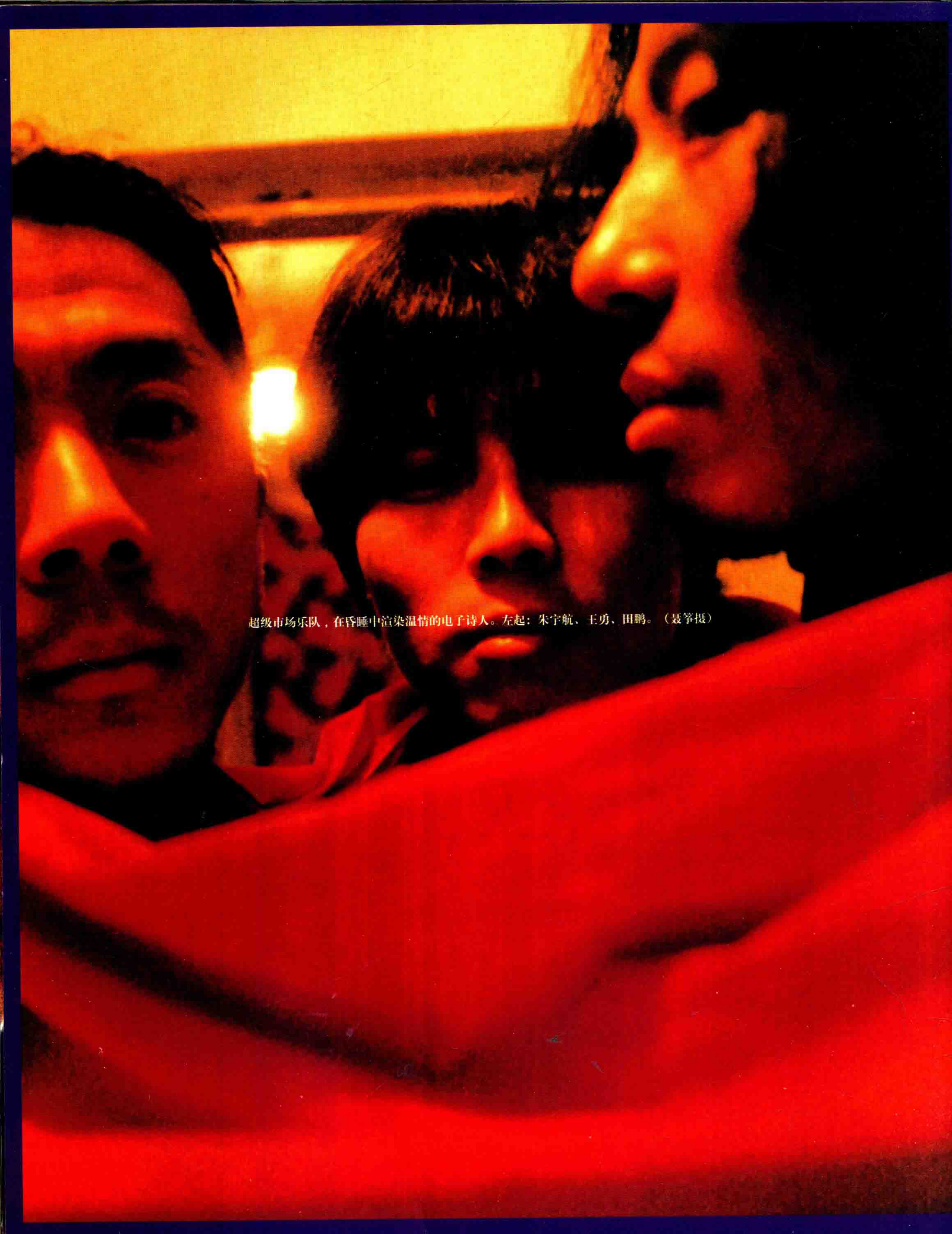
“空气感。就是空气感。”田鹏，也就是羽伞，过去的死亡金属吉他手，今天的电子音乐专家在一间地下室里解释着听觉的秘密。

音乐已经变化了。在郊区的深夜，听着渐晕的 Drumn Bass ，喝一点干白，电话，啊，美丽已经模糊了。通过寂静的缝隙，可以与那个不刮胡子的人联系起来，他的眼神是模糊的，他的记性不好，他在北京。如果我不能说他让人忘记了身处何地，超越了地域和物质的区别，那么至少，田鹏加入了这样的行列：“一切变得很快，简直让人发呆。只要还能再来，如果不会再爱。”在我的夜晚，在停水的、独自享用的夜晚，电话连接着一个高烧的田鹏，你知道，他的容貌也是模糊的，声音是慢吞吞的。

如果在无力的举止、含混的语气下面，可以埋藏热情，那么超级市场就是一个不该被分析家昭示的爱人，你要尊重这脆弱的感情，连同所有隐秘的尊严。就像是《模样》，时尚的新装裹紧了摇滚的体温，这令人迷醉的专辑早已上市，为摩登天空增添了厂牌魅力，也艰难地穿行在误会中，安慰了一个个渴望融化的大龄青年。更多的时候，人们为电气所惑，羡慕他们的酷，但这里是一个初恋机器的老炮、一个贩卖时装的个体户，一个资深的鼓手，超级市场三套车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就让采样器激动地颤抖吧，超级市场与旧日的伤痛、市井的气息同在，他们用回忆和遗忘活在声音中，出于沧桑，又召唤着更多属于未来的节拍。

在那些容易重复、被少年忘记的酒吧之夜，田鹏也会埋下身子打碟，好听的，好听的东西就在手里了，像理想，甚至还可以拥有来往的人流和灯火晦明的空间。让那些都流动吧，“我要为你而付出感觉，”田鹏说，“而自己做二十首才能有两首好听的。”“为了生命我要微笑着哭，献出可爱。”看，这个不说话的奉献者。他拥有卧室、首都污染严重的空气、搜寻打口 CD 的朋友，还有涨了价才买到的新机器，他拿什么奉献给你呢？除了感觉押了韵夸张地唱出？是啊，时尚是不存在的，这个人感冒了，没钱了，等待着变化。

而我只记得一个问题：“如果停电了？”田鹏缩在椅子里回答：“那就想想上哪买蜡。”那一天依然是老式的问答，人们管这个叫采访。田鹏有的是严肃和坦白的美德，但我们还是要找个地方彻夜锐舞，用脱水和缺氧后的身体向他致敬，“I love you tonight”，超级市场是躲在超现实主义幻影中的忠诚情人，我们是暴露在变迁中不能超脱的时代主人。



超级市场乐队，在昏睡中渲染温情的电子诗人。左起：朱宇航、王勇、田鹏。（聂筝摄）

## 1998年12月1日 给欧宁的秘密报告

又一次，哈着气，搓着手，我成功地骗过了出租车司机。我是说，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亲近，我又装成了北京人。

“顺着三环飘过去，怎么样？”哼，你以为我喝高了吗？失败者才飘呢。我要穿越城区，哪怕迟到。我要证实见闻的可靠性，一路上看见主唱的妈妈去邮局领包裹、混音师的女朋友从学校出来。

我没看见那个皮夹克上写着“PUNK”和“地下婴儿”的 David，他要做一个主页，chineserock.com，他真忙啊，在中国丢掉了手机；当然我也没看见脑浊、69 和 Anarchic Boys，最先发现他们的是个富于正义感的摄影记者：中国不需要鸡冠头！而那个新的秘闻是这样的：这三队地下朋克得到了北京市旅游局的秘密资助，在嚎叫酒吧，来看演出的全是老外！车窗外，朋克是看不见的。他们讨厌妥协。

但是在今晚，我约好了老崔，他将在月亮舞酒吧看小翁打碟，酒吧里没有客人，翁金海也不是红烧肉乐队的吉他手了，我要告诉你，老崔的专辑被理想主义者做了手脚，癫狂的采样和音效被抹掉啦，难怪它听起来不够爽。他最喜欢的乐队是舌头——“你看他们的人格力量！”他的 G-shock 被没收啦，不过，这样更便于挥手，捉住你我容易缩水的、狡猾的人格。

我要你保密的是，丰江舟已经买了房子，他就是那个设计师，“苍蝇之夏”，他的新软件可以用来混音，可以提高音调却不改变音色，今年秋天，丰江舟已经摸透了它，用它影射北京新音乐，隐去群众的恶意，用密码记录年轻乐队的活力和经济学。另一个南方来的叫祖咒，其实姓吴，和他交谈后你会得到一个新乐队——木马，在练功达到了七级之前，还有一些宝物藏在祖咒的朋友王凡那里，你得用武器跟他交换，用来给别的新乐队做教材。这不算是 RPG 的玩法。如果玩腻了新游戏，就去打开他们的八轨机，北京市民在那里存放了陌生和愤怒的抒情。

要记住，看演出的时候千万别盯着乐手的手，否则会被当做过时的技术狂。有一个文件说，他们必须去电台解释到底看见了什么，可电台太挤了，要张有待开介绍信才行。每一个人在早晨都匆匆忙忙，你却将在夜间出没，跟大群不知从何而来的男士交谈，他们中也有女的，但不必问得太多，爱情，那也是秘密。你知道，天黑以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将你灌醉，演出会被忘掉，你吐出的真言却会触动他们笑容下敏感的心。

天太冷了，时尚被冻住了，你将发现真正的北京。在暖和的地方，总会有人进来，哈气，搓手，谈一谈他妈的钱可真不好挣，这时候连天才都懒洋洋地坐下了。新音乐是孤独者的集体运动，它更怕冷，请它喝杯热的吧，你安慰不了它。




清醒乐队替大家抛头露面，无意间左右了潮流和风向。左起：刘维、于凯、沈黎晖、一环、张阳。（聂筝摄）



## 清 醒

看来工艺美校可以改名字了，比方说“北京工艺美术时尚音乐学校”什么的。清醒刚刚名满天下，就又带出了新裤子，听说还有更多的……而沈黎晖，是他让人们忘了丁武也在这里上过学，他在时代拐弯的地方转乘新的航班，降落在一个没有愤怒和终极关怀的地方。

有人怀疑他和他的清醒是英国组装，这有点道理，因为小沈的摩登天空公司是在那儿注册的，他们的清新也多少透着些 Brit-pop 的新鲜气息；不过，拆开来看看机芯还是北京的，血里还流着中和的中国情感，他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把旧工业时代最后的体温留在了记忆里。都城还是原来的，但是它的言辞在变，如今的田野还照着落日，街道却变得气派美丽了。广大的群众的确还身陷物价和单位的包围，但是也该有人和国际一起成长，培养超脱的新习惯。清醒从职业到衣裳，都那么地忠实于 PC 和 Fashion 的人群，这大概不能算是自私。一环是职业鼓手和音乐制作人， 1997 年他戴着大号眼镜，像《迷幻列车》里的 Spud ；张阳管着吉他和键盘，可他还是北京电视台的录音师；于凯弹吉他像抒情的古代书生，这跟他在国际航空的差事没多大关系；刘维终于有更好玩的事做了，他去拍电影，留下幻想型的贝司给另外半个刘维弹。那么沈黎晖呢？青年资本家、词曲作者和迷幻的主唱、分裂的梦游者、天才的文化产业操作人、独自冥想的新青年……别说了吧，在小沈的梦中，神秘、阴郁的电影不断上演，那些清澈的形象和无端的威胁是多么美，它们具有未知的能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许梦才是真的。也许在简约健康的生活中，梦才是时代的记者。

那时候沈黎晖住在东方红炼油厂，在没有父母约束的时候他目睹了山影和废弃的机器，和下一代将会听说的一样，那灰色、迷蒙的建筑群就是抒情的源头。那时候沈黎晖也泡在苏珊娜酒吧，在那摇滚的“旋涡之底”，纵容内心所有的逃避和恶，《摇滚 94 》，对，摇滚和背叛生活的青春。那时候沈黎晖是个虐待小动物的冷血儿童。那时候沈黎晖爱上了 Lucia ，“我要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你容颜”。那时候沈黎晖从床上坐起，把生命分出一半留在梦中。那时候已被遗忘，清醒乐队毕业，演出，隐匿，又收集了工业天空下的秋意和回忆的残片，汇入轻舞的现实。那不为人知的时刻，清醒拥有音乐之外的生命，而小沈，他有着另一次生活，他是忙碌的、被梦做出来的过客。

那时候，我们在花园桥告别，试着在幻影中清醒地劳作，随身带上了世纪的背景。

上、下：清醒乐队（聂筝摄）





清醒乐队《永远的一天》 Music Video 画面。导演：刘维。（刘思帆摄自电视屏幕）

## 1998年12月29日 我的外地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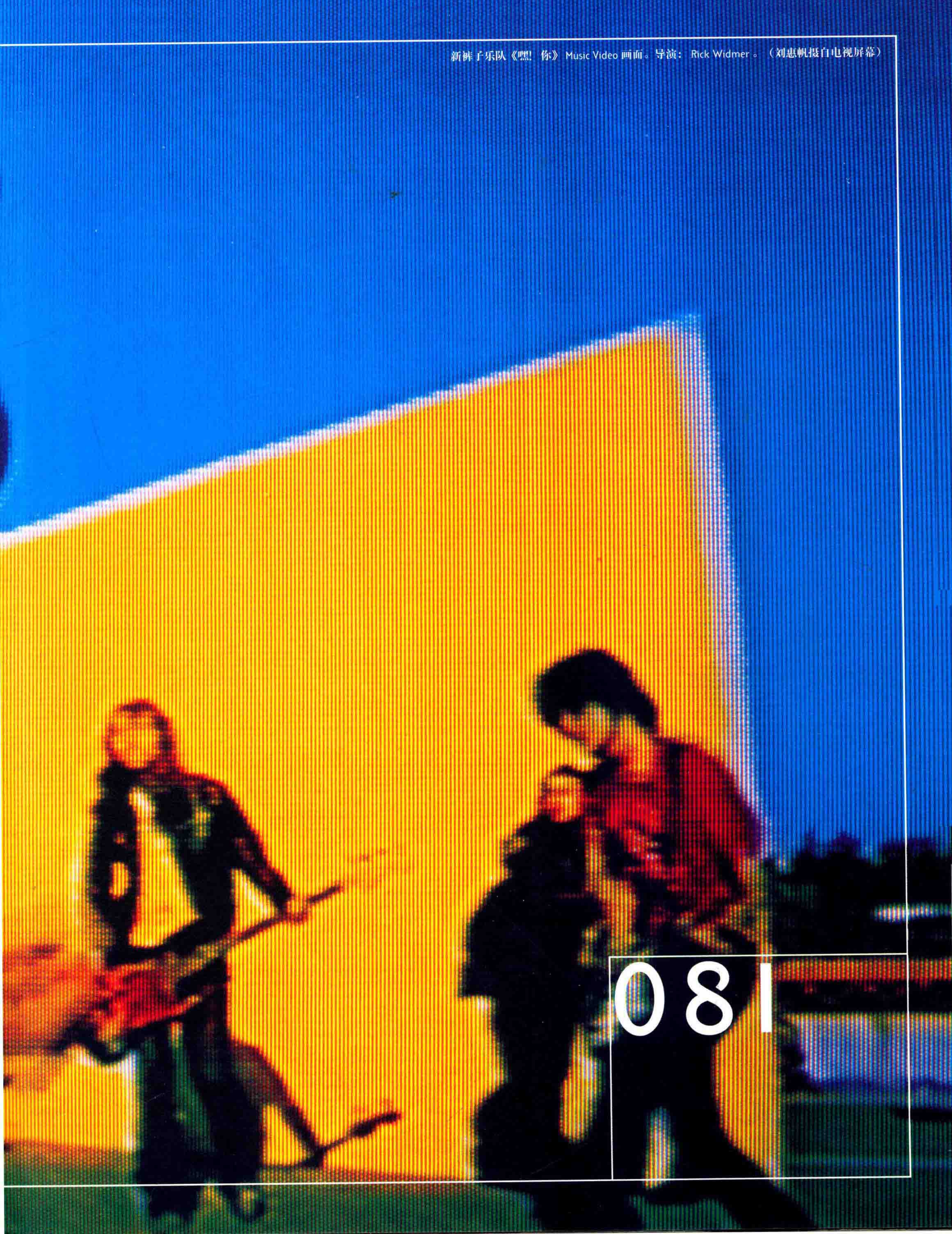
一场没有中心的演出，一群互不相识的演员，这寂静的校园之夜也挤进来了巨星和校园歌手。是因为爱心要献给患病的学生，还是……“以音乐的名义”？

在有领导和班主任的礼堂 ，读书人微笑着，为每一首歌鼓掌，他们的同学此刻正伫立在门外寒风中等着签名。那个睁不开眼的湖北小个子坐上了板凳：“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啊，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可是我的外地外地外地外地外地口音……”可是除了这个名叫胡吗个的方言民谣歌手，还有更多异乡人潜入了首都，穿行在拥有亲戚、住址、标准和奢侈的宽容的人群中。他们既沉默，又善变，顾不上跟所有的熟人打完招呼，就躲进了二楼的阴影中，交谈并且偷偷吸烟，等待着一队叫花儿的中学生和若干地下朋克。当然，越来越多的青年从舞台面光中出来，高潮被一再抹去，少年心气要在终场才肯喷薄，地下朋克——啊，多么难忘的体力、发型和态度——看来也不能在这里放纵了。有人拿着对讲机呼叫灯光老师，有人说低频怎么这么重，有人向邻座借笔记，舞台总监在看表，那二楼的一伙正在引用胡吗个的歌词：这个，我说不好！这个，我实在说不好！多么平凡的夜晚啊，他们也是你的邻居、文化的分摊者，他们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大龄朋克、一个来自南京的狂犬主唱、一个四川籍非主流文化贩子、一个兰州的小报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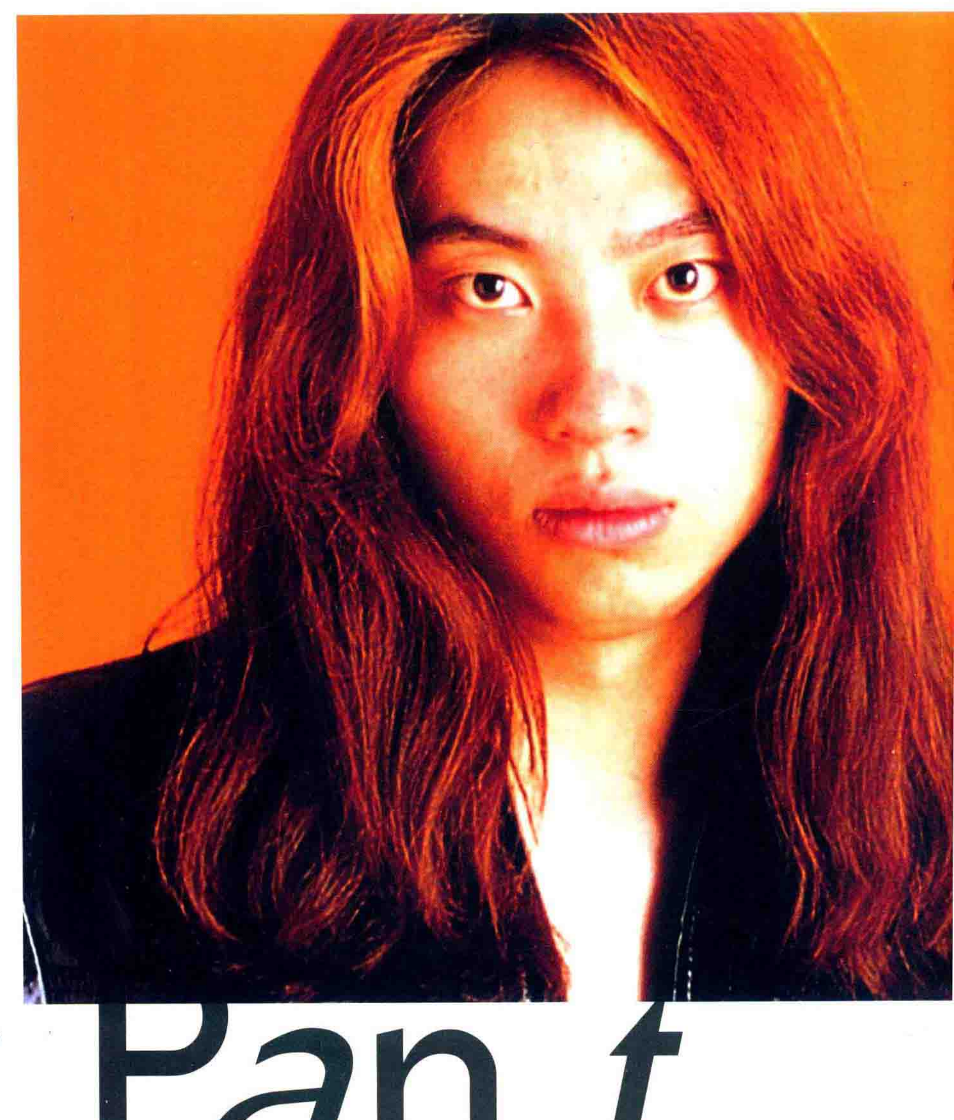
自从毛泽东，啊，不，自从另一个湖南人带着小说和抱负来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少过混杂的歌声。没有人知道北京在哪儿，他们只是住下来，搬家，去邮局、机场和火车站。从服装学院到望京新城，从丰江舟凛冽的高楼窗口再到遇见新疆电影人的火锅店，又一个夜晚被奉献给了北京。所有的街道都总会空无一人，街灯总会亮着，有人打量着车窗外的建筑和口语，说无所谓城市村庄，也不存在心灵是故乡。他的小本上记满了古怪的句子，包括这场永不结束的演出，和另一个深夜街头，紧张、放肆的歌唱。快给他一张床让他休息吧，没人在乎他的外地口音。

那又是谁，心怀蔑视，夸张了被拒绝的苦闷，却带上了姜文的口音，指责舞台上本分的长发琴师？——人家只是带上了腔调，夸张着兴奋来掩饰自己啊。他的效果器是在杭州买的，他在上海磕破了膝盖，他也不是山西的女婿，他住在地下室，在跳槽之前，他打电话告诉旧日恋人：北京人太圆滑。我不回来了，他说。他就是北京。


080



新裤子乐队《嘿！你》Music Video 画面。导演：Rick Widmer。（刘惠帆摄自电视屏幕）



# New Pant

## 新裤子

新朋克就是如此没心没肺，别人都在研究痛苦和不公正的起源，新裤子却躺在专辑封面上模仿古典名画——一切都是爱！我只能爱你到天亮！我愿意享受痛苦的每一天！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声音的力度已经换了方向，新裤子因为乐观而遭受挖苦，却又拿形式催开了同龄人的胸怀。二十岁，谁都是忧伤和敏感的，只不过，换一种口气就可能得到快乐，那他们为什么不呢？

被画成绿发卡通的叫彭磊，据说他的鼻音是因为经常对生活失望所致；鼓手像个弱智的坏人，看来没照着尚笑热情的原样画；还有一个染了长发的贝司手刘葆，也是咧开嘴傻笑着，他平时可是很文静啊。他们愿意牺牲美好的形象，要给消费者幽默和惊奇；机器、恋爱、搞笑、游戏、快感，一个身体的乌托邦已经存在，就看你是否真的需要了。米歇尔·福科所激赏的服饰文化曾经还是哲学文献，而无数次重复之后，快捷时髦的装扮却在琴弦上聚成了朝霞。是啊，朝霞并不是新的，但它总能让人冲动，朝霞也是弱智的，但它直接地唤醒了生活。

看起来没心没肺，新裤子乐队（左起：刘葆、彭磊、尚笑）只让同游的少年感到亲切。但他们……够酷……（宋晓辉摄）



S

没有人真会以为世上只剩下了爱，就连彭磊自己也不相信，可他喜欢这样，既想知道“普通人不正常的一面”，又要从日子里选取犬儒的乐趣。兴高采烈的和声可能只是爱的幻景、无端乐观的粉饰，可他们的同龄人早已把幻景当成了真的，多少悲欢都是重复过的，只是短暂的兴奋总那么美妙。新裤子的野心就是将自己的生活和盘托出：请看，这是烦恼，这是挫折，这是无能为力，可我们习惯了，这是没有禁忌的想象力，但不需要太多，这是 Rave 式的最低限度的集体主义，这是任性和自私，我们需要，这是日复一日的自大狂，请别当真，这是灾难，已经被删除了。好了，漫画青年来了，穿着赞助的名牌牛仔裤，新的。

要说这中间有个写小说的，那没人会想到尚笑，瞧他精力过剩的样子！当然，他不是小说家，反正写作也不是天才的专利，这就像牛仔裤一样，人人都可以穿嘛。如果有人对刘葆的金发表示异议，反倒会显得自己太怪。长发也不代表什么，音乐也不代表什么，写点东西，或者早早废了童子功，这都不值得吃惊，该吃惊的正是自由，良民的自由，浪费时间或者放弃痛苦的自由。新裤子也是京城无数迷恋 Ramones 的青少年中的一队，是为了律动，为了物质的前进和肉体的节奏，可别以为他们会像英格兰老青年那样叛逆，不，他们是社会的好兄弟。因为 Ramones 也没有什么，这座城市允许更多男孩把无聊的生活过成朝霞一般的、享乐的！



彭磊——躺着的新朋克，如果不能做更有趣的事，那还是躺着吧。（聂筝摄）



彭磊在医院。他在想：这是我们的时代吗？好吧，如果是，那就挨着。（聂筝摄）

在捕捉北京新音乐的路上，总要一再地穿过胡同，
与妇孺或大汉擦肩而过，并且一再地路过旧景和五谷轮回之所。（甄筝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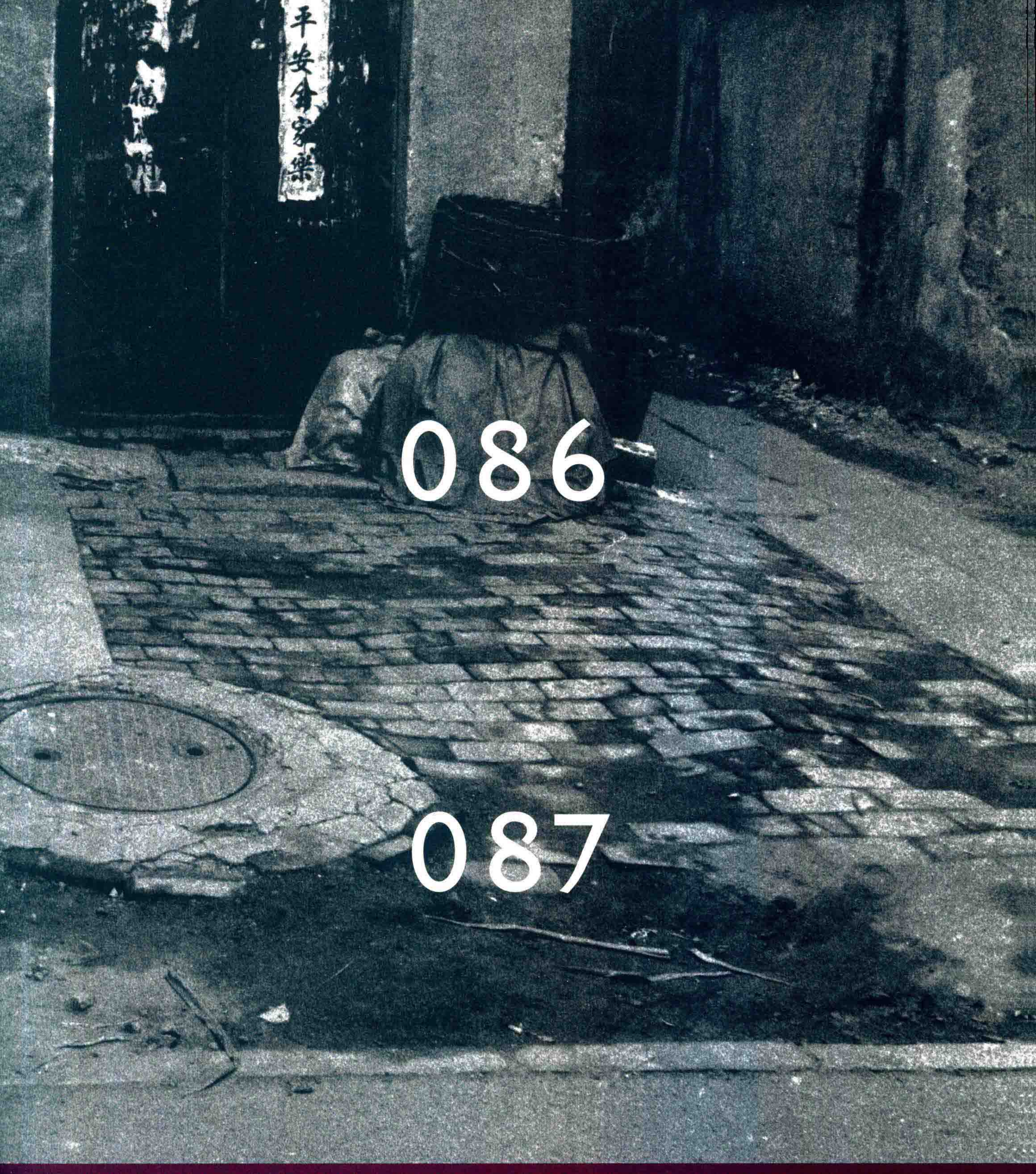


## 外省人的梦

那一年，她告诉我兰州没有她喜欢的环境，“我怕有一天我会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后来我变了心，打算就此做一个真正的兰州人，阅读中亚考古著作，考察河西走廊，帮助本土摇滚势力颠覆封建的首都音乐政权……

北京还是让我着迷。马路宽、卫生好、心理健康，人们见怪不惊。这算不了什么，我知道是别的东西让我着迷，在这里人们似乎不必为生活感到恐慌；瞧瞧兰州那些可耻的暴发户和在绝望边缘挣扎的吉他手啊，就连最优秀的大脑，也不得不屈尊于井蛙的攻击和赞扬。这让人气闷。

一个偏执的梦在东单诞生。我梦见怒火，雨水熄灭了月光；我梦见她梦见了我，一纸荒唐诗篇；我梦见我黑暗了；我主要梦见操着方言的大汉在尘土中咒骂，仇恨注满了汽车站附近的地下赌场，生活遥不可及……这太奢侈了，在



首都静谧的夜晚梦着伤害。“啊，我的青春是一场长梦多好！”我梦见爱伦·坡破败的少年时代。但是我醒了，收藏起外省人特有的失衡心态，去阅读一条诗意的大街，那里奔驰着有限的自由，但至少比别处显得开阔。这音乐和权力的马戏场上上演着更多的梦，剔除小地方来的狭隘和错误后，一切都宽容得可疑。

我其实还梦见了工资单和蹩脚的外语，被夸大了的快乐中，只有性爱是朴素的。

临走前我在劲松呼了她。“喂？”“喂，是我。”她把电话挂了。我梦见野蛮的力量推动着命运，它把一个省会和首都联结在航班上。但我没有梦见降落，邻座的女士说：“哟！掉点儿啦？”



秋天的虫子。彩铅画，27cm × 33cm，樱子作品


秋天の虫子
在任何一个角落里
ve'are Fall Inse
蠕动着没有选
在文し商业利益
没有谁是真の将
我們也并不真の懂
只有让時間証明一
可行の.
INSECT



秋天的虫子在假装深沉。左起袁琦、樱子、高飞、牛青。（时晓凡摄）



秋天的虫子乐队 （上：聂筝摄 下：时晓凡摄）




## 秋天的虫子

怎么能把他们当成日本乐队呢？是不是打鼓的高飞留着太帅的寸头，或者主唱樱子有太多向上拐弯的尾音？他们是广告上“今年最牛×的乐队”，三个东北客和一个杭州女孩，他们是纯真得不合时宜的虫子，在永远的秋天。

迷笛摇滚学校一带的夜色荒凉寒冷，一间间地下室轰鸣着祖国各地的追梦人。“这不是天堂。”虫子在唱。隔壁的木马来自三个南方省份，他们有抑郁的热情，他们在冬天流汗、爆发。拐个弯是迷笛的学生在排练，虽说黑豹、零点之声在地下显得可疑，但生存要求他们去卖唱。这些排练房每月三百，不配设备，可以住，可以培养纯洁思想，或者让压抑日积月累。在远郊，通往中心的路途并不遥远，但毕竟只是临近而已；秋天的虫子刚签了新蜂音乐的演出约，他们不多说话，只在回来的路上大笑。

王凡和祖咒也在那条路上出没，还有舌头。他们住在附近，已经先行一步，拿先锋音乐和地下摇滚吵闹着首都。高飞也加入了他们相互客串的行列，为王凡漫长、混乱的巨作打鼓，但一回到樱子笔下，又马上“头上少毛，性格耿直”，从神秘主义返回了低调的自白和单纯的唯美。看过《燕尾蝶》的经纪人一定会试图再培养一个固力果，但虫子不是“第三类文化儿童”，樱子也没有流畅的童音欢歌，她会随时由羞怯进入夸张，呻吟、哽咽、呼喊。她爱牛犇。牛犇弹吉他，二十五岁，命运教会他忍受。在这其貌不扬的人对面，袁琦长发闪亮，贝司上低音涌动，生于1981年。他们住在北京的边上，他们是北京人了吗？

“唱唱唱，唱点希望，不停地唱，别想死亡”，或者“我们总躲藏在空虚的角落里等待着黑夜来临”。暗藏的暴力何时迸发？后朋克还是新流行，或者在两者中间自发地寻找“单纯和美好”？沙里耶，沙里耶，一边走，一边唱，秋天的虫子是没有家的北京人，这城市会检查他们的暂住证、务工证、临时身份证，但也会给他们舞台，给他们几个朋友、几个梦想，他们是讲普通话的北京人。自由或是放荡，总之没什么方向，他们见识过圆明园画家村的兴衰，也目睹了娱乐文化的规章制度，有的人回老家了，有的还混着，虫子们则一不小心唱出了另类的味道，这正是人们需要的，他们就在希望边上住下来了——就算是酒吧里只剩下了潮流，虫子还有《蝴蝶的翅膀》可以低回并绽放。隔壁的木马已经签了摩登天空，用受困的敏感挑战成名地下战士；楼上的老师靠讲课就可以继续摇滚，那是铺路的一代。而现在，秋天的虫子还是与天真为盟，讲述世事艰辛，直到把灵感打造成风格，连潮流也不能再说些什么。

“难道这就是命？”樱子也会高喊，在虫子坚强的时候。



樱子和牛犇。房子是租来的，乐器是买来的，音乐是……（聂筝摄）



 向着你瞄准的袁琦。（聂筝摄）

四年前，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与音乐素无瓜葛。那时候大烟鬼式的时装模特刚刚在欧洲露面，北京满大街都是年轻的胖子，我骑着女友借来的自行车从他们身边擦过，街上飘着各种炸鸡的香味，让人觉得这样一天天闻着阳光灿烂的气息，很快也会像北京小伙一样拥有舒服的小肚子。

而这次一下飞机就被桑拿般的湿气所包围，养出了小肚子的我躲在出租车里，让空调暂时隔开车窗外大汗淋漓的夏日——我发现小胖子们不见了，夜幕下，晨光里，走来走去的是有骨感的一代。他们穿上了新的时装，紧身而且中性；剩下那些用大裤头和T-Shirt休闲起来的男青年、穿着短裤并且不化妆的女青年

# 炎热的首都



还像过去那样亲切。我总觉得，首都就应该像这样，满足、随便、干净、大气，有好多新潮玩艺儿也懒得使，遗憾的是后者的数量正在减少，他们脸上的从容已经保留了好多年吧？怎么突然间……

有好多歌词可以引用，它们都能说明这两年的变化，政治的压力无非让人郁郁寡欢，经济繁荣却是真的减肥良方。瘦一点是好的，它说明中年人忙碌而且井井有条，青年人精明务实，少男少女超越了暴力崇拜，只有土财主和托拉斯资本家才大腹便便呢。我擦着泉涌般的汗水想：再这样热下去，一定会汗出不止，直到脱水变成骨瘦如柴的新人类。



什刹海附近，阅读者，敞开的门。而我们只是路过。（聂筝摄）






人们把他们称做“中国的 Hanson”、“北京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他们叫做“花儿”。左起：大张伟、郭阳、王文博。（聂筝摄）

# The





简直是没有活路了，有人惊恐地自语。

三个小孩子摧毁了十年理想，这歌唱的一碗饭还怎么吃啊？就像花儿所签的公司名字一样， New Bees，牛逼死。好容易熬到世纪末的战士们一下子都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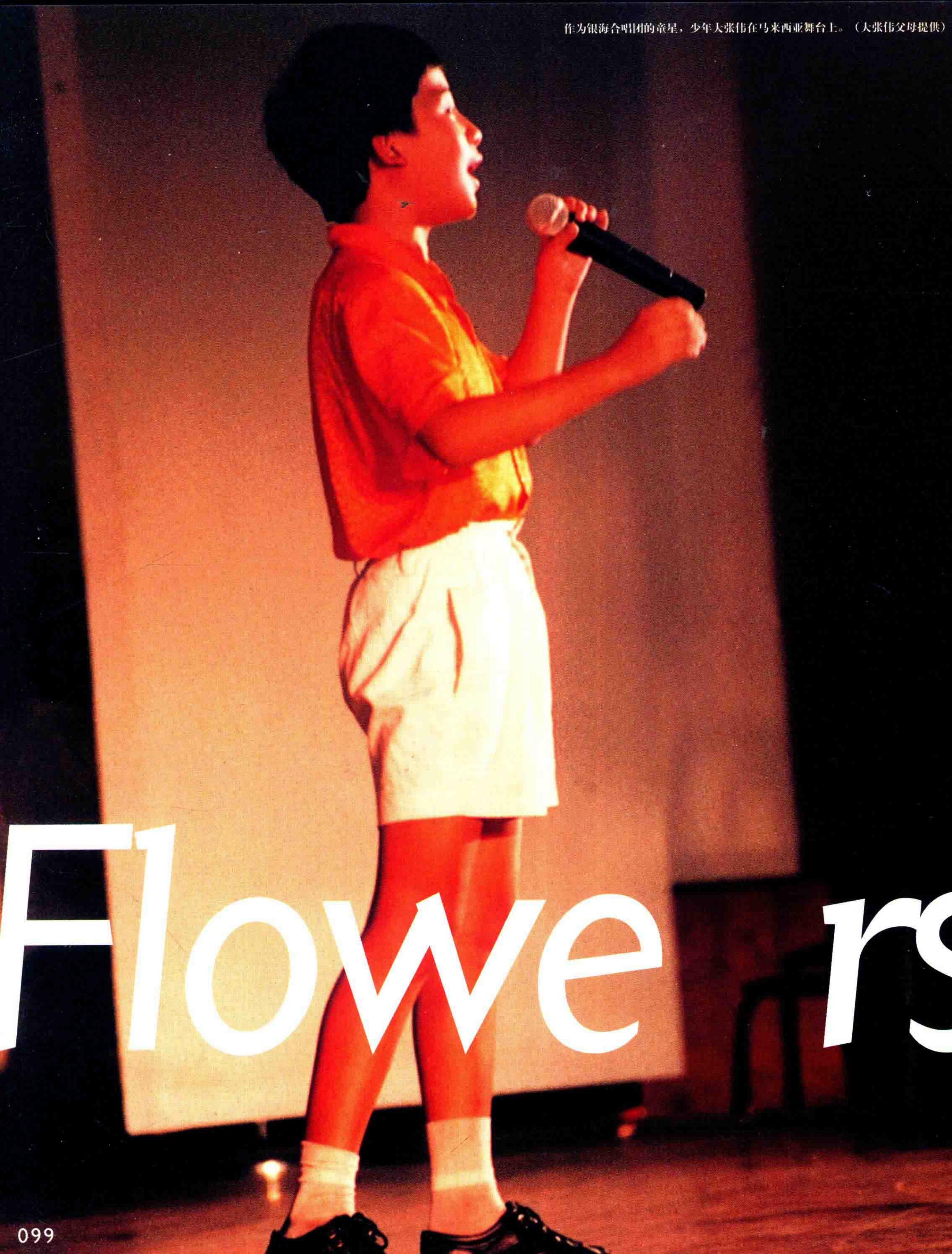
可这一伙还吃着零食，向经纪人保证完成作业。有人在一盒现场录音里唱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哥儿个像没听见一样；有人询问教育改革的前景，回答是唐朝听起来太麻烦了；也有人呆头呆脑打听生命在哪儿，这可是件大事，大张伟献出歌词：“我放弃了所谓的理想，用真诚接受埋葬。”更多的人欣喜若狂，像成年人一样陶醉在人家的青春里，而青春喝足了阳光雨露，对未来一无所知，对变化猜得都累了。

是否该融化在这时代？问题是，这是谁家的时代？都说是他们的，可年轻又不能当饭吃。两个刚考上高中的，一个从影楼辞了职的，风驰电掣般包揽了希望，可他们的同学还没机会挣钱，周一到周五得看老师的脸色，周末挤上公共汽车被人踩了脚还得忍着，希望的火花充满了胸腔，花儿和别的少年一样，就这么静悄悄地怒放着。整个的虎年，时代还是时代，没有人融化，花儿组建了，签约了，还被眼疾手快的唱片工业推出了。中学生委屈的身体被他们打开，先别管有多少力量，蹦起来再说——最好是大人们忙他们自己的，这里没有思想和危机，也不斗争。

如果说到天才，那么兰波算一个例子；如果指摘电脑儿童，那么你眼里的都是。大张伟和他的初中同学王文博分别热爱着周星驰和 Jim Carry，而戒了烟的郭阳也不会把《香港制造》或《迷幻列车》挂在嘴上，用不着生活来收买，哥儿个本来就愿意快乐。要创造主流不是什么难题，花儿写完作业就进录音棚，只要电源接通，嗓门亮开，就有足够的灵感从喜怒哀乐间迸射，谁让他们干净、聪明，还热情呢？“喜怒无常”在歌词里出现了三遍，也许还不止，“现实”后边没有跟着“主义”，“美丽”被用得那么新鲜，“无聊”也很可爱。“欲望”？欲望就是感觉到了身体在生长，明天依然很漫长。新朋克的旌旗已经猎猎舞动了，他们却无动于衷，反正快乐不是拿荣誉能换来的，他们是没功夫当偶像的一代。

他们也是没有机会变态的一代，安定团结的一代，十年以后，他们不会被艺术史收藏，但没准多事的社会学者还要打开电脑，搜寻被称做奇迹的往事。“人们说你的未来充满希望，我担心永远也打不开翅膀。”大张伟还认识一个叫小张伟的，那孩子也这么想，可为什么他就没能进入时尚的封神榜呢？是因为他写不出如此流畅热烈的音乐，还是他已经替花儿实现了贪玩的理想？

花儿乐队 （左：聂筝摄 右：宋晓辉摄）




作为银海合唱团的童星，少年大张伟在马来西亚舞台上。（大张伟父母提供）



# 北京

位于大张伟家附近的香烟店（欧宁摄）




# 巴 黎

位于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杂志店（欧宇摄）

在《红与黑》1979年中文版的第四页，有人翻到了这样的一句："在这暗淡的天色底下，有一个贫穷的少年，他只有一些野心，因为他的心又细腻，又热情……"他的心也变得热情了，经过时光和空间的变迁，还有什么比第一场陌生的大雪更让一位异乡少年激动呢？两个月以来，北中国干燥的气候已经让他麻木了。

人们把北京称做文化中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位回到广州的主编对他的朋友说："再不要鼓吹你的演出了，这样会被人耻笑的——北京的每一个周末，都至少有五场演出！"尽管大多数长年客居北京的艺术家并不能确定自己的归属和身份，但他们的朋友、作品也都和北京方言词汇一样，悄悄地增加着。在今天，马太的标语早被改写为：那繁荣的要再增加新血，那冷清的地方要被抛弃。"去北京！"这句话是十年来外省乐手寻找理想的快捷方式，他们找到了风景，他们也是风景的一隅；他们发现了风格，他们也是风格的一种；他们撞见了机会，他们也是机会的一份；他们加入了生活，他们也带来了生活。他们来学艺、张望、加入乐队，甚至像西安三杰那样出人头地；哪怕是为了一个周末的五场演出，也值得热爱摇滚的高中生暑期一游。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新音乐需要演出机会，但更需要集体，需要口头传播、方便面青年和打口青年，需要模仿和竞争、风格或嘴脸，需要更多的地下室和酒吧，需要好心人、艺术学校、美女和同志。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们需要和眼界宽广并且能借钱的人挤上同一辆公共汽车。

因为没有暂住证和干净衣服，有些人在各种节日来临之前被收容、遣送，不过更多的还是足不出户，疯狂地、夜以继日地独奏，直到有了乐队，排练，靠演出或者靠约翰·丹佛来养活自己，直到被写字和扛摄像机的人认识。猫有猫路，狗有狗道，最后他们都会在迪厅和酒吧里握手，构成沉默的观众，或被谈论——没有这些变形的普通话、谨慎的京腔和私下里的家乡话，北京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央视文艺晚会的主持人加上小品里学说方言的小丑吗？

反正，在这样的世纪，谁都是没有故乡的。






蓝格床单。油画，150cm×110cm，宋永红作品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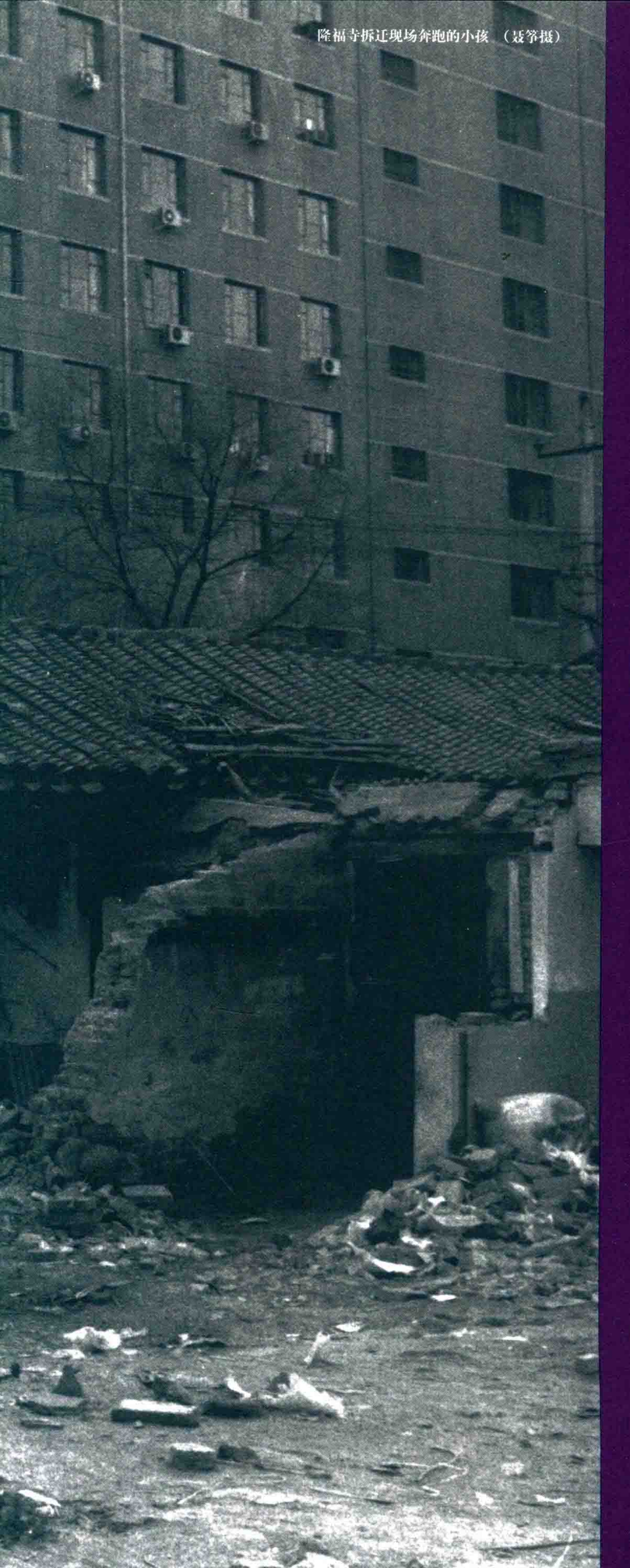
他们中间坐着儿子，人们叫他大张伟。（欧宁摄）

新裤子在凛冽的空气中中速行走。（聂筝摄）




 I WAS A TEENAGE PUNK ROCKER（我本来是十几岁的朋克）。Tina Chang 作品（取自朋克杂志《建设》




隆福寺拆迁现场奔跑的小孩 （聂筝摄）

万物沉寂敌人正在树荫下休息
今晚有人对我们说巴黎已经投降
我永远不能忘记丁香和玫瑰
和我们早已失落的爱情双双
初春的新花丁香佛兰德的丁香
死亡在柔弱的花枝上不断装饰
而你恬静的花束温馨的玫瑰
那远方昂儒的玫瑰一片火焰颜色

——《丁香和玫瑰》，路易·阿拉贡，1940.7

这不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也不是巴黎，这是心脏。市民的爱情，国家的隐私，都被混合在血液里，流向远方光荣的广场，或者楼下干净的玫瑰。人们像梦一样聚集在这里，与世界握手、分享智慧和愚蠢，有时候，他们也会离开，像休止符离开了乐曲，来到某个无名的、有个性的小城。也许，只有能和同类日夜相见的地方才可以称为故乡？那么谁是你的同类，在香舍里榭一同偶遇秋天的高傲恋人么？

最懒惰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分作新朋克和地下摇滚两个阵营——阳光下快乐奔跑的花儿、麦田守望者、新裤子，和苍蝇、NO、王凡、舌头、微。给A面添上时尚的清醒、超级市场，给B面增派另类的张浅潜、木马、胡吗个，这种分化还可以尽情地陈列出来，直到教条的判断把活的声音切成两半。是的，从新朋克开始，主流摇滚乐终于开始了壮大，一代人自己的声音、中产阶级子弟改变世界的前奏、主流文化内部的裂变……这些人将是社会的主宰，而他们派来的新朋克才是拥有广泛心声的基础音乐，他们将是心理健康的、广大的、有所作为的。另一边，跟一切俗念对着干的则是被称为先锋的一伙，艺术，或者本能的创造与狂热使他们孤独得近乎可耻，地下摇滚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以致于变态和天才混淆，装蒜和伟大同居，标准在不断变化，但我们知道，自私和独立有着如此相像的面孔：它们都将被群众抛弃。

可以这样区分。但还有宝罗与苏放的幻美声音，还有69、脑浊、Anarchic Boys的极端态度，还有舌头后来的盛大声誉，以及野孩子忠诚的大地情结、鲍家街43号固执的思想路线。你怎么能把北京锯成两半，一边是幸福的牢骚，一边是压抑的秘密？！

要么就以土著和移民相比较？亲缘、户口、收入和业余的态度将是主流摇滚乐的前提，新裤子说摇滚乐就是娱乐，那么它就将在趣味和商业中开发出潜移默化的伟力。而危机、理想、不归路和失败则据说会导致艺术家的猛增，“你看看他们的眼神！”崔健说。你看到的将是阴霾，近乎偏执的纯洁。几年来，在已上路的丰江舟和祖咒之后，外来者由学习转入了表达，并且蜂拥着组队冲上舞台。在NO和王凡的影响下，潘文林终于在他第三次进京后举出了罂粟少女这块招牌——批判现实的噪音爱好者一个个都来到了北京。不过，以上的分类只是对派出所、居委会有用。安逸的对面是危机，这就意味着阶级论调蒙蔽了音乐场景。土著也在流浪，那三个叫做“挂在盒子上”的女孩不是连打车钱都被剥削了吗？ 她们比地下婴儿更苦闷！而穷苦的音乐移民中，又有多少人死于平庸、疯狂和加倍的媚俗？苍蝇的两位日本乐手，或者神经质的夜子和陈底里都可以向你证明，他们的户口与风格之间并无关系。而一支叫微的新乐队，又是从祖国各地出发，在北京相遇的神勇贫民，你看看他们的眼神，这样你才知道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没有后路了，他们只好将观众摧毁、震撼。



每天醒来，沈黎晖都会用笔画下他的梦境。（欧宁摄）

超级市场正在将身边的每一环境幻化成舞台。（聂筝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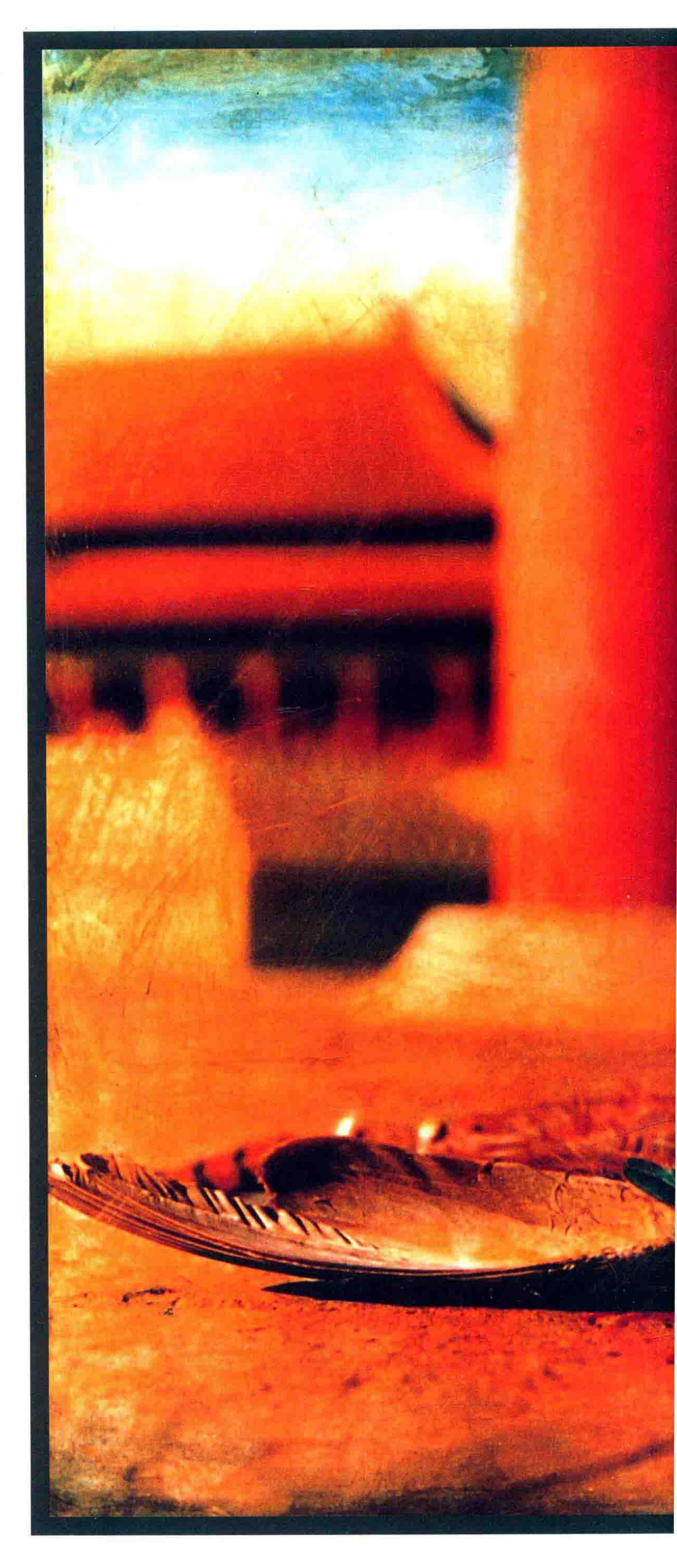
作为主唱，樱[illegible]并不经常展示她在纸上的经历，华美、暴力的人间幻象。（聂筝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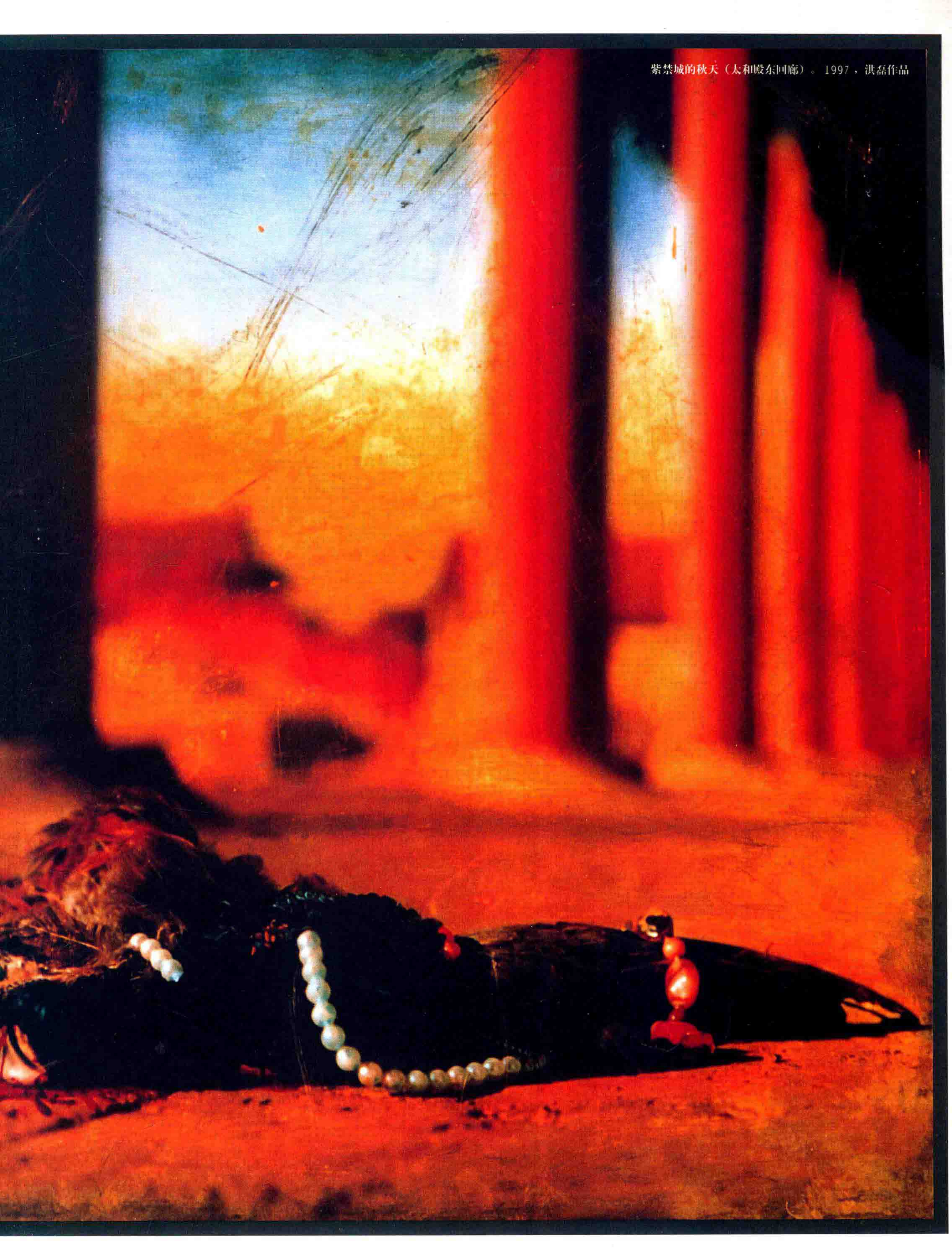
有个叫“一剑穿过忧伤”的网虫出现在大中国 BBS：“巴尔扎克说，孩子，巴黎就是巴黎，外省就是外省。”这有什么意义吗？有人被歧视了吗？据我们所知，另一个人正走在德克萨斯州的荒野中，目光茫然，身影绝望，他要去的地方也叫巴黎。对于自称游荡于精神世界的人来说，巴黎只是一个传说、一个城堡，他并不能真的进入，他也不属于那些喧嚣、热情、鼓舞人心的咖啡店、美术馆。

但巴黎在地图上是找得到的。还是有人在加入它，或者久居其中，忘了世界。一个都城，总得有它的规矩和风尚吧，孩子。

在北京，眼下最火的两个词当然是“朋克”和“地下”，就像“时尚”或“主流”一样，这些词成了简单归纳法的牺牲品；作为音乐形式的朋克和地下，就像作为文化的时尚和主流一样，几乎从未被认真提及。“朋克大战金属党”的故事不断在酒吧、杂志和 BBS 中上演，斗殴和对骂、握手和语重心长的和局也一再出现，谁也说不清这都是为了什么。当丰江舟以苍蝇乐队的形式演绎高保真朋克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复杂，在他发表真正颠覆性的时尚之声《恋爱中的苍蝇》时，嚎叫酒吧的朋克坐位就已然排成了两列：粗糙、激进并且饰以鸡冠头和项圈的地下朋克拿英语和脏话对抗人生，毫不惋惜地建立起无政府主义自留地；而新朋克和流行朋克在经纪人的陪同下到场，以迅猛的流行方式去收容普通青少年中的敏感分子。地下音乐——在中国它从来就不是一种音乐——的新任隐士名叫王凡，据说这个挑剔的人已经在神秘的摇滚和先锋音乐中占领了数百小时录音份额。与之相同的 D.I.Y. 创作方法也在其他被本能驱使的人身上体现：祖咒用八轨机完成了《庙会之旅》和《歌唱祖国》的大部分内容，苏放和宝罗的《天堂之花》则主要依靠一台合成器，超级市场的《模样》也是音序器和真鼓、吉他的产物。乐队传统依然生生不息，除了朋克，还有不计其数的风格在闪烁着，但我们知道，除非像朋克那样年轻，像清醒那样成功，或者像王凡那样自主，一支乐队想要存在下去而不因争执和磨合消失，就几乎是奇迹了。子曰改名爻释，似乎从玄学的意义上获得了新生，而铁风筝更换吉他手后，幸运地录完了专辑，等待着方无行魔法般的混音，鲍家街 43 号的人员变动一度成为谣传的焦点……久未成名的乐队中又有多少散得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年头，主流的处境才叫另类呢。







紫禁城的秋天（太和殿东回廊）。1997，洪磊作品

国子监西幼儿园，一个随时准备跟回院里的女孩——
她也将长大 ，性感、巧笑，并再次经过染有青苔的此地。（聂筝摄）




# 废稿

同车厢的女孩关了手机，被男朋友接走了。我得打车向东，去张浅潜那儿补个懒觉，这么早，这么冷，连雪都不肯融化，音乐也不会醒着。

她的画越来越好了，像自然诞生的光华，在孩子手边飞着。要等傅冲的到来，他辞了麦田音乐的工作，跟朋友开了新蜂音乐公司，忙蜂酒吧的演出早就不免费了，这哥们现在叫 New Bees ，正好一鼓作气让花儿掀起风云。要和王凡同去摩登天空，沈黎晖正和张渤洋聊天呢。小张脚踩数船，作为卖乐器的音乐记者，给广告客户和《通俗歌曲》捎去了地下的问答。我们还会偶遇梅强，他明天回南昌，《摩登天空 · II》里有他的暗室，歌也叫《暗室》，低调、哥特，但梅强低调的心情什么时候会改善呢？然后是陶然的到来，他的乐队叫玩笑，但他是个写字的，“艾尔顿 · 肿”就是他的译笔。

王凡没想到日后会跟小沈签约，卖他的先锋音乐。祖咒也没想到，他是赶来跟我喝酒的。我们的队伍在扩大，买单人却只有小鹿和吗个，这






得吃掉一大笔啊。郝舫也来了，披着围巾，跟狂笑的祖咒碰杯，他还得操心方舟书店， Jim Morrison 的传记尚未脱稿。半小时后，他呼来一个债主，《世界音像》的吴佳祺兼《音乐生活报》的石川一达——“稿子什么时候给我？”小沈是最后到的，数他收获最大，这一桌有三个刚认识的人将与他签约，包括他未来的企宣胡小鹿。革命先要请客吃饭啊。

不过酒要少喝。陶然还是不说话，他睡着了。沈黎晖脸色煞白地遁去。我得和王凡一起把烂醉的祖咒弄回去，在他家听听《庙会之旅》和《歌唱祖国》。这两张专辑怕是没机会发表了，不过祖咒还是很得意：“怎么样？比第一张厉害吧？”他醒了。

这么多故事，我怎能记住？回来的路上，外地口音的司机问我：“您是搞瘟疫的吧？”

# I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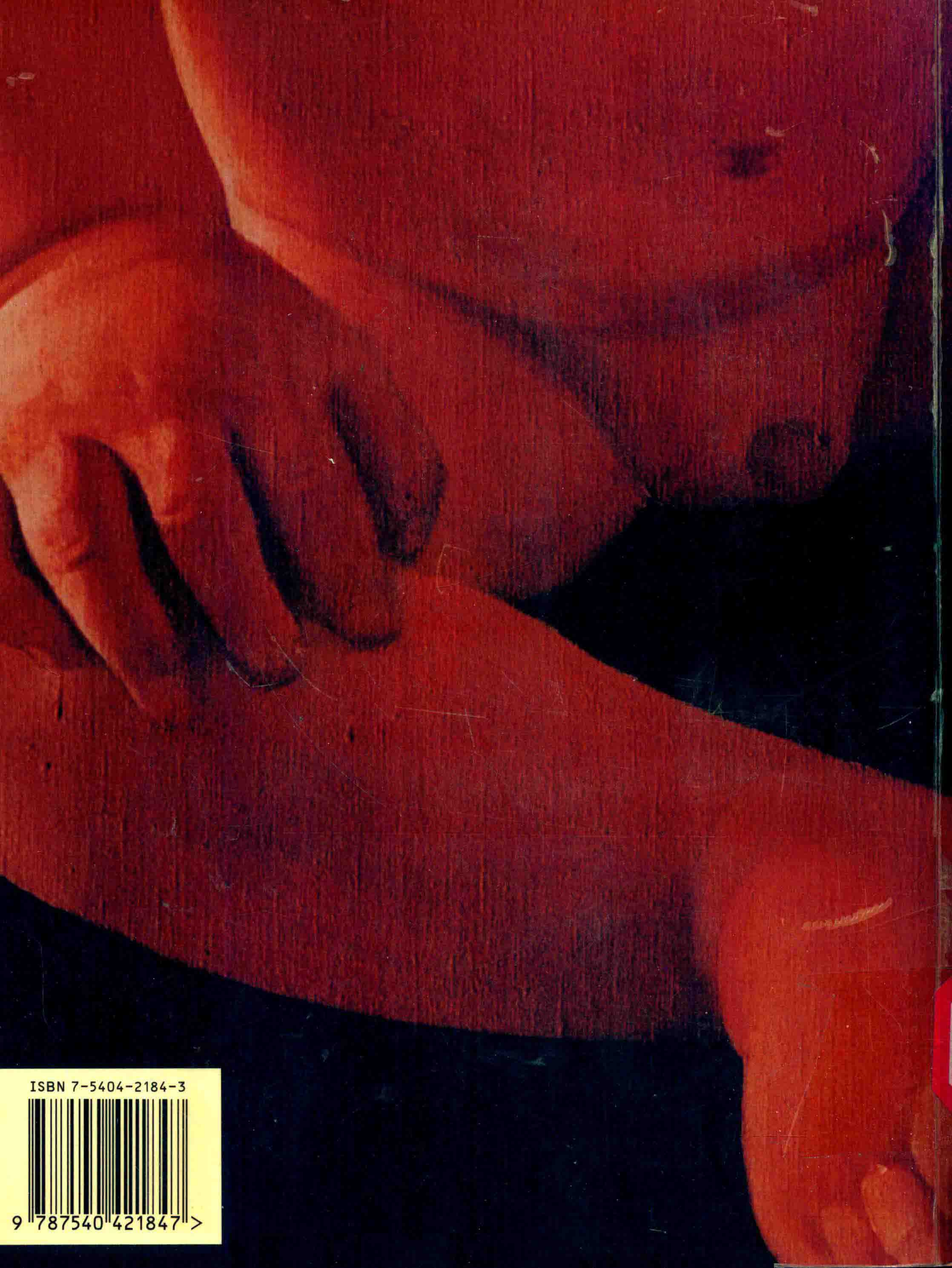
## 索引

**我的北京和我们的《北京新声》** + 二十岁的时候，我去过两次北京，在最热和最冷的季节。这个城市的街道和气味带有抒情的特征，我穿行其间，顾不上陶醉，像一个动词寻找它的宾语一样，在走动中为自己留下了诗篇。那并不短暂，因为它刚好满足了我的兴奋。那些被啤酒养出了肚子的男人，那些严肃的建筑，那一望无际的下班回家的自行车和排队的面的，小院、方向、吹牛的人、夜半二胡、满足的人、太多的黄昏的灯…… + 就这样，1997 年夏天我再次来到北京，依旧像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我用这种兴奋去写一个北京。结果同样令人兴奋。毫无疑问，这是我的北京。 + 而所谓“北京新声”，也正是这个城市本身。人们不可能从我的文字中去考证什么，我也不可能从我的理解中去建立一个指南——无论是音乐，还是北京。简单地说，《北京新声》是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努力，是在文体游戏和抒情之间、纪实报道和批评之间的一次努力。它首先是我对自己的理解能力的挑战，我必须去理解这些音乐，然后理解这些人，然后，理解这个城市中的生活；接下来，它是我和文字之间的事情，一种秘密的、愉快的事情，人们称之为“写作”的事情。 + 关于这些音乐，有一种误解来自惯会凑热闹的媒体，他们把“北京新声”解释为中国音乐艺术的新方向，并进一步滥用“先锋”“探索”这样的词。我的理解是，《北京新声》是这个时代这个城市激发出的歌声，这里的人们怎样生活，怎样被历史改变，就会发出怎样的歌声。“北京新声”是青春被社会承认，压抑被经济解除的结果，这是主流音乐，或者说主流文化的又一道朝霞，它直接让人们感觉到生活的活力和希望。它是生活的新方向。至于艺术，因为它并无进步可言，所以并不是“北京新声”或《北京新声》所要谈论的。我本人在这些新的音乐形式（在中国的）中，听到了生长在这个城市里的新的热情、新的价值和新的可能性，

这些青年用音乐安慰和鼓励了那些敏感的同时代人。 + 关于我的文章，首先它不是报告文学，不是评论，或者圈里人爱写的那种随笔。我尽量把我对音乐和音乐人的理解缩写在文字的各处角落里，它已经足够准确用不着再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我不是汪曾祺，也不是宋世雄。文字是给人阅读的，它有时候是传达思想和陈述事实的工具，但这次不是。我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获得乐趣，就像我创作时所获得的。1997 年夏天所写的，和 1998 年冬天补充的，最终将在设计中重新组合，因此它由若干短篇构成，并且缺乏形式上的逻辑关系。但我认为这符合我们感知和思维的真实状况。它仍然是一个整体。我相信所有的激情都需要理性作基础，我这样做了，而读者却没有义务从阅读中坠入音乐技巧和音乐社会学的深渊，我羡慕啊。 + 关于这本书，或者，这本画册，或者，这件设计作品，或者，这个 Project，我想说的是，欧宁应当是真正的作者。聂筝以他的经验和敏感拍摄，我以我的头脑和野心撰稿，最后欧宁以他的品位和灵感设计——分工看起来是这样的。但事实上，由欧宁提供并总合的整体的创意和理念才至关重要。 + 这一切最终形成整体。从前被割裂的东西，视觉和文字、感觉和意义，现在通过设计重新融合了，而在此之前，在欧宁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时候，一个创作方向就已经诞生。《北京新声》本身也是新的，聂筝的摄影、我的文字、特邀嘉宾的作品、欧宁的设计都是有趣和刺激的。失去联系的文字编排、狂欢的语言、疯癫的色彩、偏执的人像、在时尚前方散步的版式、眼花缭乱的印刷技术……这一切，和我们所提及的音乐一样，都是因为迫不及待要狂奔而出的创造。 + 我们在寻找流行文化最前沿的边界，我们在尝试想象力的极限。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找到。 + 颜峻 + 1999 年 6 月于兰州（底图：高阳，聂筝摄）



新裤子乐队《爱情催泪弹》Music Video 画面。导演：李刚。（刘惠帆摄自电视屏幕）


ISBN 7-5404-2184-3
9 787540 421847 >